

目 录

男人的力量性	1
男性雄性暴力	4
男性启蒙仪式	8
男性性本能问题	14
男性寻求性生活自由	23
男性对性行为的认识	31
男性大男子主义	37
男性对性道德的认识	46
复杂情感精神之爱	55
男性复杂情感爱情的动力是什么	59
男人复杂情感如何定义爱情	62
男性复杂情感意识和冲动的伊甸园	67
男性复杂情感爱情的社会性	71
男性复杂情感男人的角色	74
男性复杂情感情绪与情感	83
男性复杂情感理智与激情	87
男性复杂情感生理上的分享	90
男性渴望幸福想结婚	96
男性渴望幸福神圣的职责	101
男性渴望幸福合法的同居关系	104
男性渴望幸福系恋爱的艺术	109
男性渴望幸福家庭生活的意义	116
男性渴望幸福孩子的利益	125
男性渴望幸福不同的婚姻观	132
男性渴望幸福有关父权的争议	138
权力之道男人的地位	146
权力之道男人的骑士情结	152
权力之道个人的勇气	157

权力之道人格的力量	163
权力之道如何认识自我	170
权力之道财富与权力问题	176
权力之道傲慢是男人的劣根性	180
男人的责任男人为什么要离婚	187
男人的责任两性关系中的性道德	193
男人的责任对生活的态度	198
男人的责任精神上的自由	202
男人的责任善与恶的关系	210
男人的责任试婚的意义	214
男人的责任婚姻中的性行为	218
男人的责任男人的欲望	225

男人的力量性

应该说，女人一生下来就拥有向自然及男人屈服的能力。男人的生存原则是施展权力，不会屈服他人。

几个世纪以来，令人困惑的权力观念已成为男人心理最重要的标志。看看男人用来表明自己存在的多种力量：肌肉力量、政治力量、性能力、军事力量、火力、财力、知识的力量、积极思考的力量、个人的力量等。

男人用力量表现自己时受一种不可能实现，却想成为事实的欲望驱使。在人们心中，男人只有在能够做到某些事，控制某些事、自己或女人时，才会觉得有男子气概。因此他们永远摆脱不了外在事物的影响。

男人产生各式各样的冲动，最后却会被撞得粉碎。肌肉会老化，帝国会覆亡，性能力不行了。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到了向上帝报到之时，却是一秒钟都买不到，意志会逐渐消沉，男人清醒时尽量避免去想疾病、挫败、失败等念头。

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人认为耶稣是男人的原型，美德与神圣的启示的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因为他是根据上帝的形象与本质所造。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男子气概的问题而造成的悲剧，都源于男人的认同错误。他们扮演人生的戏剧时，误把同时代的人当观众。他们受困于当时欲望有限的视野，不知该寻求与神的意志和谐共存。

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意象，是基督教男子气概观念的中心，因为它戏剧化地处理了意志的问题，而意志正是论男子气概时一再出现的中心议题。

在西方文化的架构里讨论男子气概，一定得谈耶稣。

野性难驯的男人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面目。他是野人，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因为他纵情于嬉戏、狂想、情欲，所以常被指责为不负责任、没有道德观

念、用情不专、拒绝长大的男孩。这都是严肃的人，自我的成熟守护者或超我的忠实门徒说的。

如果男人的生命与定义不包括野性，男子气概就会缺少极重要的一个部分。断绝放纵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就会在社会秩序下变得太驯服。每个人的灵魂里，贪玩的小孩和睿智的老人生活在一起，硬逼他们接受严肃的极权统治，他们都会死亡。

狂野的男人为男子气概的定义增加了热情这一项。阿波罗建议凡事适可而止的同时，狂野的人却说：纵欲之路是导向智能的宫殿。

一个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是因为他能用一种比他所处时代的道德标准更普遍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我们现在负担的任务找出一个衡量男子气概的标准，探讨现代男人的使命，

规划英雄式生活的新形式，就是把先知的见解用现代词汇翻译出来。

心存善意的男人和女人都对作战厌倦，但又不知该如何终止两性之间的敌意。数百年来性别成见已经崩溃，但我们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一代之间，变化的冲击层出不穷，性革命、来势汹汹的女性主义、同性恋解放、妇女在政坛和经济领域中出现了。

两性之间发展真爱的第一道障碍，就是过于伤感浪漫的爱情观。我们经常把爱当作全面的肯定。两个人地结合为亲密的一体。接近、亲密、温暖而舒适。流行的爱情隐喻中满是液体的意象：爱河、愉悦的浪潮、软化、漂流、高潮、自我溶化不见、两个人水乳交融。要不然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永远的和平：开放、不设防、降低防御、交出独立性、政治与权力斗争告终。从这么感情用事的观点看爱情，它跟冲突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不相爱的人就会打仗，两者绝不兼容。

有爱的地方就没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不会有爱。在爱的世界里，没有边界冲突，没有人际斗争。

真爱是惟一公正而神圣的战争。两个朋友承诺做彼此忠贞的反对者。男人发誓保卫我独立性的完整，并尊重你的独立。男人只以平等相待，男人要以完整的自我呈现在你眼前，而且要求你也这么做。男人们透过立场相对的交谈、话题的争执、爱的辩证，维系我们的结合，直到双方终于融合为一体。

爱情表面上看像一场战争，事实上只不过是爱得猛烈，男人和女人之间诚实地大打出手，比起旧式的粉饰太平，虽然令人不适，却爱得更真挚。两性已经从沉默的敌意、深埋的恨意、低调的秘密战争，进步到公开冲突。因此，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公开承认，男女之间正在以激烈而古怪的方式交手，不断变换角色，寻求真诚沟通，透过是或否了解对方。

男人最需要了解的是，在他们与女人的关系中，凶猛和暴力应有区分。凶猛是内在力量的表现，暴力则是沮丧感和潜意识无能。两性之间产生真爱之所以困难，应归咎于男性心理上笼罩的一重阴影，他们在女人面前，会莫名其妙涌现一种无以名之的罪恶感，使他们倾向于用暴力手段宣泄内心的无能感。

男人必须先确知他对女人做了何等样的伤害和污辱，并且学会区分什么是成年人应有的责任感、罪恶感，什么是无必要的罪恶感与羞耻感，否则他就无法把女人需求太多、永远在指控他不称职和有罪的魔影，从潜意识里驱除，开始跟有血有肉的女人建立爱的关系。除非男人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女人说不。

男女平等的意义就是，公说公有理的理和婆说婆有理的理，是同一个理。女性自我解放时，古老的痛苦怨恨会变成决堤奔流的洪水，冲走所有障碍管它公正与否。

男人和女人要能相爱，必须先尊重彼此的愤怒。男人对两性战争残留的愤怒，

所以宁可让接触局限于表面化，而不愿冒险表达内心的消极情绪，以免又发动新的战争。男人探讨亲身经验的心得，不见得都能讨女人欢心。在男人更能体会感情的弦外之音，放弃控制的冲动时，女人会为男人喝采。女人听男人倾吐愤怒与痛苦的意愿，不见得比男人听她们诉苦的意愿来得强烈。

男性雄性暴力

我们应该承认，男人自古以来就是暴力的行使者。

男人有可能会把责任推到生理结构上，认为一切该怪大自然的设计有问题，怪不得我们任性妄为。但这种决定论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男人有系统地被制约成一种能忍受痛楚、勇于杀人、心甘情愿为部落、民族、国家牺牲生命的动物。

男人之所以暴力化是因为他们的肉体与精神都有系统地受到暴力对待。因为受过伤，所以他们也伤害别人。男人施加在女人身上的暴力，远比男人相互间的暴力缓和得多。

战争的出现，已使妇女和儿童也都笼罩在一度是男人专利的毁灭阴影里。古老的战争规则只让男人冲锋陷阵，妇孺受到保护，战争经常打着神圣的旗号，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来没有人认为男人的性命神圣或应该加以保护而杀害妇孺是一种罪行，但男人却似乎天生应该当炮灰。

男人很容易受责任、荣誉、爱国等美丽的口号催眠，但尽管官方的故事再三宣扬圣战的光荣，男人从很年轻就知道，战争中的血腥远多过光荣。

男人承受的伤痛，以及长期处于外界要求他上战场牺牲的期望压力下，造成的心灵创疤，

其实在每一方面都跟女人恐惧强暴所受的痛苦不相上下。如果能从离地一百里的高处，像神只一样居高临下观察历史，就会承认，只要人类把战争制度当成

政治生涯的中心，男人承受的痛苦就跟女人一样多。

只要容许战争制度存在，男人和女人就都默许对肉体的侵犯受战士制约的男人强暴女人，战争本身的残酷却是一种对男人的集体强暴。除非女人愿意为战争制度加诸男人身心那种有系统的暴力而哭泣，并分担一半的责任，否则男人就不可能充分摆脱罪恶感，重拾感性，为不幸受强暴或在经济不平等下饱受压迫的女人哭泣和分担责任。

褒贬男子气概时，我们必须记住，大多数男人打过仗，流过血，曾基于保护所爱的人别无他途的信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千百年来，男人被派了杀人的肮脏工作，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心铸造成一种武器。战争固然愚昧，暴力固然令人扼腕，但我们并非生活在没有贪婪、匮乏、疯狂总得有人挺身与邪恶对抗。

男人要负责任，要养家，就得经常远行去打猎和作战，要表现温柔，他先得有驱逐敌人的强硬手段；要慷慨，他先得自私才能搜集充足的物资，有时甚至必须击败其他男人。

从男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男人心理基本上就是战士的心理。塑造男人最有力的就是社会的要求，使他们成为运用权力与暴力的专家，说成是为了自卫。

从历史上来看，男女最大的不同在于，男人会在必要时诉诸暴力，动用暴力的能力与意愿向来是男性自我认知的中心。

军队生活用与原始部落启蒙仪式大同小异的手法，有系统地摧毁人的个性。统一的制服、虐待狂似的军训官、新兵训练营肉体与精神上严酷要求，无非都是为了消灭个人意志，男人最高的美德就是凡事服从上级。

神话的启蒙仪式中，初学者向部落英雄认同，用他们的传奇模式构筑自己的一生。这套启蒙的神话模式对所谓现代心灵的影响，可以从各国军事文学中出现

的英雄偶像看出来。

早期的基督徒相信，真正的生命就是效法耶稣，耶教启蒙门徒都要成为酒神戴奥尼苏斯

的化身，军中的男人则变成英雄，在媒体吹捧下，英雄成了神话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战火的洗礼一直被视为主要的男性启蒙仪式，它留下的记号是男子气概的最佳象征。有许多作家这样写道：经历过这场枪战以后，战火洗礼了参战队员的孩子气。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不曾想：我在火线下流血，现在我是男子汉。我们只是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方式觉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

虽说实际服役的男人只是少数，有杀敌经验更是少数，但所有男人都不免受战争制度与军事纪律的影响。男人都会自问：我是个男人吗？我会杀人吗？面临考验，我能否证明自己勇敢？我有没有真正杀过人或冒过被杀的危险，或与之有没有关系？如果我经历火的洗礼，你对我的评价会提升？

男人都被文化塑造成追求征服、杀戮、死亡的心态，甚至娘娘腔的人也不例外。男孩子从小就知道，不肯打架就会被人嘲弄是娘娘腔或女孩子。我认得很多富于创造力的娘娘腔男人，他们过于敏感或善良，不适合打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因无法通过男子气概的考验而觉得自卑。

想要了解男人和男女之间扭曲的关系，先得观察男人的心理、肉体与灵魂，在社会要求他随时准备为保卫自己所爱而受苦、送命或杀人的压力之下，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提供我们两件有力的知识工具，帮助我们了解男人的战士的心理：佛洛伊德提出的防御反应。佛洛伊德认为，他对人类心理的描述透过客观的

实际观察，符合科学原则，但他的假设只十足证明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理论完全受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他跟大多数十九世纪科学家一样，以为自己具有锐利如神的观察力，能看清现实的真相。

根据佛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心理就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国家，为抵御来自内部或外部，各种真实或想象的威胁而组织起来。腹背受敌的自我，一方面要抵抗道德至上的超我天使大军，一方面要打击本我原欲。

男人发觉危险逼近，身体会立即备战，全身腺体与肌肉都进入紧急状态，肾上腺素分泌

到全身，心跳加速，每个器官都在待命而动。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好几年，这也应归咎构成战士心理的情绪、行为模式与武装人格。拿统计到的数字来说，传统女性的屈服态度比男性的侵略成性更适合在现代中求生。谦卑的人确实比征服者多拥有这世界将近十年之久。男人为统治的特权付出高昂的代价。

心灵的形式由其作用决定，男人的思想、肉体与灵魂在战争制度下，就必须接受实际参与或想象的冲突、竞争与战斗的塑造。下面列举若干战士、心理的特征：戏剧化的英雄。战士的世界属于最古老的戏剧结构主角与反派冲突，英雄打坏人。

人类以打猎为生时，他们跟被猎的动物会产生一种三重的神秘关系。猎人会认同他必须杀死的猎物熊、野牛、大羚羊。他们相信自己前世是羚羊，而且他们死后，灵魂会回到动物界去。许多猎人为自己取了动物的名字。猎人必须与猎物、心意相通，不仅要了解猎物的动向，以便抓它，也要使它同意作牺牲。猎人的男子气概要向他的图腾动物和他制作的工具认同。

如果直接把第一个将打猎塑造成神话的男人当作第一个哲学家，或许有点儿离谱，但我会想象他静静坐着观察野兽的动静，直到他能看穿它们的心理为止。

在如此密切的契合之下，他不但了解，也十分尊重他将要杀死的动物，他还创造了一个动物牺牲自己，让人类吃饱的神话。

早期的猎人画家满载而归时，十分激动，满脸通红，他一定觉得胯下格外有劲。布什曼男人的阴茎即使在休息时，也保持上翘，不会下垂，这猎人说说不定也觉得动物的力量与他自己的男性不可分割，他甚至可能在交合时也感受到相同的逻辑与神秘感。他一定会这么想：矛穿透供应食物、延续生命的动物，阴茎也穿透女人，创造新生命。

早期的猎人对男人的定义贡献了哪些基本美德，现在无法说清了。无论这事发生在信史之前几千几万年，使我们跟那些正在树上的表兄弟们有所不同的最大美德就是语言能运用象征和譬喻了解自我、发明工具、能设身处地了解其它动物。

我们不可低估所谓原始渔猎采集社会的成就与成熟度。虽然我们不完全知道如何翻译拉卡岩洞或查可峡谷的壁画，但很容易可以看出，它们都属于一套前后连贯的哲学，所有今

天分门别类为艺术、仪式、宗教、青少年启蒙仪式，都从这些哲学中诞生。

男性启蒙仪式

可以说，战争、工作与性，既是男性启蒙仪式的三大要素，也是男性认同的三大支柱，看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色情文学集或画集，都会看见一个又一个特大号的阳具。

不断勃起，高高耸立，摆出胜利的姿态。不论是点缀印度神庙的石雕男性生殖器，古罗马长翅膀的阳物，阴茎通常都被刻画得比实物大，很夸张，很迷人。

无论是赞美或弥补，男性对阴茎的专注几乎都带着不由自主的成分。我们很

难看出它的真面目，就像透过望远镜的两端观察。错误的一端使它显得过分渺小而扭曲，一个垂头丧气的小鬼头，永远无法满足女性。正确的一端又把它放得太大，太接近。两种方式都造成偏差。基于某种很不明显的理由，男人的自我跟他们的阴茎几乎无法分割。女性从来不会像男性认同阴茎那样强烈地认同她们的阴道。

没有人知道男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阴茎当作意识的中心。现代小男孩不论动手玩弄、歌颂，或公开展示勃起，都不受什么限制。统计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确认，男孩子一旦认识了性，除非有事情让他很忙，否则他每小时平均想性多次。佛洛伊德一生中只有十年有比较活跃的性活动，所以这种事不能太信任他，他说男性脆弱的自我认同，是以摇摇欲坠的被割的焦虑论调为基础。

我们看到小女孩和妈妈都比我们少了某件东西，就以为她们生而不幸，被命运或残暴的父亲剥夺了这种尊严。

不管你怎么解剖这件事，其实最好是少做这种事，阴茎的本质和命运还是紧贴着男人的心。这方面的考虑甚至经常取代了他的心。

现在男人对性的了解即使不完全，也相当丰富了。一般都觉得性的范畴里已经没什么新鲜事了。男孩子的性启蒙通常在梦遗、男生更衣室、或汽车后座等富于精神分析意味的背景下发生。

梦遗在所有受忽视的性启蒙因素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有的男人毕生不曾梦遗过，有些人则一直等到有过性经验才开始梦遗。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梦遗不啻是把沉睡者唤醒的号角声。这种人早在长出第一根阴毛，在身材经荷尔蒙塑造成形，在父母师长教他小虫小鸟是如何做那事，并且不厌其烦警告他不可做这做那之前，伟大而原始的阴茎已经自告奋勇担任第一个性启蒙者。

启蒙之梦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某些男人很早就经验到性与神秘、亵渎与神圣。

在我们落入文化塑造的扭曲变形的性窠之前，有时我们也有机会窥视性爱狂喜的堂奥。富于创意的想象力跟荷尔蒙结合，趁着我们还没有被教诲成真正的男人，把最美好的性远景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的文化神话深深镌刻在我们的性生活上。第一度启蒙是为了完成战士角色的需求，征服和占有越多女人越好。第二度启蒙是为了做一个性的好工人，要做爱，力求表现，创造预期的效果带给女人满足。

也许有人会抗议：你不是想告诉我们，性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展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男人还得为女人的高潮负责吧？现代男女应该都够开放，能为各自的性满足负全责了。没有人再把满足女人视为男人的天职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分享责任的观念或许已渗透了大脑皮层，但它确实还没有机会进入主管情绪的大脑中枢，至于远在下半身的生殖腺，它就管不了。可以不提自由主义的那套辞令，绝大多数的男人还是觉得有责任在性方面满足女人。我们的头脑或许已经解放了，但肚腹一带仍然很保守。而且几乎所有小男孩一辈子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讨好你的母亲，否则你就麻烦大了，这教他们的脑筋如何转得过来。

我猜很多男人永远摆脱不了在性方面力求表现的习惯，即使在婚姻中也是如此。我们从文化——父母、师长、老板、电影上得到的信息就是表现男人的一切，男人就得把事情做出来。只要我们用经济成就作为判断一个男人的标准，用他的财富来衡量他，那么我们也就会用卧室中想象的成功来评估自己。

在传统上符合男子气概原则的性考验并不涉及性器官。一个真正的男人用使女人怀孕、

保卫她不受敌人所害、养家活口来证明自己，但随着节育工具有了，小家庭或根本不要小

孩的婚姻观，已经把生育考验淘汰出局，战争不受欢迎，加以核子武器的强大杀伤力，使一般人对军队信心大失，双薪之家也剥夺了男人家之主的光采。结果男人只好全力投注于如何讨好女人，在她们面前力求表现。很多男人接受男子气概考验的竞技场，已经从战场变成了眠床。

男人的性启蒙还有把性与征服或表现分开的第三阶段。有些男人不受世俗所囿，摆脱了男生更衣室和表现、心态，把激情与温柔整合为一。通常要等到追寻进入第二部分，等他对普通的男子气概涉及的奖励与痛苦感到幻灭以后。

身为男人，成长过程中会得到某些补偿，不过享乐不包括在其中。教我们如何取得权力的种种仪式，设计时不曾把多采多姿的感官世界考虑在内。很多男人替自己买劳力士手表或保时捷跑车，只因为那是成功的报酬，但我们很少人称得上是享乐主义者，因为我们光处理实际事务已经忙不完了。

暂时回到男人更衣室吧。我在青春期后没听过哪个男人吹他在性爱中享受到慢慢出现，

久久不去的乐趣，或谈到女人眼里的神采如何美丽善变，或做完爱跟女人并排而卧感到多么满足。我从不曾听一个男人说到女人从他身上获得多少乐趣，只是无止境地吹说他使多少小妞达到高潮。或许只因为男孩子还太羞涩，没有耐心，又有太多挥洒不尽的精液，所以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求爱上。但据我所知，男性的冷漠并不局限于年轻人。我们的用意只想证明出自己的能力，没有空驻足欣赏路旁的花朵。

有消息证明，女人在一块儿谈各自的情人时，不会谈他们多硬、多快或多少次高潮。相反地，她们称赞男人温柔的触摸，像给人快乐一样容易感受快乐，不但在高潮的狂热中奋勇冲刺，也能自然地融入两人结合的温柔之中。我对各种政见的妇女所作的非正式民意调查显示，她们都希望男人把脚步放慢一点儿，多花

时间享受性的旅程，不须担心结果，她们要男人知道，性爱敏感带只有两种部位——心灵和皮肤。

因为我们只学会用不以量化的东西来衡量男子气概，所以对日常生活中需要随时慢慢回味的乐趣，体会的能力反而非常薄弱。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就存在于成功男人的心里。

在注重表现的文化里，男人被教导，只有努力工作，照顾女人，才能换取真爱。近年的性与经济革命开始前，男人从开始约会直到退休为止一直肩负赚钱付帐的期望。很多男人由自动占有，养活老婆和家人，做种种他们以为会讨女人开心的事，心里却默默怀着恨意，因为他们总觉得付出和回收不成比例。但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女人不愿意付出更多，而是男人在社会制约下丧失了接受更多的能力。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付出比接受更显得有权力。

男人希望从女人那儿获得快乐，因此，普通女人注定会使我们大失所望。她应该能带我们重返伊甸园，给我们一个放下重担，享受生活的地方。她应该是我们的救主，使我们重新衔接疏离的感觉，恢复完整。阴茎就是那条直通乐园的窄路，横度架在恶水上的桥梁，就能找到四分五裂的自我的各个部分。因此性对男人才那么重要。有个女人曾经告诉我：我终于了解，对男人来说，阴茎是他们身上唯一的部分。只有在用阴茎办事的时候，他们才准说出自己的感觉。

大多数男人都花了不少心思，希望能把感情处理得跟工作一样好。男人好朋友凑在一块儿，谈的都不外乎女人。我们想弄懂我们的爱情和婚姻出了什么差错，哀叹过去的失落，盼望下次会有改进。我们像女人一样无可救药地浪漫。我们不愿轻易承认自己对女人的依赖或对爱情的失望，只因为沉默比较像男人的作风，我们自就被训练着把感情藏在心里。宁可心脏病发作，也比公开承认好。

男人和女人的想象力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我们会直接想象性，对亲密感情却只能间接想象，女人却正好相反，亲密是直接，性却是间接的。这并不代表男人

只对性感兴趣，而是我们一直被要求压抑对亲密感的自然需求，文化只允许我们在性行为中感觉与另一个人亲近。用心灵的耳朵倾听，你就会听见即使最粗鄙的言语下，也藏有神圣的企图。男人在表达情感时往往张口结舌，只能用涉及性的字眼来述说他们的心愿。他们就是这么一个世代被训练成战士和工人，被制约成不许表达，只许依命行事的性格，你还能期望他们怎么办呢？

无论男人多么努力，都绝不可能从性行为之中找到秘密。跟一个女人做爱是男性神秘的一部分。射精的期许和基因的欢唱，都只有在把希望凝聚为一个婴孩的新生命时才具体呈现。但不论性行为的原始动机是炫耀或温柔情爱，如果我们还企图从中证明自己的男性本质，就免不了失望。

性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乐趣，但绝不是认同感。

事实上，我们除非能先在别处找到自我，否则就不可能在性爱中浑然忘我。只有极具安全感的人才能在爱情中把自己托付给另一个人。

男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指出我们的毛病，哀叹我们如何玷污了过去的的光荣，宣称我们需要新的展望。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奉行的男子气概仪式很快就变得过时，甚至有致命危险。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不再相信圣人的理想或绝对价值观的文化里，为男子气概创造新形象。我们困处现代男性的疯狂之中，找不到出路，我们被眼前亟待处理的事务包围，成为财务季报和短命趋势的俘虏，迫切地需要超越现在，找到一些能给他们希望和尊严的事物。

无论男人是否如希腊哲学家所说是万事万物的标准，但他对万事万物都斤斤计较，却是事实，他对于自己尤其挑剔得厉害。除了同时代的人物和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英雄，我们还能去哪里找男子气概的模范呢？

对男人或男子气概本质的道德判断，往往不出性别的生理因素或当时舆论的范畴。任何一种男子气概或女人气概都一定有它的社会背景。男子气概并非男人

自己创造的万世不易的东西，而是因时推移的一种文化建构。

男性工作仪式早在学龄前已开始筹备，早在男孩子懂得什么叫后天之前，善意的大人就会下意识地问他：你长大了要做什么？他很快就会发现，我要做一匹马这样的回答，不能令大人满意，他们在我们五岁的时候就要知道，我们一生有什么计划，将来选择从事哪种行业。男孩子很早就学会，职业代表一个人。

在现实社会里，男子成年仪式最早是从学校开始。神话、价值观、英雄故事的搬演，已全部融合在教育制度里。在印第安部落中，唯有地位与权柄极高的人，才有资格头戴鹰羽和吟唱某些圣歌，这跟商业社会用某些名牌和商标代表阶级地位，没什么区别。

男性性本能问题

对男人的性本能的研究，会出现许多容易引起误解的看法。男性的精液并不是垃圾一般的东西，非得清除不可。在女性方面，没有什么东西可排，也没有这种排便似的欲望。最有权威的心理学家麦图格教授，对性本能下了这样的定义：“性是复杂的、先天就组成的、身心两方面都有关系的一种倾向，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识，二是感，三是动。从神经的功能结构方面看，一是属于传入神经或感觉神经，二是属于神经中枢，三是属于传出神经或运动神经。”

在知觉方面，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感知与不断地辨别种种事物，同时这种感知与辨别也正是种族的安全所必需，不得不做适当的反应。

应该说，我们自有一种能力来辨别异性，并能就此辨别做出适当的反应，最终达到性交合的目的。麦氏的定义，实际上适用于一切本能，不限于性的本能。同时他对一般的本能又有一个定义：本能是一些内在的特殊心理上的倾向，是凡属同一物种的个体所共有的。所以，这种笼统的说法，对于两性由接近至结合的过程，并不能增进我们对于这过程的了解。心理学界早就有一个废止本能的提法，对于这种提法我是赞成的。

在自然界中，要把性欲积累起来，雄性要花费多种活动与炫耀的功夫，而在雌性方面，要费上不少考虑的时间。冒氏讲到的厮磨过程，不论其为身体的或精神的，其效用也无非在增进积欲程度，所以我们可以把厮磨的过程说成是积欲的过程的一部分。性选择的决定，就发生在积欲迟缓的过程中。斯登达尔所称的恋爱的结晶化，以及种种性的象征，无论其为常态的或变态的，也都在这一过程中。

虽说积欲在前，但解欲终究是性爱的目的与高潮。解欲是一个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过程，也经常和心理学发生关系。

解欲是积欲的关键，如果关键不明，我们对性冲动的心理分析，也就是模糊的，不正确的。就拿普通情形来说，积欲与解欲衔接紧密。积欲好比积薪，解欲就像积薪被点燃后火焰的升腾，这火焰不是寻常的火焰，而是生命的火焰。一经点燃，生命便可以世代地不断传递。

这全部过程分开部分，实际是贯通的，好比平地上打木桩，打桩的那个极有分量的大铁锤，用了大力举起之后，突然放下，正打在桩子的顶上，桩子被打下去好几尺。

积欲好比大铁锤因蒸汽之力被高高举起的阶段，而解欲便是它被突然放下的阶段了。直到桩子入地，那积累的力量才完全解放出来，好比把精子推动到目的地才结束解欲一样。

人们所说的积欲，在文学或社会学上叫做求爱。

男性因性冲动的力量而向女性接近，就是求爱。未婚的人，求爱往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已婚的人，每一一次性交合，也必得经历这两段过程才算有效，双方才能满足。

在解欲前，多少得经过一些求爱的程序。缩短的求爱程序，自有它的功用。性交合天长日久会使双方生厌倦之心，要避免厌倦的心理，要增加欲望的积累，过程序是不可少的。被缩短的求爱过程大部分属于触觉方面。

触觉与其他知觉所引起的欲望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渐渐地集中到生殖器官上，最终到达顶点，解欲的现象便接踵而来。全部的过程最初原是神经与精神的居多，到了积欲后期与解欲之时，最活跃的器官就是血管，这便是进化史上古老的所谓以皮肤为媒介的性关系。

各种欲望到了后期，全身的血好像完全向皮肤输灌似的，造成各部分的充血状态。脸部变红了，生殖器官也在发生着变化。

生殖器官的充血，在男性方面，即引起阳具勃起。前人说过，“勃起是阳具的害臊”，不过脸的害臊与生殖器官的害臊有不同。后者，充血是一个确切与特殊的功能，就是在性交合的时候，可以插入异性的生殖器官。

阳具的血管的机构比较特别，它是由大量的结缔组织、动静脉管与平滑肌肉纤维错综纠缠而成的，三者综合，叫做勃起性组织。

勃起性组织的勃起可由神经中枢唤起，也可由触觉激发。雄性的生殖器官有这个特点，雌性也有勃起性组织和积欲过程的充血现象，当然没有雄性那么明显。

非洲大猩猩，雌性在性欲激动的时候，阴蒂和小阴唇所显示的充血现象很明显。到了人类，因阴蒂不发达，有新进化的阴阜和大阴唇，充血现象几乎看不见，但触觉还是可以感受的。因为这些部分自有海绵式的弹性，一经充血，弹性就增加了。

女性阴道的全部，包括子宫在内，都有血管。在性欲发作时，也可以显出充血现象，与阳具的勃起相似。女性阴道出现充血现象时，分泌的一种液体散布在

阴唇的周围。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粘液，平时也有，润泽在阴道里。

当性欲发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粘液就大量分泌出来，其功用在于进一步润泽阴道口，使阳具交合时容易进出。在分娩的时候，胎儿要从阴道出来，也有这种液体润滑。这种粘液大部分是从腺体里分泌而出，而腺的位置就在阴道口的里边一点。

在积欲过程中，这种粘液的放射是必要的，这证明积欲和脑神经中枢有活跃的关系。同时，粘液的分泌也和情绪的变化呼应，文学书上所说的“春情荡漾”，也就是粘液放射的时候。男性阳具的勃起与女性阴道的充血完成以后，性交条件就具备了。

如女性是处女，还有一个处女膜问题。从前，人们把这一块小小的膜看得非常重要，一个处女的名节就在这块膜上。现在人们明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第一，女性的贞节并不完全建立在解剖学之上。第二，处女膜的大小厚薄往往因人而异，这种不同在自然的变异范围也是正常的。第三，幼年的意外的损伤，都可以把它损坏。女性的手淫也可有同样的结果。

当然，也有性交后不破的。据说在娼妓中间，也可以找到完整的处女膜。首次性交合时，处女膜破损，会引起疼痛。如膜特别厚，交合也许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就得请医师做手术，女性也可以自己用手指的压力，渐进地把它伸张开来。

在有的文化单纯的民族中间，做母亲的往往很早就替女儿施行这种不用刀的手术，目的是为了卫生，也是为结婚后可以增加性交合创造便利。

在一切高等动物中，包括进化史上与人类最近的生物在内，交合的方式，总是由雄性一方前进到雌性一方的背面。到了人类，正常的方式是男的前进到女的前面，即面对面。在西方，有人叫做“爱神正看式”。

这所谓爱神正看式可以看作人类特有的交合方式，但也有其他方式，或为正看式的交合，或与动物的交合式相近似，往往因民族习惯而异。

女性经过满足的解欲之后，如同有饮酒适量的感觉，有点醉态。这种感觉可以维持好几个小时。因此，积欲与解欲不是两个分开的过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这是造化规律，它让生物个体把力量积蓄起来，紧接着又让它把力量解放出去。这解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生殖细胞的输送与结合，都是这种力量解放的结果，即使因受阻达不到生殖的目的，这种力量的出现，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也很有益处。

拿人类的性的规范与其它规范来说性质都是相同的。即使在那些以法律或者风俗认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仍然有广泛的婚外和婚前性行为，许多性行为，都是长期的性关系的一部分。人类中确实也有一夜风流，但在另一方面，多数人类维持着多年甚或是好几十年的夫妻关系，而老虎和猩猩除开一夜夫妻外什么也不是。

在国家产生前，一夫多妻被绝大多数传统的人类社会所接受。但即便是在官方认可一夫多妻的社会里，多数男人在一段时间内仍只有一个妻子，只有特别富有的男人才会同时娶回和供养几个妻子。在提到“多偶制”这个词时，浮现于脑海的众多配偶，如同现今阿拉伯和印度王室的情况，只有在人类进化的后期允许少数人集中大量财富的时候才在一些国家社会中成为可能。所以，一般情况应该是多数人类社会多数成年人在其长时间的配偶关系中，无论实践还是法律上都是一夫一妻。

还有一种不同意见，那就是将人类的婚姻描述成共同抚育后代的伙伴关系。应该承认，多数孩子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亲情多于从父亲那里的所得。尽管在传统社会中，未婚母亲成功地养育孩子是非常困难的，但在一些现代社会中，未婚母亲在成年人中占了显着的比例。

当然，一般情况仍然是：多数人类的孩子能够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得到照顾，比方说照料、教育、保护、食物供给、住处和金钱。以上这些人类性活动的特征——长期的性伴侣关系，共同抚养后代，与其他成双作对的性伴侣比邻而居，私下性交，隐蔽的排卵期，女性对性接受度的延长，为了乐趣而性交，直到女性的绝经期——构成了我们人类假定为正常的性活动。

在谈到动物的性习惯时人们感到新奇、好笑或者厌恶，它们的生活对人类们来说是怪异的。但这显然是物种歧视者的观点。以世界上 4300 种其它哺乳动物的标准，即便只以人类的近亲类人猿的标准衡量，人类自己的性行为才是怪异的。

性不是为了娱乐，配偶间的经济合作也很薄弱或者压根儿没有。猩猩与人类在后者的很多方面相似或接近：雌性对性的接受能力在发情期的几个星期中一直延续着，性主要为了取乐，在群体中的许多成员间存在经济合作。但是，猩猩仍然没有人类的契约或配偶关系，没有人类掩饰得很好的排卵期及人类父亲对后代的承认和照顾。多数或者说所有这些物种都不同于人类，没有一个准确定义的雌性绝经期。

在人类和类人猿的祖先分化的三个决定性的领域中，除开直立姿势和大脑的尺寸外，还有性行为。猩猩总是独居的，雌雄相会只是为了交配，雄性不照顾后代，雄大猩猩有几个雌性配偶，和她们中的每一个在几年中保持阶段性交配。类人猿和黑猩猩群居生活，但并无持续的雌雄组合或者专门的父子组合。很显然，我们的大脑和直立姿势对于人类属性——实际上，人类今天使用语言，读书，看电视，购买或者种植大多数食物，占有几乎所有的陆地和海洋，把我们人类自己和其它物种关入牢笼，正在消灭其它动植物物种——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类人猿仍旧无言地在丛林中采摘野果，只在东半球的热带地区占有很小的区域，不因禁任何动物，并不对其它任何物种构成威胁。

人类怪诞的性活动在人类取得这些属性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人类性方面的

特色是否与人类和类人猿的其它区别有关呢？人类的直立姿势和发达的大脑之外，那些差别包括：人类相对缺乏体毛，依赖工具，使用火，发展了语言、艺术和文字。

达尔文在他的巨着《物种起源》中承认生物进化现象时，他的多数证据来自解剖学。他推断多数植物和动物的结构是进化的——这就是说它们一代又一代发生着变化。他还推断进化的主要力量是自然选择。

性活动取决于每一物种的食物来源，食肉动物的威胁和其它生物学上的特征。某些性行为方式也许要比其它方式更适于生存和繁衍，自然选择保证的是基因的传递，而生存在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使基因的不断传递成为可能的策略。

人类与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发生了分化，性解剖结构有某些区别，性生理区别多一些，性行为差别更多。这些差别确实反映了人类和黑猩猩在环境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还受到遗传因素的制约。

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是如何造成人类进化出怪诞的性活动方式的。要理解人类的性活动，我们必须抛开人类扭曲的观点。我们确实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生物，父母在性交过后仍然厮守在一起，共同哺育后代。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声称男性与女性在共同养育子女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相提并论：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婚姻和社会中，男女两性耗费的精力是不相等的。人们之所以将这些好处认作父亲的天职，因为它们已被写入了法律：离异后父亲仍有抚养孩子的义务，即使是一个未婚母亲，也可以让法院判一个男子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但这些观点仍然是仅仅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待性活动。在性活动方面，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属于异常现象。

心理学中的本能便属于这种约定俗成的基本概念，虽然它目前仍不精确，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容进行探讨。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已经知道，生理学中有刺激概念及反射弧模式，生物体通过行为对作用于生物组织的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本能与刺激的关系如何呢？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将本能纳入刺激的概念之内，可以说，本能是对心理的一种刺激。但我们却不能将本能等同于心理刺激。很明显，除了本能刺激之外，还有其它的刺激作用于心理，这些刺激更像生理刺激。

本能刺激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有机体内部。正因为如此，本能刺激对心理的作用是不同的，为了离开这些行为，所采取的行为是不同的。

如果假定本能刺激具有单一性，仅靠某种单一的行为即可将其处理，那刺激的所有本质都被掩盖了。典型的例子便是刺激条件下的逃跑。当然，这些作用可能重复或累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也不影响我们对于移动刺激条件的认识。

从另一方面看，一种本能绝不仅仅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力量，而总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再次，既然本能产生于有机体内部，那么要逃避它便是不可能的。描述本能刺激的更好术语是需要，要消除需要就要满足，而满足只有通过内在刺激的适当改变才能实现。

让我们把自己想象为几乎无助的生物体，在世界上毫无目标，其神经物质却在接受刺激。这一生物体很快就能够做出首次区分和选择方向。一方面它将意识到身体行为逃避的刺激，这是面向外部世界的。

它还会意识到另一种刺激，逃避行为已毫无用处，这种刺激的特征便是恒定压力的持续。这些刺激是内部世界的讯号，证明了本能需要的存在。

通过对本能主要特征的认识，即他们源于有机体内部的刺激，并表现为一种

恒定力量，我们首先认识了本能的基本性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推测出了本能的其它特征，如无法用逃避对付它。然而，这种探讨过程并不能阻碍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对本能的最重要方面已作了假设，现在所要做的便是将其表达清楚。这一假设具有生物学本质，并使用了目的或适宜概念，这意味着：神经系统是具有这种功能的器官，它可以去除刺激，或者将刺激降到最低的可能水准。

如果可以，它会使自身保持在不受刺激的条件之中。我们现在不必找出这些观念的非限定性的例外，而是赋予神经系统这样的任务——用通常的术语——控制刺激。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本能的引入使得生理反射的简单模式变得极为复杂起来。

外部刺激只需神经系统避开就行，这是藉助肌肉运动实现的，而作为一种适宜的运动，它变成了一种遗传素质。然而，源于有机体内部的本能刺激却不能用这种机制对待，它们对神经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它不得不采取一些联合性活动，藉助这些活动使外部世界产生变化，以满足内在刺激的要求。

这些活动使神经系统恢复了它躲避刺激的理想意图，因为对神经系统而言，外部刺激的流入是源源不断和无法避免的。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能和非外部刺激才是使神经系统得以发展的真正动机力量，神经系统的非极限能力使得它发展到了目前如此高的水准，实质上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本能本身，或至少部分地是外部刺激促动的，这是在种系发展的过程中给生物体带来的诱发变异。

如果我们能发现即使是发展到最高水准的心理器官的活动，也服从于快乐原则，譬如，在愉快不愉快的向度上受情感的自动调节，那我们就不能拒绝作更进一步的假设。这些情感反映了控制刺激过程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愉快的情感会

与刺激的增加相联系，而愉快的情感则与刺激的减少相联系。

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思考心理生活，那我们就会将本能当成介于心理与躯体之间的概念，当成刺激的心理表征，这些刺激源于有机体内部并触及心理，当成心理活动的需要量，这是身心相互联结的结果。

本能的目的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为了满足，而满足的获得仅能在本能条件下将刺激状态移开。不过，尽管每一种本能的终极目的保持不变，但却可以通过不同的管道达到目的。

我们可能会发现本能具有多种相近的、居间的目的，它们之间相互结合或相互交换。经验还使我们可以说，本能的目的是受到抑制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在本能满足获得后，本能便被抑制或被转移。我们可以假设，即使这样的过程也渗透着部分满足。

本能的对象指本能所指的事物或本能为实现其目的所借助的事物，它们具有最大的可变性，与本能没有根本的联系，只是在使本能满足具有可能性时才与本能联系起来。本能对象未必是新异的，它也许是主体自身的一部分。

在本能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对象可能会出现多次的变化，本能的移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经常出现在本能发展的最早期，通过对分离的坚决反对，使本能的运动停顿下来。

本能的根源指的是身体过程，它产生于某一器官或身体的某一部分，其刺激以心理生活的本能表征出来。

男性寻求性生活自由

如果性自由不加以限制，结果就不好了。如果性满足变得非常容易，性欲需要的心理价值就会降低，为提高力比多能力，挫折是必要的。

在男人中，如果对性满足的自然抵抗做得不够，他们就会随时建立习俗的障碍，以便能够真正地享受爱情，无论对一个男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在毫无困难就可实现性满足的时间里，如在古代文明的衰落期，爱情变得一钱不值，生活变得异常空虚，不得不通过建立强烈的反向形成以恢复爱情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

基督教的禁欲倾向确实创造了爱情的心理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从未想过的。禁欲倾向赋予了苦行僧的生活以最重要价值，因为他们的生活几乎充满了与力比多诱惑的斗争。

应该承认，这里所表现出的困难代表了我们的生物本能的普遍特征，同样，从一般意义上讲，本能的心理价值与其受挫折的程度无疑也是一致的。设想有许多不同的男人同样地进入了饥饿状态，随着择食需要的增强，个体间的差异将趋于消失，所有的男人都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共同特征，同样真实的是并非本能的满足必然带来其心理价值的迅速跌落。

比如说，嗜酒者与酒的关系便是这样的。酒难道不是总能给嗜酒者以同样的中毒性满足吗？在诗歌中常将这种满足比拟为性欲满足，但这种比拟能为科学的观点所接受吗？是否有男人听说，嗜酒者因习惯喝一种酒而不得不改变酒的类型呢？恰恰相反，习惯倒是常将嗜酒者与某一品牌的酒紧紧地捆在一起。是否有男人听说过，嗜酒者需要到酒价更昂贵或禁酒的国度里去，用这样的障碍强化他欲得到的但却退化了的满足呢？

如果考虑到本能的漫长与艰难发展史，有两个因素也许与这种困难有关，首先是对象选择的双向结果及反伦乱问题的介入，性本能的最终对象已不是原始对象，而为其它对象所替代。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当由于压抑而失去了愿望冲动的原始对象时，很容易有无休止的替代物取而代之，但没有一种替代可使男人获得充分满足。这也许对男人性爱的常见特点做出解释：他们的对象选择总是摇摆不

定，不断寻求刺激。

性本能有多个原始组元组成，或者说由这些组元发展而来，但有些组元却无法变成后来的本能形式，在很早的时候它们就被压制或移作别用了。

最突出的要算嗜性本能，也许自从男人类直立行走，嗅觉器官不在贴近地面之后，它们就不能容于文明的审美标准了。

在所有的发展过程中，只对情结结构的上层部分产生了作用，促发性兴奋的基本过程却依然故我。排泄物与性有着太密切和难以分离的联系，生殖器的位置是具有决定性和无法改变的因素。男人或许会引用拿破仑的极其著名论断：解剖学是命中注定的。

在男人类身体发展过程中，生殖器却并未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它们仍保留在动物的水准上，因此，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

要对性本能施以教育是困难的，以往的教育不是太过分，就是微乎其微。如果文明不以牺牲可体验到的快乐为代价，要消除性本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派上用场的冲动会在性活动中以未满足的形式持续下去。

我们或许不能不向这样的观念妥协：要使性本能适于文明的要求几乎是极不可能的。文明发展的结果，很难使男人类避免克制、痛苦与未来的灭绝。诚然，这种沮丧的预测仅建立在单一的推测之上：在文明的压力之下，性本能的压制必然导致对文明不满的特殊后果，当性本能屈从于文明的起码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男人类便具有了创造最崇高的文明成就的源泉，这是通过本能组元的更广泛升华实现的。

通过对性本能的任何分配均能保证充分的快乐满足，那男人为何会将性本能力量移作他用呢？他们绝不会放弃这种快乐，当然他们也就无任何进步可言。因

此,两种本能需要之间无法调和的区别,似乎保证了男人人类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科学的目的既不在于骇人听闻,也不在于安抚男人心。但我本人随时承认,我所得出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应建立在广泛的根基之上,男人人类在其它方面的发展或许能够纠正我在此孤独沉思的结果。

男人快感区的快感在被满足的同时却伴有性紧张,对这种性紧张的根源及实质,我们尚一无所知。说紧张源于快感本身,但这也不全是,而且难以让男人信服。因为,在最大的快感到来之时,随着性物质的释放,紧张非但没有产生,而且还被排遣。因此,快感与性紧张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联系的。

性物质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除了性物质的释放才使性兴奋趋于停止外,在性紧张与性物质之间还有其它的联系。过着禁欲生活的男人,其性器官在不同的间隔时间里并非总受制于清规戒律。譬如在夜里就可释放性物质,并伴有快感,这是梦中幻化的性行为的产物。

就这一过程来说,恐怕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性紧张借助幻觉对真实行为的替代,将性物质中的精液释放了出来。性机制以枯竭的体验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若精液枯竭,不仅性行为无法产生,快感区对刺激也会变得迟钝,其相应的兴奋也便无快感产生。由此可见,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对快感区的兴奋也是必须的。

如果我不错的话,这会导致一个已经广为流传的假设,即性物质的积聚产生并维持了性紧张。性物质的压力作用于性储存器的内壁,作为一种刺激传至脊髓中枢,更高的中枢接收了讯号后便意识到了所熟悉的紧张感。

如果说快感区的兴奋增强了性紧张的话,那只有一种假设可能成立,即这些快感区早已与这些中枢建立了解剖学的联系,从而增强了兴奋的强度。性紧张达到一定水准后便产生性的动作,否则就刺激了性物质的产生。

这种理论虽被接受，它适于成年男性的性活动，然而却无法解释下列三种情形，即孩子、女性与被阉割的男性。在这三种条件下，都不存在性物质的积聚问题，这便使得该理论的应用陷入困境。不过还得承认，这一理论的某些方面也许还适用。

内生殖器的重要性对阉割后的男性的观察表明，性兴奋可独立于性物质的产生而达到相当的程度。阉割手术虽旨在对力比多加以限制，然而结果却往往不尽然。

男人们早就知道，被疾病剥夺了男性性细胞的病男人，虽然已无生育能力，但其力比多与性交能力却未受损害。

化学理论性腺移植实验，包括动物睾丸与卵巢及人类中两性间的移植，多少使性兴奋的起源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也使性物质积累的重要性有所消减。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表明，青春腺也是双性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高等动物的双性理论便获得了解剖学基础。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的甲状腺对性的作用与这种新的生物学发现是吻合的。因此，可能的情形是，性腺的间隙部位产生了特殊的化学物质，然后被带入血液系统，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某些部位的变化，形成性紧张。

性兴奋如何由快感区的刺激引起？纯粹的毒性刺激与生理刺激在性过程中会起什么样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在假设的层面上，也非我们目前的知识所能及。我们要执意坚持的无非是性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即性代谢所产生的特定物质。

在原始自恋期，当对象出现时，爱的第二个对立面——恨——也获得了自身的发展。正像我们已看到的，对象最初是由自我保护本能将其从外部世界带入自

我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引入外部刺激的同时，恨也表现为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一种关系，毫无兴趣起初为恨或不喜欢的先导，现在则变成了恨或不喜欢的特殊情形。

外部世界、对象及所恨的事物似乎在一开始都是相同的，如果对象后来变成了快乐之源，那便被爱、同时也会并入自我之中。我们已注意到，正像爱与毫无兴趣的对立反映的是由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一样，爱与恨的对立则重新产生了快与不快的对立，并与第一种对立相联系。当纯粹的自恋阶段让位于对象阶段时，快与不快才代表了自我与对象的关系。

如果对象变成了快乐情感之源，一种动机便产生，使对象靠近自我，并使对象与自我一致起来。可以说，提供快乐的对象具有吸引力，并说我们爱那个对象。相反，若对象引起了不快的体验，主体便会努力增大对象与自我间的距离，并通过对刺激的消除重复对外部世界的逃避。我们感到了对对象的厌恶，我们恨它，这一仇恨此后会发展为对对象的进攻倾向——毁掉对象。

我们意识到，爱和恨的态度并不能用于解释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而只应用于解释整个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但是，若考虑到语言的用法当然这并非毫无意义，我们便会发现，爱与恨的意思具有更大的局限性。我们并不能说，若某一对象满足了自我保护的利益，我们就爱它。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它，或许用降低了爱的程度的语言家喜爱、喜欢或感到惬意表达与对象的另外不同的关系。

我们并不习惯于说，某一单个的性本能爱其对象，而是将自我与其性对象的关系视为最适于用爱去表达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恨一词时，并未出现与性快乐和性功能的亲密关系。不愉快的关系似乎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关系。

自我仇恨对象、憎恶对象，并试图毁掉任何带来不快情感的对象，而根本不考虑它们意味着性满足的受挫，还是自我保护需要满足的受挫。

我们发现，在我们看来内容上呈现彻底对立的爱与恨，绝不仅仅是这样的简单关系。它们并不是由原有共同物的裂变造成的，而是具有不同的根源，并在愉快与不愉快的关系影响之下形成对立之前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

现在剩下的问题概括起来便是我们所知道的爱与恨的起源问题。爱源于自我，以自体性欲的形式满足其本能冲动的能力，这必须通过器官快乐才能实现。它起初是自恋的，然后指向对象，这一对象被引入扩展的自我之中，它将该对象作为快乐之源，表现出趋于对象的动机力量。它与后期的性本能活动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这些性本能被彻底合并，它才完全与性冲动相统了爱的预阶段以区域性性目的的形式出现，而性本能的发展却是复杂的。

拿对象的关系来说，恨要早于爱，它源于自恋性自我通过排出其刺激，对外部世界进行原始否定，同时作为对对象引发的不愉快的反应，它总与自我保护本能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性及自我本能随时都可形成对爱与恨重复的对立。

爱的起源史与其它事物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爱为何经常表现为一种矛盾，比如，伴随着反对同一对象的仇恨冲动。与爱混在一起的部分也源于爱的预阶段，此时爱尚未处于超越一切的境地，同时部分地建立在自我本能对对象的毁灭反应之上，从自我利益与爱的利益经常冲突的角度上看，这种毁灭反应可在真实短暂的动机中找到根基。

在这两种情形中，男人们都会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当与某对象的爱关系中，断之后，总是有恨代替其位，于是我们便形成了爱向恨转化的印象。这一情形导致了下列观点：具有自身真实动机的恨是由于爱退回到施虐的预阶段的结果，于是，恨便有了性欲特征，爱关系的持续便有了保证。

爱的第三个对立面，即爱转化为被爱，是对主动与被动两极关系的反应，对它的判断如同判断窥视癖与施虐狂的情形一样。

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本能变化的基本特征源于本能冲动对主导、心理生活的三种强烈对立物的服从。就这三种对立物而言，可将主动——被动描述为生物性的，自我——外部世界为真实的，而愉快——不愉快为经济的。

从前，“自体性欲”主宰了性本能，如今性本能则发现了性目标。于是，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本能与相互独立的快感区的活动便以寻求特定的快乐作为唯一的性目的。

对男人来说，新的性目的表现为精液的释放，当然，这与早先寻求快感的性目的并不相悖。相反，最大的快感是在性过程的最后动作上实现的。此时的性本能已臣服于生育功能，也就是说，开始具有利他性。

人们都知道，生物体必须做出新的组合和调整才能实现新的复杂机制一样，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就可能出现病理现象。

性生活中的任何病理现象都可视做发展受到抑制的结果。我所描述的过程的起点与终点已清晰可见，过程的许多中间环节我们并不清楚，所以说难解之谜还是很多的。

青春期最显着的变化，也是它的根本，便是外生殖器的明显生长。同时，内生殖器的生长也足以使它释放精液，也就是说可以制造新生命了。所以，一个十分复杂的器官已准备就绪，只待进行必要的活动。

性兴奋会引起紧张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解决但对理解性过程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尽管心理学家对此仍众说纷纭，但我仍坚持认为，这种紧张感带有不愉快性。

对我而言，最具决定性的事实是，这种体验总是伴随着改变心理情景的冲动，其急切的活动方式完全有悖于快感。

如果不考虑性兴奋的紧张感，并认为是不快活，那就与它快感的事实不相符了。在性过程引起的每一种紧张之中都有快感相伴，即使在生殖器的准备过程中，某种程度的满足感也清晰可见。这种紧张的不愉快与快感又是如何相安共处的呢？

任何一个涉及到愉快与不愉快的问题，都是今日的心理学所无能为力的。我的目的旨在从我们现在的讨论中了解到尽量多的东西，但我不会触及问题的所有方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快感区是怎样适于这种新的安排的。它们在引发性兴奋方面必须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眼睛也许离性器官对象最远，但在追寻性对象时它却最常受到特定兴奋质的刺激。这种刺激一方面有快感相伴，另一方面又会引起性兴奋的增强，或使性兴奋产生。

一方面快感从准备性变化中产生并有所增强，另一方面性紧张也会增强。若这种紧张不遇有快感的继续产生，便会转向明显的不愉快。如果一个并未性兴奋的男人的快感区（如女性的乳房）被抚摸，那么快感就会产生，它同时又会要求快感的增强。

问题是一种快感体验怎能会引起更大的快感需要。前期快感的机制快感区在此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情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们均是通过适宜的刺激引发一定程度的快感，快感则引起紧张度的增强，从而为性行为的完成提供必要的能量。

男性对性行为的认识

男人的对自己的性行为的认识是粗犷的，当男性和女性的胸部接触时，即阴极与阳极接触时，就形成了一个圆点，能量可以移动。只有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圆点。

如果你们并不相爱，那就只有性中心的接触，一个阳极接触一个阴极。你们之间能量的交换只是线性的，不能构成一个圆。所以少了爱，你永远不会觉得满足。没有爱的性变得微不足道。性行为很简单，爱的行动却复杂得多。性行为纯属生理——两股能量接触、扩散。

在只有性的场合，男人觉得受挫折，你浪费了能量，一无所得。只有在圆出现时才会有所得。如果完整的圆出现时，伴侣双方都会在性行为后变得更精力充沛、更有生气，经过充电、有更多能量在体内流转。

如果纯是性行为，伴侣双方都会觉得精力流失。他们失去了能量，因为他们只觉得衰弱，所以紧接着就要睡一觉。在这种单极接触中，男人的接触比女人要大。

所以女人才能当妓女，因为阳极是男人而阴极是女人。能量从男人流向女人，却不会循反方向流回来，所以女人一夜之间可有二十到三十次性行为，男人是不行的。男人给女人，女人再将它传回来，这有互惠作用。

男人总是喜欢立刻进入女人。他对前戏没有多少兴趣，他的阳极总是跃跃欲试。但女人总是不情愿在没有前戏之下立刻开始性行为，因为他们的阴极还没有准备好，它不可能准备好。除非男人从乳房开始表示对女人的爱，阴极就不会准备好。男人认为性行为很简单，为什么要费时间呢？立刻进入女人，他几分钟就可以完事。

女人总是渴望情男人抚摸他们的乳房，爱她们的乳房，这是一种热切的渴望。只有在她们的乳房变得贮满能量，她们磁场的另一极——阴极——才会有反应，然后她们才能配合，然后她们才能参与，才会融化。

女人子对他们的丈夫是如此不满意，并不是因为男人不爱她们，而是因为他

们爱的方式错了。他们不认为女人的生存方式有何不同，他们的身体反应的方式跟他们正好相反。一般男人很少按步骤做爱。两人本来坐着，忽然之间他们就开始做爱。一切都突如其来——这对女人而言是太突然，对男人而言并不突然，因为男人的精力是一种不同的精力，而男人的快感比较局部。

女人的快感比较整体性，她全身都沉浸其中。因此除非有前戏，否则女人永远无法深入其中。女人保持冷漠时，男人的高潮经验只是局部的，局限于性器官。它不会到达他的灵魂，他不会到达他的全身。他的身体的细胞和神经不会颤抖。那是很贫乏的，非常贫乏。那是一种解放，一种解脱，却不是一场高潮的经验。

虽说性很美，但高潮却很丑陋。

当性成为大脑的活动，当性进入您的思考，它就成为快感。要知道思考不是性的中心，性不属于思考的功能之一。但当性透过思考出现时，它就变成了快感。你可以想到性，你可以幻想性，你想的越多，你的幻想就越多，你惹来的麻烦也越大。

西方男人对性有太多幻想。西方的性就是透过幻想，东方的性却是透过压抑。两者都丧失了享受性的自然能力。两者都经由不同的途径变得病态。西方的病症是把性幻想成生活的最终目的，东方的病症是把性当作神人之间最美的鸿沟。

性不是最终的目的，也不是最大的鸿沟。性像饥饿口渴一样，是一种简单的现象。男人注意女人是否得到满足，如果她不满足，就是他的缺陷：他不够十足的男人。

当你开始自觉不是十足的男人时，你就走错方向了。你会开始变得忐忑不安；你会失去自信。女人也不断注意她是否带给男人满足。

如果她觉得男人不满足，或者她觉得男人并没有得到全世界到处宣扬的狂

欢，她就认为自己失落了些什么。

现在双方都感到困扰，爱的美好行为就此毁灭了。这些其实都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家做爱做的太多了。他们几乎把它变成了例行公事。性可以保健的观念来自医学界权威男人。如果你不天天做爱，就会出问题。现在他们说，如果你做爱次数不够，甚至可能引发心脏病。

一般男人把他们所谓的做爱重复了太多次，因为他们始终不觉得满足。

一个十分在意时间的男人，也会在性行为上十分匆忙，好像时间是浪费掉了一样。我们不但喝即溶咖啡也要求速成式的性。咖啡不成问题，但速成的性却是胡闹。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它不会成功，也不是你能赶的来的。赶时间只会毁了它；你会错过重点。享受它，因为你会从它得到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感。如果你赶时间，就不会获得这种永恒感。有时会发生另一个男人的能量不能使你激动的情形。

应该明白，他对此无能为力，你也无能为力；该发生的事就是没有发生。自然的过程中，一个男人该去找别的能打动你的男人。但社会、文化、宗教、传统，这一切都构成阻力。也有时候，尽管我们不觉得被吸引，却紧紧抓着彼此不放；这样觉得方便、舒服。有一个你们两个男人都爱的孩子，情况会变得更复杂。如果一直压抑下去，你会感到愤怒。你可能会表现出来，也可能不表现，但愤怒会一直在那儿变成恨意。

有时如果你刻意要勃起，你的意志反会变成阻力。你不能靠意志，那不是你的意志所能左右。如果你硬要左右，你会发现自己变得完全无能。如果有问题的念头在你心里生根，你的麻烦就大了。

如果成功固然很好，如果勃不起来，也一样很好。这不过表示身体在这时候没有兴趣，身体这时候不想要。只要听身体的话，随它的意，让爱成为你特别的，

它本来就不同凡响，而许多男人总是选错了时间。

女人吸引男人，她看起来很美，他爱上女人，女人几乎变成他的沉迷，问题就是这样升起的。每一个女人都感觉到他依靠男人，那个感觉使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反应：他试着把女人当成奴隶、当成心理上的奴隶来驾驭她，他同时害怕，因为她很漂亮……她的漂亮并不只是对他而言，而是对所有跟她接触的人都很漂亮，因此在自我主义者，在男人的头脑里面，就升起了很大的嫉妒。

当你想支配男人，攻击当然是最佳的防御。在防御当中，你已经失去了立足点，你已经接受你自己是挫败的一方，你只是在保护你自己。

男人谴责女人，他们必须谴责女人，因为这样的话，女人才能够受男人的控制，他们几乎将女人贬成次级人类，男人到底有怎么样的恐惧才会这样做？因为这简直是偏执狂……男人继续跟女人比较，然后发觉女人比较优越。

比如说：在跟女人做爱的时候，男人非常差，因为他一次只能有一个性高潮，而女人至少能够有半打的性高潮甚至连串的、多重的性高潮，男人只是觉得全然无助，他无法给女人那么多性高潮。

这产生出世界上最不幸的事情之一：因为他无法给女人一个多重的性高潮，所以他试着连第一个性高潮都不要给她，那个性高潮的滋味对他来说会产生危险，如果女人知道性高潮是什么，她一定会觉知到一个性高潮不能够满足。

相反，她会变得饥渴，但男人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最狡猾的方法是不要让女人知道世界上有任何像性高潮的东西存在。一旦你进入意识能量的领域，你就开始具有人生最美的经验，最轻盈的、最多采多姿的、最富有诗意的、最具有创造性的。在一方面，就身体、头脑、和世界而言，它们给你成就和满足感。在另一方面，它们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神圣的不满足，因为你所经验到的是伟大的，然而，就是那个经验使你确定，根本没有什么原因，它就能够使你确定，此外，

一定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经验。

在你知道任何关于性高潮的事情之前，你从来没有梦想过它，现在你知道了它，这将成为一个进一步追求的动机，是否有任何更甜美的、更喜乐的东西能够传递给你？是否有任何比迷幻药能够传递给你的更神奇的经验？它是进入性高潮经验一个简单的洞见。

到底发生了什么？时间停止了，思想停止了，那个“我”的感觉不复存在，只有“是”的感觉，它是纯粹的、存在性的，但是没有自我去执着于它。

几个世纪以来，有许多男人都不知道性高潮，因为女人也不知道性高潮，她也不应该认为男人的情况会比较好。不给女人性高潮，他也必须丧失他自己的性高潮。

女人丧失了某种地球上非常美、非常神圣的东西，而男人也丧失了某些东西。性高潮并不是女人强而有力的东西。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女人都比男人多活几年，她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五岁，那意味着她有更多的抵抗力、更多的体力，女人比男人更少生病，即使女人生病，她们也恢复得比男人快，这些都是科学的事实。

爱有它本身的力量，比方说将一个小孩子带在子宫里九个月需要力量、需要体力、需要爱，这是男人做不到的。一个男人造的子宫能够放进男人里面，现在最新的科技已经在研究是否能够将一个塑料的子宫放进男人里面。

在过去几千年里面，男人打了多次仗，这也是力量，但那不值得男人类所拥有，那是从我们的动物性遗留下来的力量，它属于过去，而过去已经不复存在。男人必须学习如何去爱，男人必须学习如何让心成为主人，而让头脑成为一个只是顺从的仆男人，男人必须去学习这些东西，而女人天生就具备了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将所有这些事情都谴责成虚弱的，即使你把一个女人当成伟人，你也能够

看到你以什么标准来选择，其实你是在选择一个男人，因为你选择了那个女人里面的男人品质。

男性大男子主义

男人是女人所造就出来的，那是一个恶性循环，女人具有跟任何男人一样的智力，因为智力跟性荷尔蒙无关，你以为如果你动手术将爱因斯坦变成一个女人，他就会丧失他的聪明才智吗？他一定还会保持是一个爱因斯坦，但具有女人的身体，不同的只是身体，而不是意识或智力。

很不幸的是男人决定去压抑女人。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直不了解，为什么它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发生？但是最近的心理学研究使它变得很清楚，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男人与女人比较而感觉到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那个感觉的根本原因来自女人有变成母亲的能力，她是生命的源泉，她创造生命，而男人却不行。这变成去切断所有女人翅膀的原因，切断她们的自由和受教育的机会，将她监禁在一个类似监狱的家，将她贬为生孩子的机器，好让人能够忘掉他是比较低劣的，女人必须被弄成比较低劣，这样男人才会感觉比较舒服，这样他的自我才能够感觉根本没有在跟女人竞争。所有女人的抱怨和怨恨的原因并非在于女人本身，几千年以来，你们都一直在折磨她。

为什么女人没有反抗这一类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它还是那个母性的问题，当她怀孕的那九个月里面，她变得完全依靠，尤其是在一个打猎的社会里。

要记住，在目前所生活的社会，这个有房子、有城市的社会，是女人的贡献，而不是男人的贡献。

男人在打猎，女人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空间，这是很自然的，她就开始装饰它、清理它，使它变得更漂亮，变得更适合居住，然后她就变得执着。在一个打猎的社会里，游牧民族必须一直迁徙，当打猎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他们必

须迁到有动物的地方，他们不能够有永久的城市，他们只能够有帐篷不是家。当一个男人单独生活，他的家几乎就像一个帐篷，而不像一个家。没有女人的话它仍然保持是一个帐篷、一个暂时的地方，只是一个庇护所，而不是什么神圣的，当女人进入，帐篷就开始变成房子，而最后变成一个家。

在打猎的社会，女人的功能只不过是繁殖，她一直在怀孕，这变成她的失败，她不能够打仗，她不能够反对，她必须顺从，她必须屈服，当然她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奴隶。

大男人主义态度在伤害男人。那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反应，你必须注意观察那个反应，好让它能够消失。它使你失去尊严，它显示出某种关于你的东西，而不是关于女人的东西。那是你的愤怒，那是你的恨。

在所有的宗教里，女人不能被接受当成意识最终成长的候选男人，并非有其它原因，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她的罪恶就是她是一个女人，她能够发展，但是她必须先满足一个条件：她必须先被生成一个男人。

社会是男人所建立的，女人生活在一个不是为她们建立的社会里，一个不是由她们建立的社会里。社会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她们。你对女人的愤怒是值得加以了解的，或许它真正的内涵是你对你自己的愤怒，是你对人的愤怒。

女人一直都是牺牲品。在家里，先生是牺牲品，我们毫无疑问可以说，每一位先生都是怕太太的。事实上，每一位聪明的先生都必须如此，只有一些白痴或许不是如此，但这是几千年来男人对女人所作所为必须付出的代价。

女人的自由也将会是男人的自由。当女人被接受成平等、被给予平等的机会成长的那一天来临时，男人将会发现他突然免于女人一贯的抱怨和憎恨。

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处于一种很深的爱的拥抱之中，女人会立刻闭起她的

眼睛。当你吻一个女人时，她会闭起她的眼睛，但男人会看着他自己在吻那个女人，看着那个女人在被吻，看着她的反应，密切注意着看看她有没有达到高潮。他多多少少保持是一个局外人或一个旁观者，他对观看比对融入更有兴趣，而女人只是闭起她的眼睛，她比较少去顾虑男人，以及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她比较顾虑内在的感觉，以及内在的发生。

女人对色情画没有兴趣，她们真正的兴趣在于她们内在的过程。这些差别非常大，因此它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形态。

女人对外在比较不那么有兴趣，当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她会觉得是单独，而不是孤独，她比男人更能够享受她的单独，因为她比较内在指向。就某方面而言，她比较自私。在此，我是以一种非常正向的意义来使用“自私”这个字，她是自私的(利己的)，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如果男人很孤独，他就会自杀，婚姻对他来讲是必需的，在很多方面，他都需要女人。首先，她能够给他归于尘世的感觉。女人非常世俗，她跟尘世连结在一起。在世界上所有的神话学里，她都代表尘世。

女人给男人根，来进入尘世。如果没有女人，他就没有尘世、没有根，只是悬在空中。女人给他一个巢，对他来讲，女人变成一个家。如果没有女人，他是没有家的，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是一块到处漂流的木头。

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痛苦，一定会有经常的唠叨，那是避免不了的，因为他们是相反的两极，他们的兴趣从来碰不在一起，因此女人必须唠叨，否则男人永远无法满足她的欲望，而男人必须让步。

只要稍微聪明一点，男人就能够了解：最好是听她的话，否则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盯着你，不会让你有任何休息的机会，最好是按照她所说的话去做，然后了结，好让你能够安心看你的报纸，一切的唠叨和一切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因

为女人满足了一种非常深的需要：她使你跟尘世连结，她照顾你的身体。她对你的灵魂不太关心，那个她留给你自己去思考，也是她滋养你的身体，她滋养、她关心、她爱，她使你觉得被爱、被需要，她给你一种很深的满足，如果没有她，你就不知道你是谁，如果没有她，你一直都是一个走失的小孩，她可以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你。结了婚的男人比没有结婚的男人来得更快乐，它不应该如此，因为没有结婚的男人没有问题，而结了婚的男人必须面对很多问题。

按照逻辑推理，结了婚的男人比没有结婚的男人来得更快乐，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但生命并不按照逻辑，生命有它本身奇怪的方式。没有结婚的男人没有根、没有滋养、没有温暖，他是冷的，他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他会继续萎缩。

在经济上女人必须依靠男人，这是男人的慰藉，如果他依靠她，她也依靠他，它是一种补偿和一种慰藉。就政治上和社会上而言，她被丢出了社会，她被迫待在家里，好让男人能够觉得：“不是只有我必须依靠男人，女人也必须依靠我。”这是自我的一个心理策略，这是男性自我的一个心理策略，否则，如果女人被给予全然自由——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自由，那么男人跟她相比一定会显得较差。

在母性社会里，男人是较差的。地球上还存在着少数以母性为主的部落，那些部落由女人来掌权，在那些部落里，女人比较强，对她们自己比较有自信，而男人是弱者。男人的需要比较是在生理上的，而女人的需要比较是心理上的。

在婚姻关系里，女人总是觉得好像她被剥削了，而她的感觉是对的，因为男人的兴趣是属于性的，而女人的兴趣远比男人的兴趣来得更整体性，它并非只是属于性的，性或许只是那个整体性的一部份。

男人的兴趣基本上是属于性的，其它每一件事都只是装饰性的，而不是主要的。他对性具有持续的需要，简单的理由是：他们的性欲非常不同。男人具有局

部的性欲，他的性局限在生殖器官，它并没有散布在他的整个身体。而女人的性欲是整体的，她的整个身体都是性的，它并非只局限在生殖器官。

女人在真正进入做爱之前需要有较长的挑情，而男人总是急急忙忙，他的爱只不过是一种打了就跑的事件，女人甚至都还没有热身，男人就在穿衣服要走了，男人已经办完事。他的性欲局限在生殖器官，女人比较整体性，她的整个身体都具有很深的性欲在里面，除非她的整个身体都涉入，否则她无法达到高潮经验。如果她无法达到高潮经验，她就会变得对性没有兴趣。因此太太们对性没有兴趣。

对男人来说，性并不是一种心灵的现象，而只是一种生理上的发泄。对女来说，它是一种心灵的现象，因此女人总是觉得被冒犯了。除非在这个伟大的心灵经验当中有爱的发生来做为它的一部份，否则她无法在这件事上配合，这是男人的一种冷淡方式，也是大男人主义的真实表现。

人类学家再三研究发现，无分种族部落，无分古今，都会举行一些看起来完全违反理性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仪式，以便使男性变成男人。他会发现男人受鼓励打架、喝酒、闹事、保卫他们的荣誉，永不止息地奋斗，为了证明自己的丈夫气概，不惜冒丧命或残肢的危险。他会发现土耳其一个小岛上的男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必须驾独木舟进入鲨鱼出没的海域，从事毫无意义的冒险。

从人类的生命周期来看，每个男人至少要经过四次主要的成长仪式：出生、成年、结婚、

死亡。生命开始与结束的仪式，由那些比当事人先出生或晚辞世的人负责，自己反而无法负责。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我们摆脱异性以学习自身性别的秘密，和透过婚姻再度与异性结合以创造新生命的两种仪式最重要。

近代社会证明，女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男孩只有在摆脱她，进入一个纯男性的世界后，才能发展出男子气概。男性成年仪式的安排，本来就是让男孩逃

离女人的世界一段相当的时间，去发掘属于男人的世界的面貌。他们知道男人被女人界定的危险。两性必须先加以隔离，在他们对自身有独立的了解后才能结合。

不同的部落或文化，各种由男孩迈入男人阶段的典礼仪式也各不相同。

原始社会的生活包括出生、命名、青春期、结婚、下葬等，这类仪式极为严格而正式，强调彻底的隔绝，使参加者的心智能完全脱离前一阶段人生观、生活方式。紧接着是一段较长期的隐居，这期间举行的仪式，目的在于为生命的探索者介绍新环境，教导他因应的方法，最后当时机成熟，受启蒙者就如同获得新生一般，重回到正常生活之中。

第一步脱离。使男孩成为男人的文化使命，就从切断母亲与儿子的联系开始。婴儿时期，母子连心，犹如一体，但到了某个阶段，通常是在接近青春期时，不论是否已有充分的准备，男孩就被粗暴地从宽大慈爱的母亲怀中偷走，丢进只重勇武的男性社会。

男人脱离女人的世界时，免不了要经历某些痛苦的考验，使这种经验更为鲜明。施予启蒙者身上的大小酷刑，予人的感觉犹如一页虐待狂的日记：在唇上穿孔、割肤、把牙齿磨平或干脆敲掉、打烙印、斩断手指、切除一枚睾丸、咬噬、切割包皮、独自囚禁、长期放逐荒野中、冬夜裸体睡在户外等。男孩往往奉命到林中去宰杀一头危险的动物一或名敌人，以证明他的勇气。

平原族的印第安人则利用断食、守夜、迷幻药等来提升对超自然的感知能力及个人的灵见。一个部落或种族作战的机会越多，男孩的启蒙仪式越严酷。在这样的文化里，启蒙仪式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平民男孩变成军人。男人的生涯就是战斗生涯，做一个男人必须能毫无怨言地承受痛苦，杀人不眨眼、视死如归。

有些部落创造出来的男子汉，必须割除乳头，因为乳房是女人的专利。新入门的战士学会轻蔑女性的生活方式，排斥他透过肌肤接触从母亲那里学得的感官

之乐，否定自身的一切女性化部分。为什么说男性化与痛苦会结合在一起？我们仔细观察典型而原始的割礼，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做一个男人，就必须丢开讲究自然，追求肉体和感官愉悦的女性世界，在身心上都向注重文化、权力、职责的男性世界屈服。男孩子在出生第七天或青春期接受割礼，间接的信息就是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整个部落。

为了明了男性心理，解开男性对暴力着迷的情结，打破男女在爱欲苦海中互相虐待，让性别之争告一阶段，我们该设法了解传统上构成男人性格核心的那道原始创痕。

割礼虽未普及全世界，但也算相当普遍，它可说是男孩变成男人最具象征性的一种过程。

如此原始而野蛮的仪式，在医学证明它没有必要，会带来痛苦且危险之后，仍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广为流传，可见神话威力，它的真正意义深埋在潜意识之中无法拔除。照理应该会很疼爱出自己儿子的父与母，都不愿对这种野蛮的行径加以省思或阻止，也可见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整个社会的刻意掩饰下，运作不息，大家都不愿正视这种有系统地施加在男人身上的酷刑，却承认它是达到男子气概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你的神经够坚韧，请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换成你在强裸之中，每一寸肌肤都对外在的未知世界极其敏感，包括你用嘴唇探索母亲的胸房的举动，都散发着热切的求知欲。突然之间，一名男性把你抓出母亲的怀抱，压住你动弹不得，割去你阴茎上一段最柔嫩的皮肤，用石力或用现代化的外科手术刀其实并无区别。试想你的肉体和你的生命所受的冒犯，不必用割除包皮不会痛、伤口会很快痊愈、痛楚会很快忘怀等谎言来安慰自己，男子气概的真谛就永难忘怀地镌刻在你的身体上，埋藏在那道象征意味浓厚的疤痕里。

成年仪式中的残酷成分，或许可以解释成父亲对儿子的一种潜意识的仇恨，但更合理的解释是，痛苦可视为一种象征，男孩在内心上变成了男人，在外表上，也必须留一个记号为证。一个社会的成立，需要每个成员牺牲个人的意愿，所有考验、折磨、羞辱带来的痛苦，都以打破个人意识，用部落意识取而代之。

有史以来，凡是学做男人的男孩得到的教诲，那就是男子气概必须接受身体的受伤，必须牺牲感性与肉欲方面的天赋。男人经过刻苦、果断、思考抽象观念的训练，完全脱离了女人讲求自然的世界。

酷刑仪式使男孩与女人和自然疏离，最终的目的在于打破他幼稚的认同感，将他整个洗脑，以便灌输一套全新的自我认知进去。男性成年仪式的第二幕在崭新的男性子宫中进行，要把男孩塑造成男人。

在纯男人社会里，男孩学到文化的百科，未来好几个月，甚或好几年当中，他听到各种故事与神话，英雄与好汉的事迹，若干永恒的疑问的解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命运？我们该怎么做？男人与女人各扮演什么角色？他会成为某些男人的学徒，学习灵性的技能——仪式、诵经、主持典礼、治病等，实用的技能——使用工具、打猎、采集、播种等，以及社交的技能，如何为人夫、为人父、作战等，具备这些技能后，才能执行男子汉的任务。

在启蒙教育告一段落时，男孩会得到一件象征男子气概的信物——剑。

盾牌、羽毛冠、护阴套等。从此他有资格结婚，并分享成人的一切权利和责任。有时他还会

取一个新名字，象征他已晋任到男子汉的地位。他会通过男人历程的考验，赢得名望与尊敬，等到老年，他就能加入长老团，成为族中智能的泉源，年轻一代的启蒙师父，这是个圆满的循环。

从原始礼仪来看，男子成长仪式尽管残酷，却具有相当经济的社会与心理效用。它赋予男人和女人充分的认同感，让他们确切明白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男人不必询问：我算一个男人吗？我如何才能表现男子气概呢？男性启蒙仪式本身就是一桩社会大事，在特定的时刻，男孩经过一连串的仪式，然后被宣布成年，一夜之间，他的身分与社会地位就完全改变了。女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女性成年仪式往往也带有磨练的成分，也举行特殊的仪式，但基本上，女孩从初度月经来潮开始，就可视为女人。男孩成为男人是根据社会定的时间，女孩变成女人却是根据生理时间，纯出于自然，由月经决定。男女之间对时间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身体的体验、以及人格构造都截然不同，可说都肇因于这一根本上的差异。

男人握有世界的蓝图和一生的生活指南。他们不像我们饱受自我疑虑的折磨，他们没有性别上的困扰，男女的分寸泾渭分明，因此可以放心合作，组成拥有共同历史的社群，每个人都有归属感，这都是现代都市生活望尘莫及的。

缺点在于传统仪式妨碍了个人发展。部落社会为了确保全体一致，在任何时间都不许自由滋长。小男孩或小女孩接受启蒙后，童年立刻宣告结束，成熟期就此展开，青春期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根本不存在。

青春期是现代的新发明，是挑起负责担子前的一段缓冲期，给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一个进行反叛、游戏、实验的机会。在原始社会里，儿子被塞进父亲的模子，祖宗留下的规矩不容作丝毫更改，他们保存先人的信仰，奉行上一代的道德观，永远忠于世代相传的世界观。很多部落社会数百年不曾改变。当改变的压力降临时，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抗拒，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为捍卫古老的圣道而战，才配称是男子汉。

现在男子气概的性仪式，只是造成男女之间的误解，互相逼得对方要发疯。我们得到的教诲是，一到晚间就变成陌生人，说不同的语言。我们彼此抱着不可

能实现的期望，得不到满足就互相仇视和埋怨。

任何社会的男性成年仪式，都与主宰这个社会的神话契合。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我们的价值观与对现实的定义，都建立在经济之上，金钱是一切的基础。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权力，权力推动整个世界。

封建时代里，男子气概代表身为领主、族之长、或至少有片土地可资耕作。但产业革命以后，男人逐渐脱离大自然、家庭、教会与社区，转而从各种职业或技能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女人则仍以照顾家庭或在社区中从事慈善工作为天职。渐渐地赚钱与花钱成为最重要的事，几乎完全取代打猎、耕种、采集、主持仪式，成为男子气概的特征等古老活动。

两性战争这句玩笑早已不是玩笑，而是一种隐藏在彬彬有礼的面具下的心理现实。高离婚率、快乐的婚姻如此罕见、强暴案频传，无不说明了男女扮演社会期望的角色，启蒙仪式中受到的性创伤不容易治好。

男性对性道德的认识

无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任何社会，都有两种密切相联的主要成分：一是经济制度，一是家庭制度。目前，存在着两种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一种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源于经济的，另一种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源于性或家庭的。

我不想把经济或性确认为首要因素，因为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的主要责任是获得食物，但在那些仅为了个人利益而获取食物的人，食物的需要是微乎其微的，食物的需要是由于家庭的缘故。

社会的性道德将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积极的制度，例如一些国家的一夫一妻制和一些国家的一夫多妻制。在下一个阶段，法律没有干涉的权利，值得重视的是舆论。最后一个阶段只注重个人的选择，不管是在理论上抑或实际中。

在一个医学发达从而死亡率很低的地方，和在一个瘟疫猖獗以至大多数居民在成年之前就夭折的地区，答案也是不同的。当我们的知识日渐丰富时，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一种气候中最高尚的性道德和另一种气候中最高尚的性道德是不同的，而由于饮食的不同，性道德也是不同的。

性道德的影响多种多样，一个男人的、夫妻的、家庭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在某些方面，性道德的影响可能是好的，但在其它方面却可能是坏的。当我们研究某个特定的制度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以上各种影响，然后才可以对这种制度做出评价。首先研究一下纯粹属于个人影响的：这种影响是基于心理分析的。

这里要注意的不仅是一个人成年时由法律而定的行为上的影响，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男人壮年时所具有的那种服从法律的传统教育。我们知道，古时禁忌的影响是奇特而直接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显然要比另一些更有价值。

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性关系的主要成分是心理的，而不是纯粹生理的，这样性关系会更完美些。诗人所传授于受过教育的男女的一般意识是，如果进入性关系的人格外多，爱情的价值就会增长。那些诗人又教许多人根据爱的强烈程度来判断爱的价值，不过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有许多男人认为，爱应该是平等的，如果没有特别原因，多妻制并非是理想的制度。对此，我们既要考虑婚姻，也要考虑婚姻以外的各种关系，因为无论实行何种婚姻制度，婚姻以外的各种关系也将随着婚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

对于家庭问题，不同时代与地域，存在不同种类的家庭组织，但是父权家庭却要比其它种类的家庭更为重要，一夫一妻的父权家庭已经逐渐超过一夫多妻的父权家庭。自基督教产生以前，西方文化中性道德的主要动机，就是要达到这种女性道德的程度，没有这种道德，那父权家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将无法确定。

基督教对于男性道德的贡献，在心理方面是源于禁欲主义的。最近，这种动机更是由于女性的嫉妒而越发增强。女性的嫉妒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是很有势力的。然而，这后一个动机是暂时的，因为即使从表面上看，我们也可以断定，妇女想要的是一个能给予两性自由的制度，而不是一个让女性去束缚男性的制度，尽管在过去，被束缚的只是女人。

法律与性不同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律是在执行为社会所采纳的关于性道德问题的法律，另一方面，它也在保护性范畴中个人的普通权利。

后者具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方面保护女性和未成年男人，使他们免受欺侮和殴打，另一方面防止花柳病。但是，就纯粹的成效而言，这两方面都未能得到普遍的重视，因此，也就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

我们虽然进行过反对卖淫的运动，而且也为此通过了一些法律，但这运动是歇斯底里的，因为所通过的那些法律极易为职业犯罪分子所逃避，而且还提供了敲诈无辜者的机会。说到后一方面，那种认为花柳病是对一种罪孽的正当惩罚的观点，使我们不去采纳那些纯粹以医学为根据的方法。

人口问题是一个涉猎范围极广的问题，必须从许多方面加以探讨。有母亲的健康问题、孩子的健康问题、以及大家庭和小家庭在心理上对孩子性格的影响问题，这些可以统称为卫生方面的问题。

优生学的问题，即关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出生率和死亡率所产生的人种改良或退化的问题。在我们没有把上述各点完全研究清楚之前，我们是不能对任何性道德加以评定的。那些改良家和反动分子都有一种习惯，他们所看到的这个问题是片面的。他们很少能把私人观念和政治观念联系起来。

我们不能说这一点比那一点更重要，而且我们也不能预先确定：一个从私人

观念看来是好的制度，从政治观念看来也是好的，反之也是一样。我认为，在大多数时代和大多数地方，那些无形的心理因素已使人们接受了那些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残酷性的制度，而且在那些最文明的民族中至今仍有这种情形。

从历史方面来说，现存于文明社会的性道德有两种出发点。一方面是确定父亲身份的欲望，另一方面是禁欲的观念，前基督教时代的道德和远东道德，都是前一出发点的产物，只有印度和波斯除外，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禁欲主义传播的中心。

在落后的民族，确定父亲身份的欲望是没有的，这种民族不知道男性在生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虽说男性的嫉妒，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放纵。

总的说来，女人比早期父权社会要自由得多。

在这个时期，一定有过激烈的冲突，因为那些关心自己父亲身份的男人的自由受到制约。这时性道德只是为女人的。

男人也许不能与已婚女人同居，他却可以随意与未婚女人同居。

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出现了避免犯罪的新动机，道德标准在理论方面对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一样的，但它很难实行，当男人违反道德标准时，比女人违反道德标准更能采取宽容的态度。

早期性道德，具有一种纯属生理上的目的，就是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应当得到双方的保证，不是得到一方父母的保证。

这种目的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是没有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近代，我们才发现，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性道德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基

基督教的性道德不再像以前那样深入人心。宗教的正统性已经减弱，就连那些信徒也不再笃信了。

二十世纪出生的男女，下意识还保持着原有的态度。当然，他们已经根据他们的意识，不相信私通即犯罪的说法。性道德中那些前基督教的成分，由于某些原因，已经有了变化。一个原因就是避孕法的应用，这种方法使不导致怀孕的性交成为可能，它能使未婚女子不致有孩子，使已婚女子只从他的丈夫那里得到孩子。这一方法并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它并非绝对可靠，但避孕法用不了多久就会达到绝对可靠的程度。

虽然不能断言有婚外的性关系，但父亲的身份是可以保证的。男人们也许会说，女人在这一点上会欺骗她们的丈夫，

如果我们的问题是谁是父亲，而不是是否应该与所爱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欺骗的动机就会微弱了。对于父亲身份的欺骗也许仍有，但比起过去对于同居的欺骗则要少得多。

丈夫的嫉妒可能由于新风俗而适应新的情况，只有当妻子选择其它男人作为孩子的父亲时，才会发生在东方，人们对于太监的特权总是默许的，大多数欧洲人对此不满。东方男人所以默许太监，是因为太监不会给父亲的身份带来疑问。

将来即使女人不像过去那样克制性欲，父母双全的家庭还是会存在的。性道德改变的第二个因素，可能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这就是国家参加抚养和教育孩子的程度不断提高。迄今这个因素在欧洲比在美洲更起作用，主要是在雇佣劳动阶层中产生影响，雇佣劳动者毕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国家取代父亲，最终会要遍及全人类的。

在动物中，父亲的角色是提供保证。在文明社会中，保证由警察提供，抚养

则可能完全由国家提供，至少在最贫困地区是这样。如果真做到了这一步，父亲就不再有任何显着的作用。至于母亲，那将有两种可能。她也许继续她原有的工作，而把孩子交给国家照顾，如果法律能如此规定，在孩子年幼的时候，由国家付给母亲抚养孩子的费用。

如果采用了后一种，它可以暂时用来维护传统道德，因为一个不贞洁的女人，可能会被剥夺获取报酬的权利。如果她得不到报酬，她将无法抚养孩子，除非她去工作，把孩子寄托在某个幼儿园中。

在抚养孩子上，经济能力不仅取消父亲，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消了母亲，这是针对贫困的父母而言的。那时传统道德的一切理由都将消失，新道德的新理由将会出现。

如果幼儿园规模很大的话，它势必是极正统的，如果不同家庭环境互相影响，将会达到可怕的程度。除非事先建立一个国际政府，否则各个国家的儿童，都会受到残忍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将使他们成人之后，不可避免地互相残杀。

就人口问题来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国际政府，不然，那些民族主义者，肯定会促使人口的增长超过应有的程度，由于医疗保健的进步，解决人口过剩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

社会学问题是复杂的，但个人问题却是简单的。

关于性是万恶之源的学说，对个人性格产生了极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始于童年而终于死亡。传统道德把性爱打入十八层地狱，破坏了一切友情，使人们变得吝啬、残忍。无论我们最终接受哪种性道德，它必须是不带迷信成分的、得到公认的。

性不能没有道德，这正像商业、体育运动、科学研究和其它人类活动，不能

没有道德一样。性并不需要那种无知之人所提出的古代禁律为道德。在性问题上，与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一样，我们的道德至今仍被恐惧所支配。

那些主张改革道德的人，就像苏格拉底，总是被指责犯有毒害青年的错误。这种指责并非毫无根据，他们所主张的新道德被完全接受之后，将会产生比他们所要改革的旧道德更美好的生活。

了解东方伊斯兰教的人都说，认为一天祷告五次没有必要的人，也不会尊重我们视为更加重要的道德。一个对性道德提出改革的男人，很容易有这样的误解。

新道德区别于清教主义传统道德的主要原则是：我们相信本能应当受到引导而不是压制。只要我们提出这个原则，很快就会赢得现代男女极为普遍的赞同，想让这个原则充分发挥它的效力，就非得充分理解它的含义，并付诸实践。

在童年时代，如本能受到压制而不加引导，在一生中，本能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我所主张的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对青少年说：“服从你的行动，为所欲为吧。”生活中必须有一致性，对于那些不能立即产生利益，并非每时每刻都具有吸引力的事情，不能放松努力，必须考虑别人。

我不认为自制应当成为目的，我希望我们的道德习惯，压缩到最低限度。使用自制就像使用火车上的制动一样。如果你出了正轨，自制就是有用的，如果你仍在正轨上，自制就只能是有害的，没有男人会主张火车行进时使用制动。

错误的自制习惯，也会对那些导致有益活动的精神产生不良影响。自制会使这些精神主要耗费在内心的斗争上，而不是消耗在外部的活动中。

男人一生需要自制的程度，取决于本能在童年时代的待遇。

孩子的本能既能产生有益的活动，也能造成有害的活动，这就像火车头上的

蒸汽一样，它既能将火车送达目的地，也能使火车出轨。教育的功能就是把本能引导到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方向上去。如果这一任务能在童年完成，他们一般都能够过有益的生活，而不需严格地自制。

如果早期教育的内容只是限制本能，在以后生活中，由本能所产生的一部分行为，将会成为有害的，这些行为应该受到约束。

人们所以要用特殊的力量去压制性冲动，一方面是由于性行动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传统道德使性冲动成了特殊的事情。

大多数传统道德家认为，如果我们的性冲动得不到严格地控制，它们就会变得轻浮、混乱和粗俗。他们认为，有些男人虽然在童年时代具有一种约束，但以后却企图摆脱这种约束。这种男人即使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那幼年时代的约束力仍会在他们身上起作用。

所谓良心，就是盲目地和无意识地去接受儿时所得到的戒律。这种良心使男人觉得，凡是传统风俗禁止的行为都是错误的，这种感觉在理智上具有完全相反的信念的情况下，仍会继续存在。

现代男人，开始不同程度地反对传统说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反对者在理智上承认，儿时所得到的那种道德是正确的，但却总是忏悔说，他没能鼓起足够的勇气，依从这道德的真理去生活。对这种男人，最好还是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的信仰，使两者一致起来。

第二种男人的表现是，他的有意识的理智虽然反对他儿时的那些观念，但他的下意识还是把它们全盘接受。在强烈情感的作用下，这种男人会突然改变行为。一场重病或地震会使他一反常态，放弃他的理智信念，突然相信他儿时的信念。

要使新道德取代旧道德，就必须接受那种新道德，而不只是形成意识思想的

一部分。对大多数男人来说，童年时代所得到的都是旧道德，很难对新道德做出公正的评价。

性道德应该有一些普遍原则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男人们的意见是相同的，尽管男人们对于这些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各有看法。男女之间应当有而且是真实的爱情，这种爱情应包括双方的全部个性，并把它们溶为一体，使双方都得到充实和提高。

孩子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应得到充分的关心，这两条原则虽然看上去普通，但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却使我不赞成传统道德进行的某些修改。许多男人的婚姻缺少真实而深切的爱，如果他们在童年时代少一点忌讳的束缚，这种爱情是完全可能产生的。

他们缺少必要的经验，即使有这种经验，也是通过秘密的方式得到的。由于嫉妒得到道德家们的赞许，男人们认为应当互相监视。如果夫妻绝对相爱，彼此毫无不忠之心，那是最完美的。即使不忠之心真的存在，也不应当看成是一件可怕的事，两性之间还应该存在友谊，美好的生活不可能建立在恐惧、束缚和干涉自由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以上因素，我们仍能保持忠诚，那当然很好。如果我们觉得保持忠诚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彼此就应该谅解。即使具有肉体上的忠诚，相互嫉妒所造成的婚姻不幸，也往往比相互深信对方所造成的不幸要多。

许多自认为道德高尚的男人，把父母对于孩子的责任看得太渺小了。在父母双全的家庭，只要有了孩子，父母就有责任全力保持和谐的婚姻关系，即使这需要自制。

我们所需要的自制，不是传统道德家们所提供的那种自制，我们必须控制妒忌、暴躁、专横等冲动。父母之间的争吵是造成孩子神经错乱的原因，我们应当

极力避免这种争吵

如果一方或双方缺少自制力，在孩子面前避免冲突，那这种婚姻还是解除为好。那些提倡更大自由的男人所希望的事情，不可能马上变为现实。那些成年男人甚至青少年，可以任意发泄那些由道德家们所造成的受到损害的冲动。

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阶段，他们的孩子也会像他们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心理解析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它发现童年时代的束缚和恐惧会产生恶劣影响，消除这一影响需要长时间的心理治疗。这适合那些精神病患者，也适合大多数表面正常的男人。美满婚姻的本质，是彼此对人格的尊敬，以及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亲密关系，这使得男女之间的真正爱情，成为最美好的事情。

复杂情感精神之爱

对于男人来说，真爱是人间最大的幸福，但幸福并非是爱的全部体现。

爱把欢乐和赞美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先前的分离便没有后来的合一。一旦双方完全地融为一体，爱同时也走到了尽头。

爱的运动犹如潮水，高潮过后必然会有落潮。世上也没有普遍的、永恒的爱。地球上各处的大海不可能同时涨潮，爱也永远不可能支配一切。

严格意义上说，爱是一次旅行。有人说“旅行胜于到达。”这种态度的本质让人怀疑。持这种态度的人相信绝对的爱，而爱实质上是相对的。他们信仰的是手段，并非目的。严格地说，他们信仰力，因为爱是一种凝聚力。

我们如何信仰力呢？这只是手段，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我们是为到达而旅行，并非为旅行而旅行。

爱是旅行是运动，是向一起汇合的历程。爱是创造力，所有的力，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但所有的力都有两极，都又正反两面。所有物体都因重力而落向地球，但地球也逆着重力抛出了月亮、把它亘古至今地牵引在天空中。

爱也是这样，在创造欢乐的过程中，使精神趋向精神、肉体趋向肉体。如果一切都签订了爱的契约，爱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对那些为了爱而爱的人来说，旅行胜于到达，因为到达之后人们便超越了爱，或者说，人们便在至高无上的境界里重新拥有了爱。到达是旅行之后最大的欢乐。

爱的契约是一种最坏的东西。它试图挽回时间，留住春天，它试图永远不让五月变为六月，永远不让山楂落花、结果。

无穷无尽的爱，战无不胜的爱，这就是我们心中的不朽。它除了是牢狱和束缚，还能是什么呢？永恒是什么，不就是时间无止无休流逝吗？无限是什么，不就是穿越无边无际的空间吗？到达和休息，不就是永无止境的旅行吗？永恒是在时间里的永无止境的旅行，无限是在空间里的永无止境的旅行，我们再怎么做也无济于事。我们概念中的不朽，除了没完没了的单一延续，还有什么呢？延续、永存、持久和长在——这不就是旅行吗？一旦到达天堂，还怎能说是无限？无限意味着永不能到达。

所谓上帝、无限和不配的确切涵义，不过是指沿同一条轨道的没完没了的单一延续，是指朝同一个方向的永无止境的旅行。

方向固定的不断旅行便是无限，而仁爱的上帝就是我们爱的力量。既然无限意味着永远不能到达，那么它肯定既是死胡同又是无底洞，那么无限的爱除了死胡同或无底洞外还能是什么呢？

爱向目标靠近，而它同时又远离既定的目标。爱趋向天堂，而它远离的将会是什么呢？地狱吗？爱归根结蒂是正无穷，那什么是负无穷呢？既然正无穷和负

无穷实际上是一回事，那么我们是在向天堂迈进直到无穷，还是在朝地狱迈进直到无穷，这又有什么两样呢？既然所能达到的无穷都是无穷的纯粹和单一，那么也就是说无穷既可以是虚无，也可以是所有，那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无限、无穷不是终点，是死胡同，是无底洞。摔进无底洞还称得上是不断旅行，围得好好的死胡同也可算是完美的天堂。然而，无论是抵达一个遮蔽得严严实实、如同天堂的死胡同，还是坠入永无止境的无底洞，都不能令我们满意。

爱不是终点而是旅行。同样死也不是终点，它不停地把一切分解为浑沌，又从浑沌里重新开始创造。所以，死也是死胡同和熔化锅。

终点是有的，但不是爱也不是死，既不是无限，也不是永恒。它是宁静喜悦，是极乐天堂。在那里我们就像一朵玫瑰，奇迹般地立于绝对的中心，保持完美的平衡。玫瑰是完美的，它完美地平衡于时空的中央，它不属于时间，又不属于空间，因其完美、因其固有的超然物外而逾越了时空。

我们是隶属于时空的动物，我们也像玫瑰一样，实现了完美，抵达了神明的境界。我们是隶属于时空的动物，我们同时也是超然的存在，超越了时空，在神明之境和快乐的天堂里走向了完美。

爱是多种多样的，有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男女之爱，有基督教的爱：“你当爱邻如己”，有对上帝的爱，而他们有一点则是共同的：爱是合而为一。

只有在两性的结合中，爱才被赋予双重的意义。

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它们彼此联系，彼此对立。

男女之爱之所以是世上最伟大最完整的感情，也正是因为它是双重的，它兼容了对立的两种形式。男女之爱是完美的生命节奏：收缩——舒张。

无限、无穷不是终点，是死胡同，是无底洞。摔进无底洞还称得上是不断旅行，围得好好的死胡同也可算是完美的天堂。然而，无论是抵达一个遮蔽得严严实实、如同天堂的死胡同，还是坠入永无止境的无底洞，都不能令我们满意。

爱不是终点而是旅行。同样死也不是终点，它不停地把一切分解为浑沌，又从浑沌里重新开始创造。所以，死也是死胡同和熔化锅。

终点是有的，但不是爱也不是死，既不是无限，也不是永恒。它是宁静喜悦，是极乐天堂。在那里我们就像一朵玫瑰，奇迹般地立于绝对的中心，保持完美的平衡。玫瑰是完美的，它完美地平衡于时空的中央，它不属于时间，又不属于空间，因其完美、因其固有的超然物外而逾越了时空。

我们是隶属于时空的动物，我们也像玫瑰一样，实现了完美，抵达了神明的境界。我们是隶属于时空的动物，我们同时也是超然的存在，超越了时空，在神明之境和快乐的天堂里走向了完美。

爱是多种多样的，有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男女之爱，有基督教的爱：“你当爱邻如己”，有对上帝的爱，而他们有一点则是共同的：爱是合而为一。

只有在两性的结合中，爱才被赋予双重的意义。

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它们彼此联系，彼此对立。

男女之爱之所以是世上最伟大最完整的感情，也正是因为它是双重的，它兼容了对立的两种形式。男女之爱是完美的生命节奏：收缩——舒张。

精神之爱是无私的，它不是爱自身，它是恋人为他所爱的人服务，它寻求灿烂结成完美的合一。完整的男女之爱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

肉体之爱寻求的是它自身，我在我的爱人身上寻求我自己，在同她搏斗的过程中把自己夺回来。我们不是彼此分离，而是溶合在一起，我的爱人身上有我，我的身上也有她。然而，这种混乱状态不应存在。

于是，男人把自己解脱出来，成为完整的男人。

女人也脱离了我而成为与我截然不同的她自己。光照亮我们的灵魂，既非光明又非黑暗。光明是浑然一体的，黑暗须伫立于另一端，光明与黑暗截然相反，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

男性复杂情感爱情的动力是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爱情问题就一直是哲学、宗教、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中人们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爱情与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及其受到的教育和他在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密切的。从思想来说，一定时代的阶级斗争制约着这种关于人的亲昵情感和道德的本质问题上的分歧。尽管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

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延续后代的本能，是男人与女人的性欲。这个结论是通过研

究和观察得出的，这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对社会生活的唯物史观的证明。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无论哪一个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是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首先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及遭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同大自然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辩证法哲学是深刻的，广泛的。要科学而全面地研究爱情，就必须穿越人类性欲的神秘迷宫，必须进入男女之间亲昵的多级生活、精神领域，并

且还必须事先考察人的生物本质。

承认爱情的基础是性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使拥护禁欲主义的人愤怒不已。这种对异性发情的动物欲望，难道可以看作是高尚的人类之爱的固有内容吗？到了文明的今天，那种遭到宗教反击，诅咒的性行为，还应来污染文明社会的纯洁道德？

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常常谈论所谓“神的爱情”及其迷人的地方。禁欲主义者、东正教教规的鼓吹家，戈基姆·斯韦亚特格里斯召唤人们。让人们从精神上反对魔鬼的肉体诱惑。他教给基督教徒们一些保持不受玷辱的办法，提出一些可行而具体的规劝，让他们抵御魔鬼亵渎灵魂的纯洁性。

他指出：如果你必须与异性交往，就要避开可能扰乱你肉体平静的任何事物。如果要与异性交谈，就要保持谦恭和庄重，并且，千万要把握住交谈的时间。不要表现出爱慕，要稳重镇定，言词也要彬彬有礼，语气要严肃。

他认为：与异性交往，总会掺杂着忧患无穷的激情。这种激情总会在男女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灵魂深处，使理性变得黯然失色。因此，他规劝：与异性交往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各种福音书、信徒书信及新约中，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道德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但这种禁欲主义并不符合旧约。旧约占圣经的大部分，是一部充满着热爱生活的哲学，并被看作是基督教的圣书。

事实上，旧约反映的是犹太教的形成时期，在父权制条件下人们对性生活的看法。这些看法与新约宣扬的那些观点截然不同。

在旧约里，对男女之间性关系的描写是透明的赤裸裸的。真实得没带一丝禁欲主义的虚伪。它认为这种关系是按造物主的意志存在的自然的东西。在旧约里，

上帝真是万能的，它不仅创造了万物，还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

当他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后，它对他们说：你们相亲相爱，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爱情的鼓舞人心的一幕，是一曲赞歌，正如所罗门的《雅歌》。可是新约的理想却相反，它界定的是一种禁欲主义的贞洁。因此，我们探讨的问题有两种互不兼容的观点。

基督徒们都愿意按新约的要求祈祷和忏悔，而按旧约的原则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矛盾大概灌输了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一思想。

因柏拉图式的爱情，通常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其根源在于新约。它的鼓吹者不仅诅咒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还诅咒妇女，它以耶稣的名义谴责性接触，从而激发起某种狂热，使自己能像天使那样纯洁，能观察意识在无穷大的宇宙中的强大力量，其目的是没有肉体接触的灵魂的溶合。

男人、女人们只在纯粹的精神享受中像在云端一样地遨游，他们的双手只是在一无所有的空间游动，拥抱，他们从不亲吻一次嘴唇，思想像云雾那样朦胧一片。仿佛这才是男人和女人们获得永恒幸福的途径。然而，这种生物的无形无体的爱情，只能是人的幻想而已。

真正的爱情，往往会因为与所爱的人之间肉体的不谋而合的接触而死亡。因为这种接触引起的冲动，在不经意的瞬间就将美好的爱情弄破灭了……

因此，虽然精神病学的教授们不承认，柏拉图式的虚拟爱情还是照样存在。甚至可以说，人世间其实只存在柏拉图式的虚拟爱情。因为除这种爱情外，任何被人们称为爱情的东西都是卑鄙的下流的。

要满足欲望，那就去马比伦找妓女吧。俄国革命以前，俄国有一位知名的神秘主义理论家，名字叫做弗拉基米尔·斯洛维伊夫，他主张维护所谓“理想的爱

情”。他反对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研究爱情的心理成份，结合繁衍种属的本能的方法是不科学的、错误的。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意志十分关注某一个人的出世，它就应在其父母心中唤起一股十分强烈的激情，这股激情能够彻底粉碎阻碍他们走在一起的所有障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知觉不到爱的激情的力量与传宗接代的意义之间有什么对应的关系，也没发现类似的什么现象。

现实生活中，最强烈的爱往往只是一种单恋，因此，这种最强烈的爱是不会生出伟大的后代，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生出后代来的，而这也是上述理论没法解释的。

传宗接代的目的，是在爱情之外达到的，个人的强烈爱情，从来就不是为传宗接代服务的途径。认为性爱的意义在于合理的生育，就是承认只有在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爱情时才可能有这种意义……

男人复杂情感如何定义爱情

如何给爱情下个定义呢？如果有哪几位哲学家想要深入研究这个不怎么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最好沉思一下柏拉图举行的一次筵宴。席间苏格拉底同他热爱着的亚西比德和阿伽通漫谈爱情的形而上学。

爱情本来有如一块大自然的布，人的想象在上面绣了许多花中你若想对爱情有一个观念，你只要看看你花园里的麻雀、看看你的那些鸽子；观望一下人家给你的牝牛牵来的牡牛；注视一下这匹矫捷昂扬的骏马，由两个马夫牵到那匹正在等候着它的驯良的牝马那里来；牝马便把尾巴掉转过来迎接它；看看它两眼闪闪发光；听听它嘶叫的声音；观赏观赏它怎样跳跃腾骧，双耳直竖，张口抖唇，鼻孔鼓张着，呵气喷腾，鬃毛直竖而飘动，向大自然给它准备的对象猛扑的雄昂动

作；但是丝毫不必艳羨，最好沉思一下人类的长处，人类在爱情方面有许多优越处都补偿了自然赋与动物的长处：力量、骏美、轻捷、迅速。

有的动物甚至毫不知道快感是什么。鳞甲鱼类尝不到这种情欲的乐趣；母鱼在河底甩下几百万鱼子，公鱼遇见便从其上游过，甩下鱼白，使这些鱼子受精，却不知道这些子是哪些母鱼的。

大多数动物交配只能从一种感觉上尝到快感；一旦情欲满足，一切就都完了。除人以外，任何动物都不懂抱吻，人身体整个儿是敏感的，尤其是嘴唇所感到的快感是无限的，而这一快乐只属于人这一类。

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恣意于爱情，而兽类却只能有一定的时间。你若是想一想这类优越处，你就会照罗什斯特伯爵的话来说：“爱情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里也会使人信仰神明的。”

因为人得天独厚能使自然赋与他们的完美。注意清洁，调养身体，使得皮肤愈加细腻，这就增加了接触的愉快，而且对于健康的注意又使肉感的器官更加灵敏。所有其他的感情随着也都进入爱情中，就好像一些金属跟金子混合一样，友谊和尊敬的感情更助长了爱情；身体和精神的能力更是构成了新的环节。

人类自尊自爱的心理特别能加强上述这些情况彼此之间的联系。人都欣赏这种心理的抉择，而大堆的幻想又给大自然创造的这个作品锦上添花。

这就是人优于动物之处。但是人虽然尝到动物所享受不到的快乐，有多少痛苦却又是动物心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呀！对于人最可怕的是自然在四分之三的陆地上用一种只有人才能感染，而且又只传染生殖器官的可怕的疾病毒化了爱情的乐趣和生命的源泉。

这种传染病根本不像许多别的疾病那样由于我们生活没有节制而感染。决非

由于荒淫无度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这种疾病。

如果有时可以指责自然不重视它自己的创造物，违背了它自己的本旨、倒行逆施，那就是指这种使世人惶恐万状、声名狼藉的可厌灾难而言。难道说这就是可能有的世界上最理想的世界吗？

真正的爱情应该能够接受对方的缺点或凡人的性格。爱情不是唯一的救赎，而是一种人际关系。偶像崇拜式的爱情给予对方神人般的价值，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爱情迷思，他不值得有那么多的爱情。

当女人发现她所崇拜的偶像不出色时，是会伤心绝望的，如果她选择的对象确实值得去爱，但他却是个凡夫俗子，那么她屈服的是一个像上帝一样的人，而非是凡夫俗子；她自己欺骗了自己，只因她拒绝公认人类存在的价值，她的虚伪造造成他和她之间的鸿沟。她极力奉承他，对他卑躬屈膝，但她无法成为他的朋友，因为她不了解他在世界上的处境，他也会软弱，他也会有达不到的目标。她以为他就是法律和真理，她不认为自由有犹豫和烦恼。

不以凡人的尺度去衡量她的爱人可解释很多女人的矛盾。当女人向她的爱人要求一个恩惠，她认为是他慷慨、高尚、大方、非凡的；假如他拒绝她，那么他就是吝啬、气量狭小的，他是魔鬼的化身或是禽兽。什么超人和非人性之间，难道没有常人的地位吗？

爱人除了证明他的确值得她崇拜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如果她不再爱他，她就需要诋毁他。只因为爱情使他前额生辉，她禁止他有任何缺点，假如他无法符合她替他创造的形象，她就感到失望、生气，如果他觉得疲倦、糊涂，在不适当的时机肚子饿或口渴、做错事，那么她会抱怨他失常了。爱情中的女人最初的时候会很高兴去满足爱人的欲望。女人努力去唤醒男人的欲望，目的是为了能够满足他，如她无法做到，她觉得受屈辱没什么，甚至认为爱人的热情都是装出来的。

当女人将自己变成男人的附属品时，她必须得到补偿，因为她要将对方占为己有。

对于大多数花样年华的女孩，不论她们是在工作或无所事事，也不论她们被要求留在家里或外出工作或旅行，猎取丈夫、有一个固定的男友这件事，越来越变得重要。

这样的需要经常毁坏女性之间的友谊。手帕交失去了她高高在上的地位。少女视同性朋友为竞争对象，胜过盟友。

我曾认识一个女孩，她聪明而具天赋，在她的诗和散文中形容她自己为遥远的公主；她诚实地表示她对童年时的女性同伴不再存有丝毫友情——如果她们丑陋而笨拙，她厌恶她们；如果美丽动人，她害怕她们。对男人之期待因为焦躁不耐烦，所以时常牵涉手段运用、策略计谋与委屈羞辱，如此一来就缩小了少女之视界，她变得冷漠无情。如果迷人男子再迟迟不来，倦乏与酸楚的心情难免盘旋于心。

处境造成少女的性格与行为，如果处境改变，少女亦随之改变。今日，少女逐渐地能将自己的未来操在自己手中，不交付给一个男人。如果她专注于学业、运动、职业训练，或什么社会政治活动，她就不致于一天到晚想男人，不那么关心她的爱情方面之冲突。然而，在今日处境，她远比少年男人难予以独立个人之身分，寻得自我之实现。因为她的家人或社会道德观念，都不赞成她在这方面的努力。

即使她选择独立，她在她生命中仍保留一大片空白给男人，也给爱情。她害怕她一心一意致力于某事业，她将错失认为是女人之天命。这一感觉时常不被意识到。无论如何，做事的女人希望事业方面的成功与纯粹女性之成就相互妥协，如此她必须花许多时间注重自己的打扮。

男人除了注重工作之外，以无限自由的思想自娱，但女人的幻想有不同的方向，她想自己的外貌、想男人、想爱情，而她给学业、事业必须之心力。这并不是脑力较差、不能集中精神的问题，而是事业女人和纯粹女人两者所引起的分割现象。一种恶性循环就此成立，我们不停地发现，一旦一个女人找到丈夫，便时常轻易放弃音乐、学问、事业。显然她对这些计划和自我成就没付出足够的心力，以致于她觉得不值得成全它们。种种情境联合起来阻止她个人与男人保持同居关系，但不受婚姻契约的约束。她的睿智、她的爱情，激发了智识妇女的觉醒，可说是影响深远。

男人唤醒他的情妇，是为了要去拥抱她，而女人把男人叫醒仅仅是为了不让他睡觉，不让他离开她，要他想着她。要他在这个房间中，在她怀抱里，就像关在圣体盒的上帝一样，女人想对男人做的就是像狱卒一样看紧他。

在爱中存在的一切矛盾因相互融合而消失。只有在爱中才有联合和二重性，在分离中不会存在，爱必须在同一时间里是一又是二。

爱是运动和静止的统一，我们是变换它的位置，直到找到了爱它才能平静。但是这平静本身是紧张活动的形式，在这里绝对的静止和不停的运动在爱的同一点上汇合了。

在爱中得失是均衡的，在它的平衡表中贷方和借方的帐目在同一栏内，赠品增加了盈余。在这宇宙美好的节日里，在神的自我牺牲的伟大礼仪中，情人不断地在爱中舍弃自己又在爱中获得自己。的确，爱将舍弃与接受两种行动带到一起，并且将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爱中有两极，一极是个人，另一极是非个人。在一极你必须明确地宣称——这是我；在另一极你同样地必须坚决否定——这不是我。没有这个自我什么是爱呢？再者，只有这个自我爱又怎么是可能的呢？

束缚和自由在爱中并不是对立的,因为爱是最自由的,同时又是受束缚的。如果至上的神是绝对自由的,那就不会有创造。无限者把自身呈现为有限的神秘,正是在无限者的爱中有限与无限成为一体。

当我们谈论自由和非自由的相对价值时,它就变成纯粹的文字游戏。我们并不是只渴望自由,我们同样也要求束缚,爱的崇高职能就是愿意接受一切束缚并超越它们,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爱更具有独立性,是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也能找到这么多的依赖性呢?在爱中束缚也像自由一样是令人愉快的。

男性复杂情感意识和冲动的伊甸园

人的爱情反映人的本质深度,而不能忽略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的爱情不单单是纯生物的、性渴望的、本能的联系。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的本质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爱情是性渴望和精神欲求的巧妙结合,是意识和冲动的伊甸园。它的内容是丰富的、无穷无尽的,还具有纯洁性的。

研究爱情要持科学的态度,要将自然科学的材料与人的社会本质规律紧密地联系起来,从它的生物基础深入到它的社会基础,去进行科学的复杂的比较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它真实的一面,认识到它自古以来一直掩藏在诗歌幻影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秘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虽说人也是生物,但人有社会性。这是 2000 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就谈到的。

100 多年前,马克思又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哲学观出发,对亚里斯多德的论断作了科学的分析。这种分析包含着相互联系的诸多方面。

人是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真实体现而生存的,是多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同时又是社会的产物,是诸多社会因素的产物。

但总的来说，社会又是人自己建立的，人发现并利用历史的规律改变了社会，同时创造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在自然界中，人始终是一种生物，是一种复杂的、生命力极强的生物。他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受到自然规律和生物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决定他的文化发展社会制度及其客观规律的约束和制约。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生命冲动的生物因素、条件和规律被社会所“吸收”。其实这些因素、条件和规律并不跟在动物身上那样直接地、绝对地起作用。它是在受到某种社会调节时，经过一定的社会环境间接地起作用。

作为相互关系的一种规律性结构，这些过程也表现在性渴望的问题上。本能 在社会制度的范围内也要受到社会的约束和限制，它是实现人的潜在的生存手段。

对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就可以充分说明上述重大的问题。对社会进行科学地了解和认识，使我们有可能阐述传宗接代的本能与社会关系间相互联系的方方面面。这个理论观点具有原则性意义。

人能调节自己本能的动物的需要，并且，可以使它具有人性。人可以摆脱自然的本能的直接作用，但没法摆脱自然的本能。人是有意识的、有情感的、有智力的，人是讲道德的动物。所以，他才能位于其它所有生物之上。

人类的两性关系的发展客观地反映了文明史的一个方面，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他的生命的本能才能得到表现。社会是教育自然界的，由于人用意识的力量和优美来补充本能的力量，于是就形成了人应具有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的社会结构。

从对男人或女人的性的渴望成为这种切合恋爱双方有目的和理性的一种交往方式。动物的爱情并不会意识到交配的环境，更不会意识到交配的后果，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本能。在动物身上，只有最原始、最初级的条件反射。而人在社会关系及劳动中，却具有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的意识。他可以根据一定的准则左右自己的行动。

人复杂的性关系就自然地具有了高尚的精神，就成为了人类最高级的享受。人类爱情的意识不单表现在预见、认识和按一定目的调整自己的行动上，还表现在他（她）富于幻想和殷切地期望获得个人幸福方面。

意识能从过去吸取教训，为现在建立一个思维方面，并预见将来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即作好现在的安排，和设计好未来的发展蓝图。意识能把人的爱情改变成一种令人满意地美好感受，能使人充满着感情联想，使人充分体验到幸福，并为人带来可能再度获得享受的不十分明显的希望。

人的爱情按照和谐规律将机体的生理规律和精神准则掺杂、组合在一起，将自然的冲动和意识组合在一起。爱情本身就既是清新美好的期盼，又是令人激动的感受的回忆。它永远不会是在它实现时的体验。动物方面，大脑皮层中存留着曾经条件反射的记忆。这些记忆在与之相关的外部刺激物的作用下，自然地变为了现实。但动物不能有意地回忆自己的过去，让自己的过去变为有目的的新的体验的源泉。

尽管动物的大脑皮层中存留有过去条件反射的记忆，动物却是没有回忆的。动物不会幻想，不会在意念中体验到发生性爱关系时的美妙乐趣。动物在交配时找不到那种甜蜜蜜的，其乐无穷的快感。同时，动物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将来的命运。爱情是一定社会结构中，人的善恶观、道德意识相联系的产物。

对评价文化的进步程度来说，这个问题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动物是生活在善与恶的之外，是不懂道德的。雌性动物与雄性动物似乎具有

的那种道德上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只是它们之间的一种相互联系。

这种联系常常是牢固的，也没有与交往的伙伴融为一体，也没有服从某种社会准则、责任感等问题。因此，这种行为是不能叫做本来意义上的义务的。

人只要爱上了某人，就要承担、尊重这种友谊，并把它看作最大的幸福，应该珍惜它。人一旦体验到真正的爱情，他就会表现出巨大的道德力量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爱情创造了美。爱情使人对美的感受能力敏锐起来，促进人对世界的艺术化认识。它是作为男女关系上的某种特殊的审美感受，逐步得以发展的。

而对于使世界充满崇高精神的美的规律，动物是无所知的，它根本就不懂艺术的魅力，不会创作艺术品，不会欣赏和领略美。它那些有些相似于艺术的举动是在生理上由先天带来的，有其固定程序的，也是完全出自于本能的。

在生物界中，只有人才能洞察美的理想境界和创造美，并按种属及个体的标准来认识现实。只有人才能把赋予一种美感。

应该承认，爱情是会产生社会后果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爱情的力量包括生理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

爱情的力量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它引导一对对男女去建立婚姻和家庭关系，建立稳定的生活。它所造成的不是绝对独立于外界的配偶。它使集体产生对社会、对社会制度、对人类的最高利益的新的道义责任。

爱情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心理内容是由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不同，爱情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内容有所不同。因此，爱情的精神成分的总音标就会有特殊的差别。比方说，中世纪时代，爱情包含着基督教的所谓骑士理想和神秘

主义成分。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就开始形成了。这时的爱情，更有世俗意味、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具有理性。

到了 18 世纪，爱情则又受到贵族文化冲击，特别是宫廷文化的影响。爱情的社会成份还在选择性的欲望对象的过程中存在。

选择和中意的标准，不仅仅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心理的。因此，人类的爱情就超出了单纯的实现本能，超出了动物的性关系。

在选择恋爱的对象时，无论男女都不光会注意到对方的眼睛、头发、体形和气质等由遗传决定的生物特点，还会考虑到对方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道德水准、物质条件、爱好兴趣及生活处境等社会问题。而动物之间只有整体的群居形式，就算它们有最复杂的性选择，也还是纯生物的。其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社会标准。

男性复杂情感爱情的社会性

爱情的社会性是利用性渴望的某种特殊形式。这里谈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实现两性关系的不同途径。

动物那种乍一看来有的相似于人的爱情的情，只限于它在发情期可以找到一个异性实现交配。这种所谓的“爱情”并没有超过从性行为中获得的普通的生物的水平，没有超越繁衍后代的纯本能的性渴望的范围。

人类的爱情不仅要服从繁衍后代的自然规律，同时，人类还用动物所不能知道的功用来对本能加以强化。

人类把性交往的目的变成了肉体和精神的一种快感和享受。并且往往不考虑

繁衍后代的因素，甚至还会采取节育措施。

另外，性欲经过社会修正而产生的另一特点，也是与此相联系的。即任何一种动物的交配在自然条件下，除繁衍后代外，都没有其它意义。因此，发情和交配都发生在生物适宜受精的时期，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

当动物那种短暂的“爱情时期”结束后，它们在性关系上配对的双方就各自为自己觅食和在周围的环境中保全生命。它们在性欲方面，直到下一个受精周期到来前，也还不会感到性饥渴。

人类扩大了实现性接触的时间，他不受自然周期的制约，也不受自然的制约。他甚至跨越了在进化过程中为其它所有动物规定的生理制约。

在人类社会，禁止与某些人性交，是对两性关系进行社会调节的重要手段。在原始社会时期，这种对人的性接触的禁止具有纯道德的性质。奴隶社会起，这种对人的性接触的禁止在有阶级的社会形态中便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主观上，自然界的动物是不能调节本能的。所以，从来就没有类似于人的自觉的限制。动物在道德方面没有任何制裁，好书推荐官微信 2219344884 更不可能制定法律细则。动物的性交活动只在生理方面受到限制。

控制人的性交活动的主要表现是禁止血亲相奸。这是社会为防止后代退化而采取的保护举措，它使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与妹妹之间及近亲之间不能进行性交活动。

控制人的性生活不单单是禁止血亲相奸，还对性爱活动的社会调节要求采取了制裁，它制定了人的行为的规约，规定了男女共同生活的形式等。

从实质上讲，社会调节是为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达到和维持性交活动的

最恰当程度，而使对立的趋势平衡。社会尽量保持各种趋势的平衡，有时可以让两性关系相对自由，有时却又严格地约束两性关系。

因此，这种社会调节和监督是由当时历史条件的性质决定的。

在历史自相矛盾的进程中，对性交活动的社会调节有一定的误差出现。但有些“误差”却又是男女关系向前发展过程中，连续的和必要的环节。

古希腊的奴隶制社会对性爱活动的限制是不严厉的，当时还有相当大的性自由存在着。在艺术的发展中，这种赤裸裸的色欲也有所表现，后来就引起了人的性生活泛滥，导致了人的“贬值”。

罗马帝国衰败时期，性生活日益丧失其本来的道德方面的美感，使男女关系的价值降低。古罗马曾以荒淫无度而“闻名”。古罗马诗人伊卫纳在他的讽刺作品中说，在“闻名的城市”的大街上，到处是“面带愁容的浪荡汉”，男人淫欲贪婪，女人以卖弄为荣，哪里都在“无节制地饮酒作乐”。女人们不知道什么叫羞耻，肆无忌惮。性关系的“发展”达到了混乱惊人的程度，政权也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这种性的无节制必然决定在一下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信念的内容。在封建社会，诅咒肉欲被宣布为信仰基督教的标准，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类。这不是历史的过错，也不是偶然的。这种对诅咒肉欲的方式否定了没有任何限制的无节制肉欲，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平衡。

这种诅咒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诅咒性关系是在男女的性欲交往中建立起来的社会监督，是对奴隶制社会中无节制的肉欲和爱情退化的有很大片面性的最有力的批判。

调节男女之间性关系的手段，是动物没有具有也不可能有的羞耻感。图尔诺

说，羞耻感是文化修养，是男女关系的文化修养的必然产物。这是男人与女人的“道德装饰”，而不是天生的。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不断克服亲昵关系的片面性。人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构成他们完整的生物——社会本质的诸多因素的和谐以及充分的体验是他们幸福的源泉。

性欲作为相互关系的完整体系中的生理因素，被看成是与文化的发展相对抗的动物时期的遗痕。可是，也有一些社会学家想完全割裂爱情的生物性和社会性。

应该说，一个处在正常状态的人是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有意识的因素和无意识的因素组成的统一体。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及其这些因素的融合体，个体总是大于这些因素的简单的机械相加。

人的性别并非单纯的生物结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特征的人的生物本质，内在地与社会本质联结成一个统一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各种场合都是综合地起作用，并没有丧失它们之间的差异。

本能和性欲是爱情的根源。本能的欲望不仅把男人和女人的肉体，而且还把他们的心理引向一种特殊的、深刻的、亲昵的相互结合。

爱情并不只是柏拉图式的淫欲、精神和神奇的表现，不只是一种本能。爱情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深刻的、有生命力的、多层面的有机统一，它使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联结到了一起。

男性复杂情感男人的角色

作为一种完整的感受，爱情是由多种不同因素构成的。爱情的深刻基础是由繁衍后代的本能和性欲的生物因素与社会关系，男女双方的审美感受和伦理感受、对亲昵的追求等社会因素构成的。于是，人的繁衍后代的本能就具有了社会

性。

爱情的个别因素可能是性欲，爱慕，交往的欲望和求得，对亲昵情感对象的选择，男女双方之间的伦理和审美关系等内在固有的，也可能是非内在的，即外部附加的，这些因素通常涉及面广，是爱情与社会生活中其他领域相互作用的产物，与全社会的文化水平有关。

爱情必然受到人的思想、感情、理想、爱好、特长、志趣、价值体系及人置身于其中的道德环境的影响。爱情的复杂结构与心理生活中的不同领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爱情的各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整套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构成了爱情的本质。

爱情是在性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只从性能力本身来说，性能力并不具体选择特定的异性对象。可以说，最初性能力的勃起只是一种盲目的力量，一种没有目标的内在本能力量。只有在获得关于某人的具体信息后，爱情才开始逐渐地形成。开始时，这种相互“考察”是在感官水平上进行的，但也有理智的参与。

心理都是作为整体发挥作用的。感性资料被不断地分析和综合，男女双方都把异性对象的形象与早就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观点进行对照。将感官的知觉进行逻辑处理，是一个思考“知觉”的过程，是从理性标准的角度对这些知觉的评价。无论是男方或女方，都往往要或多或少地了解对方的外貌和品质，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己的理想和观念。

一旦直观对象与主体的欲念和心意相符，就会必然产生一定的感情，从而为感受提供特殊的情绪和氛围。于是，一个开始博得爱慕的形象就渐渐地成了心理满足的具体内容。因为有了感情，对待恋爱对象的态度中的认识因素就带有主观性。

相爱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成了审美关系。渐渐地，意中人的形象成了美

的源泉。根据个人审美体系，对方也可感知这个形象的个性特征。

尽管这些都直接反映了感受的内在直观性，却没有穿透爱情实现的全过程。爱情还挑起交往和相互了解的欲望和追求，激发恋人的能动性。

男女双方在交往中，必然要求他们各自遵守相互间一定的道德义务。这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离开了这种自愿遵守的道德规范，相互爱慕的感情就宣告破灭。

在情绪水平上，男人理解自己所爱的女人时，总是在认识和价值定向的各个水平上评价或能够评价她的品质。此外，他还体验到一定的情感，感知心爱的女人会给他带来美感的满足。当然，他也承担了道德上的义务。

爱情的整体性和爱情因素的多样性，经常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我们遇到的是一个量性无法企及的领域。但是，自古以来，思想家们都认为，人的内在本性归根到底是不能认识的。

爱情的本性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既是出于本能又受到思想的鼓舞，既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理性。如果爱情只是理性的，来自于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振奋心灵，它的生活力也就会枯竭。倘若爱情只出于本能，只具有生物性，而且不合乎理性，它就会只表现为一时的激情，而不蕴含精神文明的魅力。

爱把本能和精神美、理性与非理性结合在一起。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欲求的生命力不断地升华。但丧失理智的、绝对非理性的爱情却会使人失去人性。

没有意识的爱情已经不再是爱情，而仅仅是堕落为本能的、盲目的、放纵的、野蛮的兽性发作了。男女之间的性渴求是自发性的，但也是可以对它抑制教育的。

真正的爱情必须仰赖于相互尊重并维护彼此的尊严，而不仅仅依赖于感情的放纵和怪念的驱使。人是了解自己的日常行为的。

关于爱情的生命力，从理论上讲，也不能仅用情侣相互尊重的道德规范来解释。不应忘记构成爱情的诸多因素是相互对立的。个人的审美、伦理、生理和心理价值的相互作用决定爱情的本质。真正的爱情，似乎就是在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迷离交错的小路上做神话般富有浪漫色彩的漫游。

经过相互渗透，可以说理性和非理性是酿成了一杯令人心醉的爱情美酒。两性的相互诱惑，感情、幻想的美感等，以不同的比例在爱情中混合。爱情是痛苦和快感，是光明和黑暗，是希望和失望，是欲望和淡泊，是烦恼和欢乐，是残忍和慈悲，是感受的充实和想象的奔放，是自觉性和自发性，是道德修养和激情，是理性和疯狂，是本能和思想。

过去我们一直否认这一点，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非常信仰自由，他们都想拥有绝对完美的自我。对这些人来说，男人如果还需要另外一个人作为依靠，那将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个极其严重的伤害。当然，男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女人，女人也可以自由地选择男人。

不过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男人说出离开我的女人我就没法活的话，这对我们的骄傲的心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当说“我的女人”的时候，我并不是想把她作为法国式的情妇。我只是单纯地考虑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一个男人的身边如果没有女人，他就很难快乐地生活。除非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然活生生的女人也是一样的，她们的身边如果没有男人的甜言蜜语，没有男人的帮助和呵护，我想那一定是她们的灾难。同样，如果她也是个同性恋，她就可以一直生活在女人扮演男人的氛围中。

几千年来，人们都在回避男人和女人相互需要这一说法。这在佛教中尤其严重。如果一个男人的眼前有挥之不去的女人影子，那么他就永远无法进入佛所说的涅槃境界。“我孤独地来了！”这是进入这种境界的男人的骄傲的声明。“我孤独地来了！”那些灵魂获得拯救的基督徒也这样说。这是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宗教，现代利己主义就由此产生了。

婚姻会因死亡而终止，但这样的终止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我问他们——那些男人或女人们：“你想摆脱生活的羁绊，摆脱人际的纠缠，而展现出纯粹的自己吗？”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你会怎样回答我的这样一个问题？

时间的确能稀释一切，能改变一切。过去大多数男人想这样生活而女人就不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这样生活，而男人却变得犹犹豫豫，毫不果断。

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几乎达到了一个很高深的境界，他们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他们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这样一系列的本原问题。可是，当他们获得了自由，割断了束缚，变成了纯粹的个体之后，他们又是谁呢？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种近乎独立的境界，也没有几个人不会落入纯粹自我的怀抱中。真正的危险是你孤身一人、形单影只，脱离了一切现实中的人。

对于很自我的人来说，我们拔光他们的羽毛，让他们变成最开始的样子，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拿破仑会有些傻，玛丽女王会变得自私狡诈，圣·西蒙斯达立特呆在柱子上变得自高自大，有些神经质，而我们这些自以为神奇的人则变得一文不值、傻里傻气。现在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傲慢无礼、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破坏一切完美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因循守旧、

固步自封来虚张声势。他们内在的空虚早晚会被别人识破，而这种手段也只能偶尔骗骗人罢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人们当成笑料来谈论。

如果一个人被孤立起来，只让他保留完整无缺的个性，他肯定不能保留多长时间，最后能留在他身体里的只是残破不堪的个性。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个性的。如果不是因为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只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在与其他人、其他生命和外物紧密的联系中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只能是一个个毫无生命的气泡，我们的个性也因为没有参照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一只孤岛上的云雀，即使它能唱出优美的歌声，它也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个性消失殆尽，它只能像田鼠般逃之夭夭。如果有一只母雀和它在一起，它就会唱出嘹亮的歌声，从而恢复自己真正的个性。

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真正的个性和鲜明的生命，存在于与各自的关系中。他们存在于不停地接触之中，他们不可能脱离这种接触而单独存在。这就是性。性就像照在草地上的阳光，是一种温柔而又实实在在的接触，它是奉献给予与获得，是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伟大而微妙的关系。通过性的接触，男人和女人才成为真正的个体，没有它，没有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算是真实的个体。

我们应该使这种接触保持活跃，而不是让它固定不变。不能愚蠢地认为与一个女人结了婚这种接触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就可以从此避免接触、扼杀接触。人们有许多可能扼杀真正接触，比如，把一个女人当成偶像供奉起来，或让她成为一个模范的家庭妇女，一个模范母亲或一个模范贤内助。其实，这些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只能拉开你和她之间的距离，一个女人决不是这个“模范”那个“模范”，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

男人也是一样，他的生活和行动也有着自己的存在价值。他是一道生命的溪水，按照一定的方向向某个人奔流，这个人接受他的生命之水并用自己的溪水相回报，这样就相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而才有了和平。要不然，他就只能成为恼怒的源泉，他的痛苦会伤害到他附近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是健康、自信的人，我们会不懈地追求这种与他人结成的真正的人际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一定要发生得很自然，我们不能强迫他人与我们建立联系，那样只能毁灭它，毁灭它存在的价值。毁灭它并不难，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注意促成它发生，而不是强迫或横加干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以一种虚拟的自我而存在、做事。几百年来，男人都一直充当征服者，充当这个世界里的英雄，而女人则只是他们弓箭上的弦，只是他们刀柄上的红丝带。不过，在女人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灵魂的时候，她们就向自由和独立伸出了美丽的双手。这种对自由和独立的期盼，过分地充斥了她们的头脑，使她们开始慢慢走向虚无。

征服者和英雄都已经过了时，就像兴登堡将军一样蒙上了历史的尘埃。现在，这种势头又要死灰复燃，但最后事实将会证明这些人是愚蠢的。男人已不再是征服者，不能再充当英雄好汉。他们不是宇宙中敢于直面死亡的人，不是永恒世界中的超灵人物。没有人再相信这种把戏，当然，现在的男人还有不少感伤，他们感伤的不过是那些已经尘封了的历史。

这两种骗术都不好用了——无论是征服者和英雄之说还是打扮成直面痛苦、过着孤独生活的忧伤英雄——这些全都没用了。

第二种骗术，在年轻人中开始出现，他们想用痛苦和孤独换取别人的眼泪，但是这种自怜自爱是很危险的，没有任何出路，它是一种死亡了的骗术。

今天的男人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过去的观念摒弃。作为一个固定的客体，

一个人，无论男女，就其自我而言，对人类来说不算什么，人们可以置之不理。无论男女，一旦一个人，变得骄傲和孤立自我，他就变得一文不值。

男人和女人的生命都是生生不息地流动着的。没有了哪一方，我们都不能再流淌，就如同没有岸的河不能成为河流一样。我生命之河的一条岸是女人，另一条岸是世界。没有了这两条河岸，我的生命就会泛滥成为一片沼泽地，毫无气势可言。

在同女人和男人的交往中，我的世界成为了一条生命之河。这种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赋予我以鲜活的灵魂。一个从未与别人结成生命关系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灵魂的，这好像和康德差不多。所谓灵魂是指我与我所爱的、所恨的或真正了解的人在生命的接触中自成一体的东西。而我自身拥有通往我灵魂深处的云梯。

我的灵魂是完整的，我也就是完整的，我们密不可分。现如今我们失去的正是自身的完整感，没有了完整感，我们就不会得到宁静。

男女关系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点，这之后才是男人与男人间的关系，再远才谈得上其他各种关系。

有个年轻人曾经对我说过：“我不信性可以使英国真正的复活。”我回答他说：“我相信你真的没有这种信念。”他是在教训我，他是在说他对性和女人不屑一顾。我相信这个人没有什么生命力，他只是个空虚而自私的人，不久他就会像木乃伊一样萎缩。

性只是男女关系的象征吗？我觉得男女关系和所有生命关系一样意义十分广泛。它存在于两种生命间的生命流动中，它甚至存在于相反的生命流动中。总的来说，贞洁和肉欲一样是生命流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世上还存在着许多我们不清楚的、永无止境的交流。我相信任何一对结了婚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每过几年就会有所改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每次变化都带来痛苦，同时它也带来了乐趣。

漫长的婚姻生活是一种长期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共同建立起他们完整的灵魂和自我。这就如同河水不断流动，流过一个个崭新的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所在都是未知数。

我们总是被我们树立的观念给束缚住。有个男人这样说：“我不爱我老婆了，我再也不想和她同床共枕。”我想问的只是他为什么总想和她同床共枕呢？当他不想与她同房时，他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交流在进行，而这种交流可以使他们两个变得完整无缺。

还有那个女人，她本来可以不抱怨，本来可以不说一切都结束，但是她非要跟他离婚，非要去投奔另一个男人——她为什么不能三思一下，为什么不能倾听自己灵魂中新旋律，为什么不能在她丈夫身上寻找新的起点？每次变化都会产生新的生命体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变化着，从而不断更新着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宁静。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一成不变地生活。

我们应该理智一点。可是，几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僵化了我们的思想。如性、金钱或某个人“应该”是什么等等的问题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失落。

性是变化的，它一会儿充满平和，一会儿恼怒，一会儿随风飘去。它的这些变化不定让普通人吃够了苦头。其实我想他们要的只是粗暴的性欲。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一旦这种感觉消逝，那一切就结束了！然后等待他们的就是离婚！

我很讨厌别人说我想让人类回到野蛮状态中去。好像一谈到男和女，现代的城市人就要用一种看最粗野的猴子的眼光来看我。而我看到的却是我们这些自诩文明的男女们在感情上和肉体上相互摧残，我所要做的就是请他们三思，多考虑

一下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变化。

我认为，性意味着男女关系的全部。我们只懂得老婆、母亲和情人等，但是这种关系比我们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里女人是一个偶像，她总要扮演情人、情妇、妻子或母亲等等的角色。这种一成不变的观念，我们真该破除它，以真正认识女人那种难以捕捉的特质：女人是一条流淌着的生命之河，每一条河都循着自己的方向。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条河并行，有时交汇，也有时会分开。

性关系是一生的变化和旅程。某些时候性欲会离你远去，但是属于你的男女关系仍旧持续不停地向前发展，这就是性的流动。性欲只是这种关系或流动的表现，但它却是一种最生动的表现。

男性复杂情感情绪与情感

在爱情中，亲昵接近给人的精神带来了兴奋，并加强了人在意识中的更新过程。其主要原因，在情绪上，种种感受达到了白热化，情感达到了炽热化。很体贴、很温柔的相互关系气氛在令人陶醉的半是现实、半是幻想和爱情世界中，以其特殊的激动创造了适宜于情侣交往的气氛。

情绪是人对周围的人、事物以及对自己本身的感受。情绪的职能，是反映外部和内部情境对主体实现生命活动所具有的意义，目的是调节主体的活动。

情绪往往创造人的快感与悲伤，欢乐与痛苦，赞赏与反感，恐惧与信心等两极对立体验。情绪可能是高级的，也可能是低级的，高级的情绪与意识在特定情境中的智力活动，审美活动及道德活动有关，低级的情绪与感觉，与机体的机能，与本能的实现等相互关联。

情绪是人的感受的复杂的组合。根据感受的内力强度或强烈程度、持续时间

及特定性，情绪可分为：心境、感动、激情和应激。心境是指持续时间的较长的、给意识涂上色彩且不太深沉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使心理生活具有某种气氛。感动是指短暂而强烈的令人震动的情绪表现。激情是指与人的意志有关、深刻而又稳定的情绪流露。

在许多文献中，情绪和情感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可是却有许多研究者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有些心理学家把情感看成一种特殊门类的情绪，认为这种情绪具有鲜明的对象性，并认为它与关于具体对象或概括对象，以及对人、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对敌人的仇恨之情等抽象对象的意念或观念有关。

情绪生活为何建立在相互联系而又相反的体验上呢？满足与不满足、快感与非快感、愉快与不愉快为何会构成心理的最深沉基础呢？为什么会一个人在某种生活情境中体验到一种情绪或情感，另一种人在相同的情境中却只能体验到另一种情绪或情感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轻松，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既可以把科学思维引入生物学适宜性的迷宫，也可以把它引向文化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情绪是一种保证最有成效、最迅速地恢复已被破坏的机体恒定状态的手段，即满足机体需求的一种手段。它是从进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情绪也是生物界发达体系中的一个调节环节。它使我们能准确地评价正在产生的需求及这种需求的满足。受大脑支配的各种情绪往往波及到整个机体，把机体当作它的各种机能的特殊的完整系统，而不是局部地发生。

如果出现饥渴、性欲本能等某种需求状态神经系统发达的机体就会感到一种不满足或紧张。于是，这种机体便开始寻找能满足它需求的对象。这就要求情绪反应并适应于这种机体。

紧张在辨识所寻求的对象和满足需求的过程中自然消除，于是，机体就会是

一种快活和满足并使这种快活和满足的状态逐渐地达到完美。

在认识现实、逃避灾难、完成性交、寻觅和摄取食物等过程中，任何情绪都起着发信号、选择、定向、刺激和制动的生物作用，都是发达的生物系统的行为机制。

心理学家认为，情绪弥补人在满足进食、消渴、防御、性交等方面需求的信息不足。它是一种特殊的补偿机制。

在原则上，对于一个充分获得信息的系统来说，情绪是多余的。它只有在人缺少知识且没法实现既定目标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如果是我们缺乏合乎逻辑的论据，我们就可以借助情绪手段来施加影响。当然，这种职能关系也有它相反的一面。当我们增加对某种事物的知识时，人的情绪强烈程度就会相应地减弱。

这种假说没法使人满意地阐述一系列心理现象。正当我们了解到关于我们的生活及关于生活这样的或那样的要求时，情绪就可能在我们的意识中产生。我们只有在认识世界时才有感觉。不然，获得信息最少的人反倒会有强烈的情绪。在情绪上，文明人越来越发达。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并没引起情感的减弱和热情的枯竭。

如果一个人不感知，即不认识某个主体，就不会对它产生任何情感。没有信息也就不会有情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知了解越充分，他就会越爱这个人。

当然神秘性也会加强情感。但在已获信息的基础上，人的情绪才能被激发出来。人们从被感官知觉的形象的特征中找到的那种关于理想的观念能使情感加强。

因为特殊的生命活动的结果而在某个时刻存在的情绪，与个体的其他体验一样，转入记忆之中并在出现类似的情境时，便能以某种方式再现出来，并不会消

失得不留痕迹。但在个体发育中形成的独立经验，都会减轻下一个为满足机体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有目的定向过程。在神经系统中，情绪会留下那种会影响基因的痕迹，使动物在环境中采取恰当遗传储备方式。

人的情绪是不同于动物的情绪的。由最高级的精神状态构成的丰富的上层建筑也是社会生活创造的。动物的情绪反应是由满足饥渴、自卫、性欲本能等生物需求的机制来调节的，而人的欲望却相当复杂，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新的、高级的、与当时文化水平相符合的个体需求出现。这种需求根据性质不同可划分为：认识需求、审美需求和道德需求等。

认识需求，是指求知欲望，即解决复杂科学课题的欲望。审美需求，是指对某种水平的艺术的需求，也就是对美的渴望。要满足这些社会生活中的需求，是需要个人意识具有一定的情绪和志向的。

在特定时刻，这种刺激中枢最为活跃，它一方面及时地抑制其他各种反射，一方面借助派生冲动支持自己的兴奋状态。

意识作为人的一种特殊反应，情绪表现是人对周围事物及现象给予优先考虑的态度。它巩固心理的优势中枢，削弱甚至排除偶然的因素。

情感对大脑皮层内的特殊抑制或大脑活动起刺激作用。情绪和情感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实现其功能的。情绪和情感的功能被导入调节系统，以满足生理性质的需求或社会的精神的需求。

情绪属于人的活动的需求、饥渴、性欲本能等生理需求的满足，情感则属于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满足。这些需求与道德、劳动关系、审美关系及其他关系有关。

不论是人的低级或高级需求，都是由人的行为的统一调节系统来满足的。并在一定的参数中，这个系统的高级领域使低级领域受自己节制。

爱情中的情绪和情感，是非常不同的。综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低级和高级的。这是由于它们既表现道德、审美方面的高尚感受的总和，又表现了性欲。

可是，这种形形色色的令人激动的恋爱情感，低级的情绪和高级的情绪，是作为个体感受彼此联系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着的，并不具有分散的形式。

现实生活中，与生具有的低级的情绪，被高级的情感所吸收。于是就形成了特殊的心理混合物。在这混合中，总是修养技艺和感受的亲密的高尚性占优势。

就其质的特性和强度而言，爱的情感是因人而异的。在整体的感受中，哪一种情绪与优势，取决于爱情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体情境，并部分地取决于修养和气质。爱的情感和情绪反映出最柔和的声调和鲜明的声调构成的美丽动听的音符。

由于有利或不利的情境、关系的初始或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阶段、神经系统的气质特点等特定类型的相同，就有主体的爱的情感性质不同和强烈程度不同的组合存在。无论在何种场合下，伴随着欲望的实现而产生的情绪优势都是身心的享乐。就其作为感受的内在特定程度和特点来说，这种情感都具有丰富的色彩，还具有某些变异。

男性复杂情感理智与激情

理智和激情在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爱情实例中比例都是不同的，这说明心理状态的综合特点，说明个人生活的强烈或脆弱，平衡或不稳定，丰富或贫乏。

爱情中非自觉成分和自觉成分的比例首先是由人的个性和气质决定的。

作为气质特点的表现，爱情的情绪对比在文艺创作中也有反映。资料表明，在北方居住的人的爱情更晶莹透明，更温柔宁静，更能有理智。在南方各个国家中，爱情是汹涌奔放而使人燃烧的激情，是情感的疯狂。无疑，这种趋势是通过各样偏差表现出来。因为在爱情中，是心理的社会特点和民族特点，意识的动态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

可以说气候条件影响着人的气质。南方民族的亲昵情感的方式不同于北方民族的亲昵情感的方式。南方人的爱情主要是赞赏女人的形体美，并且南方人在恋爱时都希望能品尝到这种形体美；而日尔曼式的北方爱情则主要是满足于主体与主体所爱的人呆在一起，一起劳动和生活，都能给她带来欢乐……

南方人是用情感去爱，北方人却是用头脑去爱。南方人沦为疯狂情感的奴隶，北方人则用思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南方的爱情中有更多的情感和激情，而北方的爱情却有更多的理想。

思想感情在爱情中是否充实丰富，是由个人总的文化修养和个性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爱情还是衡量文化修养的尺度。一个人的意识仅能发挥他所具备的某些价值。普通平民的爱情缺乏联想力，粗鄙庸俗，无法超出感官的享受。

爱情的多种形式的实现还直接涉及意识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一个人总的个性特征。它是一个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和哲学都感兴趣的过程。

爱情通常是靠直感感知和确认，轻轻拨动人的最微妙的心弦。

有的爱情使人感到有一种悠闲感，进入一种非理性的超脱生死的心理境界。人简直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一个人入迷时，就是在恋爱。初恋的感情中包含着对美的感知，情人眼里看到的是心上人的完美、美丽及无与伦比的人品和德行。爱情向他许诺的是欢乐和幸福。“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说恋爱都必然经过爱情的初萌、幸福的顶点和期待的结尾？爱情自然发展的下一步是什么？

许多学者认为，性爱也像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一样，有其发展的自然阶段。爱情也有生、长、老、死的类似于新陈代谢的过程。俄国心理学家谢切诺夫认为，完整的爱情，其发展有几个自然阶段。

男女青年为自己创造一个抽象的理想。这是第一个自然阶段，这其实是在幻想王国里忍受折磨，是爱情的必要前提。随时随地，男青年似乎在梦中看见“公主”的身影在天空闪耀，女青年却时时刻刻地想着自己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那个朝朝暮暮地想着的时刻终于来了。小伙子突然遇到一个姑娘，特别符合他完美的理想。在描述这个小伙子的情感变化时，谢切诺夫说：他是把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中的形象联系到了一起，这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在这种爱情中，是一种鲜明的、是强烈的视觉和听觉感受，是模糊不清的性欲望表现，所以，性方面的特征还很微弱。

激情和热恋。这是第二个自然阶段。关于这一阶段，谢切诺夫是这样描述的：从此，男人开始占有理想和情人。他那隐约模糊的性的欲望被令人心神不定的、鲜明的爱情感受所替代，他的激情燃烧得更旺盛。同时，他的情人也显露出从未有过的光彩。

感情平静。这是爱情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男女双方互相帮助，相互补充的幸福美满的情况下，炽烈的激情渐渐地失去了从前的力量。于是，感情渐渐平静下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原因就在于只能靠热恋的形象不断变化来维持激情的强度。一年，两年，彼此一起生活，双方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早已全部结束，强烈的激情也随之逐渐消失。但因为女方的表象及其某些属性或全部属性为心理内容的反射频繁重复，女

方的形象与男方内心的全部活动结合在一起，她已成了男方本人的另一半，这就是友谊式的约定俗成的爱情。

男性复杂情感生理上的分享

如果能被正确看待的爱情，并不是指两性之间的关系，而是指那种包含着充分情感的关系和那种既是心理又是生理的关系。现在生活中理性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战争和爱情。这些活动都是超理性的，但爱情并不是反理性的，一个理性的人能够理智地去享受爱的存在。

宗教和爱情之间有着某种敌对的情形。我认为，这种敌对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是禁欲主义的。

如果没有爱情，有文化的人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性本能，除非将整个生命——精神的和肉体的都融入这种关系。那些从未领受过两个人之间的所具有的密切的情感和深厚的友谊的人，最美好的东西他们没有感觉到，而这种不满则使他们朝嫉妒、压迫和残忍的方向堕落。

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则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也无法从世界上的其他人那里感受到那种热烈的情感。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也会受到损害。

只要有好的环境，大多数男女都会在他们生命的某个阶段感受到热烈的爱。

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很难把热烈的爱情和单纯的性欲区分开的，对于那些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少女，也是一样，她们所受的教育是绝不能和男人接吻，除非她们爱这男人。一个要保持自己在结婚时仍是处女的姑娘，经常被轻浮的性所迷惑，一个有性经验的女人，却很容易把这种性吸引和爱情区分开。应该说这种情形是造成不愉快婚姻的原因。即使双方存在着爱情，也会由于一方或双方认为它是罪恶的而受到影响。

传统教育把爱以及婚姻中的爱，都和罪恶联系在一起。

这种感觉，常在男女之间存在，这种感觉，不但在那些旧传统的继承者身上有，就是在那些思想解放的人身上也有。这种态度的影响很大，常使男人变得残忍、愚蠢、做爱时缺少同情心，他们不会说些能够触动女人感觉的话，也不懂得对待女人如何才能逐渐进入最后一幕，而这对于激起大多数女人的快感是重要的。

男人经常意识不到，女人是应当体验快感的，如果女人没有这种体验，那完全是男人的事。在某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女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冷酷的自负、肉体上的自我克制以及对于男人随意亲近她身体的厌恶。

一个灵活的求婚者，也许能够战胜女人的羞怯，一个敬重并称赞这种羞怯，而且将其视为是贞洁的女人标志的男人，会是失败者，致使在结婚数年之后，夫妻关系仍然拘谨死板。

在古代，男人从不要求看妻子的裸体，如有这种要求，妻子也会吓得魂不附体。现在，这种情形仍然比较普遍，这是人们想不到的，即使在那些摆脱了这种态度的人中间，也还存在着拘谨。

在你的心中，也许还存在着一种属于心理上的障碍，这就使许多人担心不能保持个性。这是一种愚蠢的、为现代所特有的恐怖。个性的目的，并不在于个体本身，而是一种必须与世界广泛接触的东西，它必须抛弃它的孤独之癖。放在玻璃杯里的个体一定会枯萎，只有那种能够在人类的交往中自由发展的个体才会快乐。

爱情、孩子、工作是人与社会接触的主要动力。在这三者当中，爱情当居首位。此外，爱情对于父母爱子之心的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孩子习惯于模仿父母，

如果父母不能互爱，这些特点在孩子的身上体现的就只是一个人的特点，而与另一个人截然不同。

工作总能使一个人与外界有广泛的接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从事工作时所具有的精神。纯粹为了金钱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只有那种包含着某种爱的工作才有意义。仅仅为了获取爱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爱和那种以金钱为目的的工作，毫无性质区别。

为了得到这种价值，爱必须觉得被爱者的自我和他本人的自我同样重要，应该和别人的感觉和愿望一样。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根据自己的意识，把我们的自我感觉传达给别人，也应当根据我们的本能，去这样做。

爱有着自己正当的理想和道德标准，但这些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对于一切性道德不分的反抗中消失了，没有爱的性交，是不能使本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我不是说这种性交不能有，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面临障碍，爱就不会产生。

没有爱的性交没有多少价值，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把性交当成以爱为目的的尝试。

像我们所见的那样，爱的强烈要求，在人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爱是一种无政府的行为，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内。

如果与孩子无关，倒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如果与孩子有关，我们就会处于一个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人种的生物目的服务的格局之中。我们必须有一种与孩子有关的社会道德，如发生冲突，这种道德便能支配强烈的爱的要求。

男人生活在他的头脑里，他比较心理导向，因此有更多的男人发疯，更多的

男人自杀。女人并非弱者，男人比女人更弱，因为头脑无法像身体那么强壮。头脑到了很晚才进入存在，而身体已经有一段很长的经验，也是当她们进入了朝向神的途径，这个“根植于身体”就变成一个难题。

在生活当中，在自然的生活当中，女人是胜利者，但是灵性的生活是反对自然、超越自然的，所以她们的“根植于身体”变成一个难题，除非她们的整个头脑都变成有意识的，否则她们的“根植于身体”将不会离开她们，她们深深地根植于它。

男人就好像一只小鸟，在空中飞翔，而女人就像树木，根植于大地。当然，她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滋养，每当有一只小鸟或一个男人想要休息，他就必须来到女人的树荫下，他必须来到树下被滋润，并得到庇护。

拿自然的生活来说，这是好的，这是有帮助的，在这个点上，女人是胜利者，也是当一个人开始走向超越自然的路线，那个帮助会变成障碍。

在最终的顶点，在心灵存在的最高峰，男人会变成女人，就好像女人会变成男人一样，它并不是单向的，它不可能如此，因为他们是相反的两极。如果女人变成像男人一样，那么男人会变成怎样？他将会变成像女人一样，那么相反的两极就融解了。

女人必须将她的无意识蜕变成有意识，将她的非理性蜕变成理性，将她的信心蜕变成探询，将她的等待蜕变成行动，而男人则必须去做刚好跟这个相反的事，他必须使他的行动变成休息，使他的不安静变成一种安详、一种静止，使他的怀疑变成信任，他必须融解掉他的理性，使它变成非理性，那么一个超理性的人才诞生。

男人必须从男人的状态来移动，女人则必须从女人的状态来移动，因为男性的头脑只是一半，一半无法知道整体，女性的头脑也只是一半，那一半永远无法

知道整体，两者都必须从他们的静止状态开始移动，变成液体状的，互相融入对方，变成无性别的。

我要引导男性去变成女性，同时我要引导女性去变成男性，好让两者都能够融解，好让那个超越能够达成，而性别消失，因为性别的存在是一种分裂。你知道“性”这个字意味着什么吗？它在拉丁文的原始字根意味着区分、分开，所以当你达到神，你必须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

试着去了解，部份必须离开，好让你能够变成整体，你不应该跟任何分开的部份认同，好让那个看不见的能够进入你。爱不是一项生意，所以不要像做生意那样，否则你会错过你的生命，错过你的爱，错过其中所有美的东西。因为所有美的东西一点也不像做生意那样，生意是世界上最丑陋的事，是一个必要的罪恶。但是存在不知道生意，树木开花，它不是一项生意而群星闪烁；它不是一项生意，你不必要为它付钱，也没有人从你那里要任何东西。

爱是一个聚会，是生与死激情高潮的聚会，除非你懂得爱。否则你便错过了，你出生，生活，然后死去——但是你便是错过了，你大大地错过了，你完全地错过了，你彻底地错过了，你错过了生与死的间隔，那个间隔是最高的峰巅，顶点的经验。

要达到它就要有几个步骤。第一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爱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此时此地，你不能在过去爱，许多人只生活在记忆中，他们爱在过去。

如果你想得太多，想象总是关于过去或关于将来的，你的精力将会从情感中转移出去、情感是此时此地的。如果你的精力正在进入思考的形式中，那么你将没有足够的精力注入到情感中，那么爱也将是不可能的。

第一步就是活在此时此地。将来和过去带来的是思想，而思想毁灭情感。一个人太多地被思想所占据的话，渐渐地也就会完全地忘记他还有一颗心。一个人

进行太多的思考，渐渐地便会开始进入一种情感无权发言的境地。

不去倾听情感，渐渐地情感就开始遗弃地。有千百万人处在这种不知道心的含义的状态之下，他们认为心只是一个器官，他们的整个的集中点是在头脑，头脑是一个极端，它被需要，它是一个好的工具，但它必须被当作奴隶来使用，它不应该是主人，一见头脑变成了主人，那么心被留在其后，你会生活，也会死亡，但你将不知道神是什么，因为你将不知道爱是什么。

一开始接触到那同样的幽暗的间隔，看上去像爱，当你完全地迷失进去的时候，它变成了神，爱是神的开端，或者神是爱的最终的顶点。

爱的第二步就是学会将你的毒素变成蜂蜜。因为许多人去爱，但他们的爱往往被恨、嫉妒、生气、占有的毒素所污染，一千零一种的毒素包围着你的爱，爱是一个精细易碎的东西，好好想想，生气、憎恨、占有、嫉妒，这样爱如何能生存。人们往往用头脑，而忘了心，他们属于大多数人，而一小部分人生活中还用着一点心，但就那小部分人也还犯着另一个错误，爱的微弱之光被嫉妒、憎恨、生气这一千零一种毒素包围着，于是整个旅程变得痛苦，爱是介于天堂和地狱的一把梯子，但这梯子总是有两个方面：你能向上爬，你也能往下走。如果那儿有毒素，那么那梯子便使你往下。你将进入地狱，不是进入天堂，不是获得美妙旋律，而是你的生命变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噪音。一种冲突的、交通上的噪音，一种疯狂的噪音，一种没有和谐的一切噪音的杂烩，你将处在疯狂的边缘。

第二件事要记住的是学会将你的毒素变成蜂蜜。它们是怎样被蜕变的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事实上，称它蜕变并不正确，因为你不做任何事情，你只需要耐心，这是我告诉你的最大的秘密之一，试试看，当你开始生气时不要做任何事；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它，不要反对它，也不赞同它，不要与之合作，也不要压抑它，就看着它，耐心地看看它发生什么，让它上升。

当毒素占有你时，不要带着情绪做任何事，只是等待。等毒素开始变换成它

的另一面，这是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法则，每一件事不断地变换成它的另一面，正像我告诉你的男人变成了女人，女人变成了男人，在你的内在有同期性的变化，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成好人，圣人有罪人的一刻，罪人有圣人的一刻，人只要等待。

不要压抑，不要按照气愤的情绪去行动，然后很快你将看到你的脸变得温和了，眼睛变得较平和了，能量正在变化，男人转变成女人，很快你将充满光彩，气愤时的那种红润，现在是某种光彩，是一种美丽出现在你的脸上，显现在你的眼睛里。

当你处在积极状态下行动，不要强迫积极，要等待积极它自身的到来，这是个秘密，当我说“学会将你的毒素变成蜂蜜。”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第三步就是分享。无论什么时候处在否定状态，你要自己承受；无论什么时候处在积极状态，你就要分享。

人们往往会与别人分担他们的否定情绪，他们不与人分享他们的积极情绪，人类非常愚蠢，当他们幸福时，他们不分享，他们是非常吝啬的；当他们不幸时，他们却非常非常地浪费，他们准备多多地与人分享，当人们微笑时，他们笑得非常非常地节约，就是这样。就是如此，但当他们生气时，他们便全然地生气。

这第三步就是要分享积极的情绪，那将让你的爱如奔流的河水从你心中升起，当你分享时，你心中的困境便开始移动。

分享是至高的精神美德之一，是最伟大的精神美德之一。

男性渴望幸福想结婚

应该说，有些将要结婚的男人，对于将来的幸福或子女的健康发生疑问时，总要找医师解答。医师在这方面所给出的意见，以前不受人重视，现在稍有改善。

因此，做医师的要特别小心，不应轻率地把请教的人打发开，应尽可能地替他作一番郑重与周密的考虑，然后发言。但是这种考虑必须依据的科学资料现在还不完全，也还没有整理清楚，至少对一大部分婚姻的例子来讲这种资料还不适用。整理的工作已经开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应用，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一桩婚姻可能出现的结果，这种预料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总要比目前准确得多。

举一个经常发生的例子。一个青年男性或青年女性，事前不向家人亲戚朋友说明，又不听旁人的劝告，突然宣告将要和某某人结婚。这样一桩婚事，表面上并不违反什么原则，实际上从别的立场看，是绝对不相宜的。也许第三者看不过去，便向医生请教，有时还指望他明白地宣告，说明那轻率从事的对方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

对方精神上是否健全，应该仔细探讨，不过就大多数的例子而言，这是一个有罪名的说法，那所谓轻率从事的对方或许在遗传上有一些轻微的神经变态的倾向，这种变态，即使可以叫做变态，在分量上是很轻微并不超越寻常生理的限度，所以只凭医生的话是不可信的。

从许多例子来看，我们所遇到的决不是两个疯狂的人，而是两个还没有从“狂风骤雨”里钻出来的青年，新发展的性爱生活原是这番风雨的一部分，当其突然来临的时候，势必产生一种生理上的惊扰和因惊扰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失衡。等到情绪安然稳定下来，生理的惊扰消失，精神的平衡自然恢复，并且不会发生第二次。

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行为正直而操守纯洁的青年男性，因一时好奇，或受朋友的怂恿，或完全因偶然巧合，认识了一个妓女，情投意合，想和她结婚，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以为妓女是俗人眼里最下贱的，既受人糟蹋，又永远得不到翻身，如果结婚，就可以把她解救出来，脱离苦海，岂不是功德无量。

这是他当时自觉的动机，在他不自觉的心理驱动下，一种正在暗中摸索的性冲动也可能存在，不过在那时被搭救的理想所隐蔽而看不大出。和妓女结婚，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事实上美满的例子也有，不过在男性方面应该是一个成熟而有经验的人，并且在成婚之前也一定有过一番谨慎的选择。

如果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男性，再加上理想所唤起的一股热情，莽撞去做，结果是不会圆满的。遇到这种例子，最好的方法是取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然后劝止。

直接与强烈的禁止手段不但不行，还会煽动他的热情。虚与委婉的用意是让他把婚事延缓下来，在延缓期间，就可以设法让他对所爱的人有静心观察的机会

婚姻也有许多局外人的视角所达不到的特殊疑难问题。虽看不到，但并不证明没有问题。男女之间，不发生婚姻则已，否则总有一些要解决的问题，问题发生的方面尽管很不一致，但总有一部分会请教到医生。

近年来，请教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而所请教的问题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对这一类特殊问题，在这里只能略微提到，一是为本书的范围所限，一是要解决这类问题，也不容易有什么简单的答案。每一桩婚事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单独解答，对甲最有利的解答对乙说不定是最有害的。全世界的各大都市里都可以有婚姻的咨询机关，专门帮助已婚与将婚的男女就婚姻问题的各方面寻求答案。

这种问题包括年龄、个人的健康与家世的健康或遗传、婚前的体格检查、对于婚姻生活的准备与准备到何种程度、生育的发展与节制，特别是夫妇在身心两方面可能融洽的程度，这种程度的深浅和婚姻的幸福往往很有关系。

婚姻的年龄问题就是对待晚婚、早婚问题。究竟迟早到什么程度，才对夫妇的幸福以及健全子女的产生最为有利，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目前来说，这方面的资料太少，范围也不够宽广，难以做出一些适用于多数人的答案。

在几世纪以前，结婚的年龄，男性是在 19 岁以下，女性是在 15 岁以下，相差很多。

不论在什么年龄结婚，男女双方，为未来夫妇的关系和子女的生育设想，都应当有一次周密的医学检查。这不但有利而且值得做，就道德的立场说，也是义不容辞的。检查的手续要做得早，在婚约发表以前，许多亲友知道以前，就应该做。检查的工作也必须包括女性的妇科检查和男性的生殖与尿道检查。有人主张，检查后必须有证书，证书的有无应当成为婚约成败的第一个条件，将结婚的人应当被迫接受检查并出示各自的受检证书。这种主张，在有的地方，已经实现。

婚姻还有另一种准备工作，其意义的重要更在医学检查之上，双方当事人私下自己做的。这种准备工作是性知识和性感觉。

婚姻关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性关系，在发生这种极亲密的关系以前，双方对于自己和对方将要发生这种关系的条件，应当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他们应当自问，对于自己和对方身体的构造和生理，以及彼此对于性题目的情绪反应，是否已有充分的了解。

狄更生和比姆女士在他们的研究里所说到的一点很寻常，那就是“未来的新郎觉得对方‘太神圣’得不可侵犯了，因此，对于她内部的结构，不作什么探索的尝试；未来的新娘也把自己当作是一棵树，或者一根实心的木头。这种男女对于生理与解剖的知识比起古代的波斯人来，并不高明多少。”

他们特别应当自问一下，对于婚姻之爱或床榻之爱的观感究竟如何。有的夫妇深怕对方触摸到自己的私处和其他平时不大显露的发欲带部分；有的夫妇从来没有在浴室里碰过头，不是他怕见她，就是她怕见他。在这种情形下，根本谈不上身体上的开诚布公，和盘托出，要取得精神上的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更不必说了。试问这样还会有真正的婚姻结合可言吗？

在婚姻关系中，性的关系虽属中心，但并不是惟一。在许多婚姻的例子中，真正的性关系始终不曾有过，而双方有十足的性格上的认识的，也不能算完全不圆满。许多婚姻的研究都认为性情投合是婚姻幸福的最大钥匙。

两个人的性情，单独看，也许是很不错的，但放在一起，就合不起来，所以必须在婚前加以认识，而留在婚后加以体验是不妥的。最好在结婚以前，双方就能有较长期住在一起的机会，同住的环境必须能供给种种寻常必须解决的问题让双方共同设法应付。这样双方才可以观察到彼此对自己、对第三者以及对一般事物的反应方法。我特别提到对第三者以及一般事物的反应，因为只看双方彼此间的反应是不够的，这些在婚前婚后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天主教里的修士和修女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见习及格才可以正式做修士和修女，婚姻也应当有一个见习的阶段，见习有成，才在婚姻祭坛前立下正式的誓约。这种见习功夫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包括不包括性的交合在内，是一个次要问题。

所谓性情的投合，不是指性情的相同，有时相反的情形也可以彼此和协，只是性情的投合还嫌不够，见解、兴趣与才能的投合也至关重要。性情的不合，例如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也许会和谐而相辅相成，甚至比性情相似和反应相同更可以促进婚姻的幸福。

想要把这种幸福长足进展与长久维持，趣味和才能的相投也是极基本的，所谓相投也不一定非相同不可。一方不爱好音乐，一方则专心致力于音乐，大概是不容易调和的，政治见解不同，即使性的关系很和谐，怕也不一定能维持长久的美满。如果宗教的信仰完全不同，则婚姻决无和乐之理，无论如何不应缔结。

在现代社会，做妻子的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成员，她多少有些家庭以外的兴趣，所以对于外界社会各种较大的活动与潮流，双方都应有些共同和相似的见解，只要大处相同，细节不同，就不要紧；所持的原则一样，方法不同，也不要紧，如大处和原则上有冲突，婚姻生活就难以美好。

对于任何一桩婚事事前的一切劝告总有几分臆断与预料的性质，未来是否一定成为事实，谁也不敢断定。当事人，尤其是很年轻的，会因发展而随时变，今天这样，明天却不一定这样。

这造诣的过程往往很慢，也许要费上好几年渐进的功夫，一种圆满的与深切的婚姻关系，真正叫做婚姻的婚姻关系，才有希望确立。

也有一些人，因为特殊的个人原因不适宜婚姻，我们也便不以婚姻相劝。也有一部分人，因遗传关系，可以让他们结婚，而不许生育子女。关于这种人，比任何方法都管用的是让做丈夫的接受绝育手术。

男性渴望幸福神圣的职责

过去人们把婚姻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不是由神道命定，便是由国家裁决。

法国散文家蒙田认为结婚不是为了自己。在当时，满意不满意这一说法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把这种神圣的义务完成以后，就算是取得了幸福。

至于那些得不到幸福的，是一些例外的人。这种对婚姻的看法，不但得到宗教的裁判，也受到艺术的承认。一些爱情小说，结果总是夫妇团圆，百年好合，而主持婚姻的教会也认为这是惟一可能的结果，其它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看法现在早就过去了。从前所承认的并不是真正的事实，而是为想象所蒙蔽的事实，近代的社会与生活状态确是比从前要复杂得多，许多人的见解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婚姻不仅不能供给百年好合的甜蜜生活，并且连相当的满意和幸福都谈不上。

弗洛伊德曾说：“大多数婚姻的结局是精神上的失望和生理上的剥夺。要消受得起婚姻的折磨，女性必须特别健康才行。”

这一类的话，声望没有弗洛伊德大的作家更有不知多少人说过，只要愿意，可以连篇引用。这些话所传达的其实是一些个人的印象，在科学的题目上，个人的印象最容易错误而不足为凭，更不会有统计的根据。

这种个人印象，和别的有经验的观察家所得的个人的印象不一定相符。我所知道的婚姻的弊病，无论就丈夫、妻子或子女这三方面的哪一方面而言，确实是很多而很实在的。

美国洛杉矶家庭关系研究所的波普诺发现在 1930 年间连续到所里来咨询的 500 个例子里，凡夫妇间发生困难，只有 1 个没有性的成分，其余 499 个例子里，性生活的不调和成为增加问题复杂性的因素。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对于婚姻的未来也不必过于悲观，假如社会能比以前再谨慎一些：对于青年的理想，不多加干涉，对青年涉世的最初若干步骤，不强加指导而把它们引入歧途，这种悲观对待婚姻的态度也就可以缓和一些。

婚姻普遍的不满意，好比塞翁失马，不一定是十足的祸患。它表示从事婚姻的人大都有一种很高的理想，并且都忠于实现这种理想，因这种理想不容易实现，才产生不满与失望。

这是一个好现象，事实上婚姻是一个造诣的历程，一个需不断努力攀登的历程。在西洋文明里，也许在任何文明里，真正的婚姻关系，即十足配得上叫婚姻的婚姻关系决不是那么简单，这原在我们意料之中，不足为奇。加入婚姻的人，对自己，对对方，十有八九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全不认识，只是盲人骑瞎马似地去做，一下子又怎么会到达真正圆满的婚姻关系呢？就个人而言，婚姻至少有三方面，一是身体的关系，二是精神的关系，三是一种建筑在共同生活上的人事关系。

关系如此复杂，而准备功夫欠缺，自然有一定的困难。未来困难如何才能克服，如何才能到达真正圆满的境界，是势在必行的事了。如始终达不到这种境界，婚姻关系多少总有一些缺憾。如再加仔细地观察，在大多数例子里，可以发现种种弥补的办法，不圆满的婚姻关系在所难免，这种补偿的办法也就不足为奇。

要看清楚婚姻的事实，范围很广的调查是不可少的。即使有了这种调查，可能得到的，也不过是大概的结果。许多人不愿承认他们的婚姻是一个失败，对自己不肯承认，对别人更是讳莫如深。

有一些人态度刚好相反，婚姻生活总有一大堆不可避免的小烦恼和小冲突，当其在烦恼和冲突之中时，他们很容易把婚姻的大纲或婚姻的中心事实完全忘却，承认他们的婚姻是失败了。

当烦恼和冲突的情景过去后，他们有机会超然地观察到生活的好处，婚姻大体的情形又复呈露在他们眼前，这时，他们又会承认，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一大成功。这其间还有一个产生困难的基本原因，就是很少有人了解，他们所希望的婚姻生活的满足属于什么性质，他们不了解婚姻是人生的一个缩影，太容易和太舒服的婚姻生活就不成其为一个缩影；而对于人生真有阅历和真已备尝甘苦的人，这种太容易和太舒服的婚姻生活事实上也不能给予什么满足。

一样是婚姻，对女性，它的意义比男性要深长得多，因为既要关心丈夫，又要生育子女，又要管理家务，身兼数职，她必然要把更大的一部分精力交付出来。如果在她那方面有失望的感觉，那失望一定是更严重的。

男人生活大部分在家庭以外，他的家庭生活和家人的关系，所处的是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在他的活动范围里，家庭只占比较小的一角。在这一小角里，他用不着活动，只需休息。反过来，女性时常要感到婚姻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因此她时刻要顾虑到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让我们回想到狄更生的很有意义的观察，就是“适应得当”与“不善适应”的两组妻子之间，主要的区别是前者比较

客观，不受内心冲突的骚扰。这种比较客观和不受内心冲突骚扰的妻子，在生活态度上，和普通的丈夫就有几分相像。

我们经常遇见一些妻子对于婚姻的失望，虽然是表面的或离表面不远，却是一个现象。这种失望当然是和近代妇女生活的变迁有连带关系的。

近代的妇女对于生命已有更大的展望，因此也就有更大的要求。男性的优势，她们自己比较委屈的地位，在她们的母辈认为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在她们看来却是很不满意的。

有人把婚姻描写成“一种两极间的张力。”

婚姻是一元的，这一元是由两个焦点组成的，焦点之所以能彼此维系，是由于其间有一种紧张的引力——他在别处说，张力也许是很悲惨的张力。如这焦点的关系必须维持不败，这张力是不能取消的。这种焦点间的关系事实上也是一般生命的一个象征，自有其增加生存的愉快的价值，在婚姻里是这样，一般的生命里也是这样。

男性渴望幸福合法的同居关系

人们对婚姻有许多看法，就它的基本方式而下一个定义的话，婚姻就是合法的同居关系。

在文明状况下，婚姻是一国风俗或道德习惯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一种契约关系。克里斯欣认为：“婚姻之所以为一种契约，不只是为了性关系的运用与维持，而是为了经营一个真正的共同生活。所谓真正，指的是一方面有经济与精神的条件做基础，另一方面更有道德的责任与义务做基础。”

如果从进入婚姻关系的人的生活来看，婚姻也是两个人自由选择的一个结合，其目的是恋爱的表现。

恋爱是个悦耳的词汇，提到恋爱，可能会把性冲动的任何方式的表现包括在内。我们必须把“欲”和“爱”分别来看，欲是生理的性冲动，而爱是性冲动和其它冲动之和。欲和爱的区分，是不容易用言辞来表述的。许多专家所提出的定义，我们可以接受，因为它们多少可以把这种区别的一部分指出来。

恋爱是欲望和友谊的一个综合，或者完全从生理的立场看，可以跟着沃瑞尔说，恋爱是经由大脑中枢表现出的性的本能。

我们也可以信奉哲学家康德的说法，他认为性冲动是有周期性的一种东西，所谓恋爱，就是我们借了想象的力量，把它从周期性里解放出来，成为一种有连续性的东西。发展到极至的恋爱方式会成为一种完全无我而利他的冲动，这只是表面的看法，它的出发点还是一个有我的冲动，即使利他到一个程度以至于牺牲自我，中间还是有自我满足的成分存在。有些专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对于有我的出发点曾再三指出，但他同时也承认，恋爱到了后来，便和这出发点脱离。

不去谈性的成分，弗洛伊德和其他作家都认为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个真正恋爱对象，长大以后，除了那些有神经病态的人外，这最早的对象会退隐到背景里去，别的恋爱对象会取而代之。

性冲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是“有我的”，或“为我的”。但在发展成恋爱的过程里，也变为自觉的无我与利他的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利他的成分，即在性发育最初阶段里，就已经存在。在动物中，如果一个动物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对象，但知利己而不识体贴对方，求爱的努力不免归于失败，性交的行为便无法实现。

当性发育有了进展以后，这利他的成分就成为意识的一部分而可以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也可以把利己的成分完全克制过去。

恋爱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双重的。第一种的发展是由于性本能地向全身放

射，经过宛转曲折的神经脉络，甚至绕了些远路，为的是要使性领域以外的全身都得到放射影响，平常性冲动一经激发，如果可以不受阻碍地达到目的，其过程大概如此，否则又另当别论。第二种的发展是由于性的冲动和其他性质多少相连于心理因素发生了混合。

性发育成熟后，恋爱的发展便添上一些相连的情绪的成分，就是从亲子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种种情绪。

女性到这时，其性爱便与因子女而唤起的恋爱与忍耐心理相连；而在男性，性爱中也会添上亲子之爱的成分，有一种防护的情绪作用。婚姻制度成立之后，性爱也就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这种性爱的表现，就其最崇高的例子而言，可以和创设宗教与创造艺术的各种冲动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的先驱。法国人类学家勒图尔诺告诉我们，在许多民族里，关于性爱的诗歌创作，女性往往占领导地位，有时对性爱的表示，不但处领导地位，并有称霸趋势。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些可供参证的事实，那就是因性爱的动机而自杀，在原始民族里，也是女性最多。

在许多文明的民族里，性欲的发展成为恋爱是很迟缓的，文明社会中，对很大一部分人，这种演变也是粗浅的。天下到处都有“性欲”的概念，也到处都有表示这概念的词汇。但“恋爱”的概念并不普遍，许多词汇里就没有这个词。不过恋爱的出现，也不一定完全随着文明的程度而变化。有时你满心指望着可以找到它，结果却总是失望。有的地方你认为决不会找到它，结果却找到了。

在动物中，性欲也很有几分“理想化”的程度，特别是在鸟类，因为失偶的缘故，伤感到自我毁灭的情境，这期间所牵涉到的决不止是单纯的性的本能，而是这种本能与其他生命要素的一个组合，一个有密切联系的组合，其密切程度，

在人类中，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有的未开化民族中，好像找不到基本的恋爱概念，如美洲印第安人中的纳化族人，就找不到什么基本的字眼。

希腊人，性爱的理想也发展得相当迟。

在希腊人看来，真正的恋爱几乎总是同性的恋爱。希腊早年的伊奥尼亚籍的抒情诗人们认为，女性只不过是男性享乐和生男育女的工具。

诗人泰奥格尼斯把婚姻的功能和牛类的繁殖等量齐观。另一个作家阿尔克曼，对斯巴达的健美女性，想说几句称赞的话时，就说她们很像他自己所结交的那一班美艳男朋友。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他的剧本里，借一个父亲的口气说，如果他不管他的几个女儿，她们就会为非作歹，闹出笑话。只有女性才会发生恋爱的行为，男性是不屑一顾的。

在希腊文化的一个时期里，性爱是人们看不起的，是不值得在公众面前提出或表演的一个题目。从广义的希腊文化范围，即从大希腊的范围，而不从希腊的本部来看，才可以找到男性对女性真有一番性爱的兴趣。不过性爱受人推崇，认为是生死予之的一种情绪，在大范围以内，也是到亚力山大的马其顿时代，才成为事实。

欧洲人的生活里有浪漫性质的性爱观念。后来克尔特族上场，把特里斯坦的恋爱故事带进欧洲生活，这种性爱的观念才算完全成立，从此成为基督教化的欧洲文学与诗歌的一个中心题材，也成为个人行动的推动力量。在当时，这种观念的流行，只限于上流阶级，至于在一般民众的眼里，所谓“恋爱”和单纯的性交行为相同。

充分发展的恋爱当然不是单纯的性交，而是扩充得很广与变化很复杂的一种情绪，性欲不过是和许多别的成分协调起来的一个成分罢了。

斯宾塞在《心理学原理》一书里，对这种情绪的分析有一段很有趣的讨论，他认为恋爱是九个不同的因素合并而成的，彼此分明，每个都很重要：一是生理上的性冲动；二是美的感觉；三是亲爱；四是钦佩与尊敬；五是受人喜欢的心理；六是自尊；七是所有权的感觉；八是因人我间隔阂的消除而取得的一种行动的自由；九是各种情绪作用的高涨与兴奋。他分析之后说：“我们把我们能表示的大多数比较单纯的情绪混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庞大的集体，这集体就是性爱的情绪。”

我认为这样一个详尽的分析也是不完全的，它遗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建立在亲子之爱本能基础上的一部分情爱。这因素的重要性很容易看出来，婚姻生活到了后期，严格的性因素渐渐退到背景中去，从此，丈夫对妻子，尤其是妻子对丈夫的情爱，很容易变成对子女的情爱。

人们对恋爱的种种分析，总结起来，就是：“恋爱的定义是极难定的，好比生命的定义一样，其所以难定的理由正好相同。恋爱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无论是什么方式，都是很重要的，恋爱地位的重要，除贪生怕死的本能之外，就要算第一了。把所以构成家庭的基本因素汇合在一起，它维持着家庭的关系，它把一个种族或民族的人统一起来，使人之间都有一种契合和同胞的感情。”

关于恋爱的讨论，也许已证明恋爱是很复杂的一种现象，它既不是浅见者所认识的那种浪漫的幻觉，也不是羽毛未丰的精神分析家所想象的那种厌恶的转变。问题剧作家易卜生说：“今日天地间没有一个词比恋爱这个小小的词更要充满着虚伪与欺诈。”

当然，无论这种虚伪与欺诈成分有多少，恋爱决不是一个凭空虚构的名词，它的确代表着一种状态、一个现象、一事物，这个词是被人滥用了。

滥用的方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正表明这名词所代表的真正事物自有其不可估限的价值。人世间惟有最值钱的东西，如黄金、钻石，才会遭到假冒

与滥用。世间没有大量的黄金，于是，便有人用镀制的方法来冒充，用减轻成色的方法来混用。

人在社会里生活，自然也不会只有自我，而无他人，孤独的自我是不可思议的。既有他人，也就不能不发生对他人的种种爱欲，反之，除非先把自我抛开。要把他人和他人在自我身上所激发的爱欲完全束之高阁，是不可思议的。恋爱是和生命牵扯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如果恋爱是个幻觉，那生命本身也就是幻觉，我们不能否定生命，也便不能否定恋爱。

我们也可以追随初期基督教徒之后，接受他们在讨论教义时的说法，认为上帝是爱，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男性渴望幸福系恋爱的艺术

恋爱之所以成为一种欲，是成体系的，受统一的原则支配，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有下列几种特点：“它是稳定的或稳称的，调节的、有含蓄的、有内在而深沉的理性存在。”

恋爱之所以为人体内一种心理状态，其基本条件是“从对象身上所取得的快乐的感觉”。这种快乐的感觉当然不一定全是快乐，其间也夹杂着痛苦，甚至牵引出许多悲哀，这几种情绪是彼此合作、互动而揉合在一起的。

当痛苦与悲哀的成分同时存在时，恋爱成为一种有快感的欲，才有力量。恋爱正因为如此复杂，如此含蓄，它才可以成为六欲的班头，七情的盟主，我们这样推崇恋爱，决不是一种烂调，而是有庄严意义的。

我们这样推崇恋爱，还没有把它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恋爱实在还有比这更大的价值。所谓“情欲的班头盟主”，只不过是一种放大的唯我主义，一种涉及到两个人的唯我主义，比起单纯的唯我主义不见得更崇高。

可以说恋爱是力量的源泉，而恋爱中的两个男女是生发这种力量的机构。假如双方所发出的力量都完全消磨在彼此的身上，不是白白地耗费了么？恋爱原是一种可以提升生命价值的东西，如恋爱的授受只限于两人之间，范围就过于狭小。

有志向的人，想提高生活水准的人，就觉得它不配做生活的中心理想了，这话罗素也曾说过，我认为是很对的。恋爱在两人之外，一定要有更远大的目的，要照顾到两人以外的世界，要想象到几十年生命以后的未来，要超脱现实以外的理想境界，也许这理想永无完全实现的一天，但我们相信，爱的力量加一分，理想的实现也就近一分。“一定要把恋爱和这类无穷极的远大目的联系起来，它才可能表现最大的庄严与最深刻的意义。”

在很久以前，恋爱的艺术，在心理学与伦理学的书中，是找不到地位的。只有在诗歌里，才能发现一些恋爱的艺术，诗人也大都承认，他们谈到这种艺术，也认为是不大合法而犯禁忌的艺术，谈到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但并不觉得这是应当谈或值得谈的。

15 世纪前，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许多关于恋爱艺术的诗词，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这种诗，有人认为合乎艺术的原则，加以歌颂，有人则认为是海淫的，加以诅咒。

一直到近代基督教化的欧美国家，大家的看法才一致。一般的态度，总以为性爱至多是一种人生的责任，一种无可奈何的责任，把它在众人面前提出来讨论，或在文艺里加以描绘，是不正当、不道德的。有人说，就近代而论，恋爱艺术的萌发，是到了 12 世纪的法国才出现的，但其为一种艺术，却始终是不合法的，只能在暗处发展。

今天，把恋爱当做艺术的看法已渐渐得到公认。他们觉得这种看法是对的，道德学家与伦理学家也接受与主张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只是责任的观念，已不足成为维持婚姻关系永久的一种动力，我们只有用艺术的方法，把恋爱的基础开

发出来，把夫妇间互爱的动力增多，才等于把婚姻的基础更深一步地巩固起来，把婚姻的道德地位进一步稳定起来。

承认恋爱是一种艺术，在近代文明开始之初，就有些端倪了。法国外科医学界先辈大师帕雷教夫妇认为在性交以前，应当有很多性爱的戏耍，作为一个准备的功夫。更晚的则有德国人富尔布林格在他讨论婚姻的性卫生一书中，他认为凡是做医生的人都应当有充分的学力和才识，可以对找他的人，讲性交的方法与技术。

谈到这里，我想到女性性冲动的种种特点，以及女性性生活中所经常发生的性能薄弱或性趣冷酷的现象。只有当女性的性能有这种种特点以及不健全的表现，恋爱的艺术才得到了发展鼓励，在整个动物界中，求爱的现象大都有成为一种艺术的趋势。

我们讲到恋爱的艺术在卫生学与治疗学上的重要性。从前，这种解说是可能的，即便说来，也没有人能了解。以前，所谓恋爱的艺术是可以搁在一边的，可以一脚踢开，因为妻子的性爱要求向来无人过问，而丈夫的性爱要求很多人都认为可以暗地里在婚姻以外另求满足的途径。现在的趋势是承认妻子和丈夫同样有性爱的权利，我们也指望所谓一夫一妻的制度会切实地经过一番修正，不再像以往及目前那般有名无实。

恋爱的艺术，就它最细腻最不着痕迹的表现来讲，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在人格方面发生最亲切的协调的结果。不过就它的一般粗浅程度而论，这艺术也是寻常性卫生的一个扩展，是医生工作范围的一部分。如果平常的婚姻生活产生困难的问题或遇到困难的情境时，是有理由向医生领教的。

我们承认最美满的婚姻，最能白头偕老的婚姻，有时就是由这样两个玉洁冰清的青年缔结而成，他俩在婚前婚后真能信守原则。

这种冰清玉洁的态度与行为可以比做一把刀，操刀的人用这边的口子来割，是有利的，如用那边，就是有害的，不少例子证明，操刀的人往往用错了口子。

一个在旧时宗教与道德观念下培养出来的青年，在结婚以前越是“天真”，越是“纯洁”，结婚以后，他会发现，这种“天真与纯洁”便是粉碎他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礁石，害了自己，害了妻子。当然，一个在结婚以前专以寻花问柳为能事的青年，比起这种“天真”的青年来，在准备上也是一样的不适当，寻花问柳的人过于粗鲁轻率，会以对待妓女的方法来对待妻子。

所谓丈夫的责任也并不容易尽到。近代晚婚的倾向，特别是在女性方面，更让做丈夫的不容易尽到责任。在近代的文明状况下，女性在结婚以前，不少的时光是过着一种我们不认为比较贞洁的生活，在这许多年以内，她的性的活力，像电一般地发出来以后，总得有些去路，有些消耗的途径。在寻觅去路之时，她已养成种种牢不可破的习惯。她的整个神经系统已受过一番有形的训练，多少有几分硬化。

在性的体质方面，她的器官也已失掉原有的可塑性，对于自然功能的要求，不容易作正常的反应。迟婚的女性第一次分娩，常有许多困难，迟婚者的初次性交也有许多困难，这两类困难是彼此并行而同出一源的，还有人并不充分了解。

很多人认为青年期的前半不适宜结婚与发生性交的关系，认为此时期内的性交，对女性无异是强奸。这种见解实在是一个错误。相反，一切事实都能证明青年期内的少年女性，比起成年女性来，对于初次的性交经验，要容易领会。认为初次性交经验必须延缓的理由只有文明社会的传统观念做依据而无生物事实的依据。

在动物进化过程中，发育成熟的期限，有越来越缓的趋势，这种趋势当然也有它的意义，我们应该知道，进化过程中所延缓的是青春期的年龄，而不是青春期以后的初次性交关系。文明社会的种种要求迫使我们认为性交行为的开始越往

后推越好，如果我们顺受这种逼迫，便无可避免地要自寻许多烦恼。

我们应对男性的性生活加以调节，就女性方面也要同时加以考虑，不得不加以说明，如果我们要了解女性性爱方面的心理生活，也必须兼顾到男性。

女性的性生活大部分受男性性生活的限制，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性爱的艺术在心理学方面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一点，我们要再次提到阳动阴静、阳施阴受的道理。有人说，在性的题目上女性处于一个优越与支配的地位，男性不过是她手里的一个玩物。就我们和大多数的生物所隶属的高等动物界而言，阳性总是比较主动，而阴性总是比较被动的。就解剖学方面而言，心理方面的关系也反映出这种基本的区别，尽管在种种特殊的情形下，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上，阳施阴受的自然原则自然规范，可以有些例外，但总是不受影响的。

第二点，有史以来，甚至有事迹可据的史前时代以来，一切男女关系的传统观念也建立在这个原则上。在性关系的树立上，男性占的是一个优越与支配的地位。假设在这方面，女性主要的功能，以至惟一的功能，是生儿育女，任何性爱的表示，要有的话，多少也属一些游戏性质，没有正规地位。我们的社会制度也就建立在这条原则与这种假定之上，如婚姻制度，我们一面承认家庭中丈夫有法定的家主地位，妻子不负法律的责任，即妻子对丈夫负责，而不对社会负责；一面又于婚姻以外，承认娼妓的存在，认为只有男性有这需要。这些都是过火的，不合事理的。古代传下来的制度，尤其是这种制度在我们身上已养成的种种情绪与见解，要加以改正，需要相当的时间。

还得考虑一点，女性方面的心理生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羞涩的心理。羞涩的心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然的羞涩，那是和其他高等动物共通的；第二部分是人为的羞涩，建立在社会风尚上，不难加以修改。世上也有怕羞的男性，但羞涩终究是女性的特殊的品性。羞涩的品性是女性心理的一大事实，不容怀疑，

它和一般阴性动物在性活动之际所表示的柔顺驯服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先天关系，和社会的习俗又有不少的后天关系，这种先天的关系，因后天的关系而越发牢不可破。

就一般情形而言，这种后天关系的修改是不大容易的，传统的种种习惯，虽已发生变迁，但效果有限。不但有限，暂时还有一种不良的趋势，就是在女性的意识上，会引起一种不和谐的局面。意识包括两方面，一是体内的感觉，二是身外的表现。

今日的女性对于自身内在的性感觉欲望，已有自由认识的权利，但要在身外表示这些感觉与欲望，就没有这种自由了。结果现代的女性之中，十有七八知道她们要做些什么，但如果她们把这种需要老实地说出来，势必让男性产生误会。

以上讨论足够证明，我们目前所认识的女性应有的性生活领域有两个，这两个是彼此冲突的。第一个是，女性性生活的理想是古老的，和我们的文明同样的古老。女性的性生活应以母道为中心事实，这中心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这理想又说，这中心事实以外，其余的性生活大体上全应由男性执掌，女性除了成全她的母道之外，是没有性冲动的。

因此，女性的天性是单婚的、一夫一妻的、从一而终的，而男性既无需固守家庭，又少子女养育之累，心理品性的变异范围便比较大，婚姻也就很自然会走上多妻之路。因此，女性的性问题是单纯的、显而易见的，而男性却要复杂得多。

今天，另一种女性性生活领域的观念正在发展。这个新观念，我们认为比较健全的，因为它和两性价值均衡的观念互相呼应，和自然的事实更相吻合。

在今天的情形下，就在性生活领域以外，我们对男女两性的区别看法，也不像以前那般斩钉截铁。我们承认两性之间有极基本的差异，就其细节而言，也是千头万绪，这些差异只是一些很微妙与隐约的差异。男性天性多婚与女性天性单

婚的那句老生常谈究竟有几分道理，几分真假，我们已经讨论过。

应该说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就男女自然的区别而论，一样是性交的行为，其对女性所发生的影响与责任，在分量上，比对男性要重得多。所以，女性在选择配偶时，比男性要谨慎得多。但也有例外。世上也有很少数的女性，对母道完全不感兴趣，而和寻常的男性一样，随时随地和许多男性发生性关系。一般女性喜新厌旧的心理，大体上和男性没有区别。假如有所谓三角恋爱事件发生的时候，以一女应付二男，比起一男应付二女来，不但一样的擅长，有时则更见得八面玲珑。

把男女看做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彼此之间有一种极深的鸿沟，很坚厚的铜墙铁壁，是不对的。女性像她的兄弟一样，也是父亲生出来的，尽管男性与女性之间，有无数细节上的差异，彼此所遗传到的总是人类的基本通性。

男女的隔阂，甚至成为一种对抗的局面，自然的差异者少，而由于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不同的观念者多。

对于女性性生活实际状况的了解，为什么必须寻找大批的统计数字？女性一般的性生活状况如何？正常的女性如何？不同阶级或团体的女性如何？比起男性来又如何？这一类问题的答复，非有统计的资料不可。精神分析家和其他作家能供给的往往就是这类叙述，这种叙述又不免被学说的成见所支配，总有几分附会，其所有的根据只是少数特殊的男女例子，实际上不能做一般结论。

在性生活的领域，女性的被动性好像比较大，这一点是不是就暗示在生理方面的性要求和心理方面的性情绪，男女之间也有根本的差别呢？为测验这一点，我们有一个方便的办法，那就是性冲动的自动恋表现，男女之间，在次数上有什么相对的差异。汉密尔顿、戴维斯和狄更生，在这一点上，有过一番探讨。

为什么自动恋的表现与其次数可以做尺度呢？凡是自动恋的表现，无论是男

是女，我们都可以推论，背景总有一个主动的性欲在。性欲之来，是可以抑制而不是非表现不可的，只要有些表现的事实发生，我们一样可以作推论。三位医生所供给的数字并不一样，因为三家的探讨方法不完全相同，他们在征求答案的时候，被征的人有答或不答的自由，并没有必须照答的义务，有的问题就被跳过。

如果女性真有这种脾气，那凡是坦率承认有过主动的自动恋的答复，当然是特别有意义的，这种答复越多，意义便越大。

近代以来，妇女的身分地位，妇女的每一个活动的领地，都静悄悄地经历着一种革命，其结果虽对性冲动并无直接的影响，但间接的、并不存心的影响，却到处皆是。

在男性的地位与活动方面，却并没有发生可以对比的革命，结果当然是无可避免的失其适应的局面。妇女运动或妇女革命的种种效果，我们无法加以打消，也不想加以打消，那么要修正目前已失其适应的性的局面，那责任的大部分就得由男性来担当。

男性渴望幸福家庭生活的意义

也许男人认为，今天的家庭关系成了人们苦恼的根源，原因是因为某一方不快乐造成的。这种家庭关系，不能给予人们基本的满足，这也是整个时代不快乐的深刻原因。

家庭问题包罗万象，在这里我只论述一个对幸福的追求。即：改善必须发生在个人的天地里，而并不造成社会结构的改变。

造成家庭不幸福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也有宗教的、政治的。以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来说，使女人感到做母亲是沉重的负担，其原因为：一是单身女子能够独立谋生；二是家庭仆佣服务态度不好。

过去，女人因无法过单身生活才出嫁，那时单身女子不得不待在家里，在经济上先依靠父亲，随后再依靠某个并不乐意的兄弟。因为她没有工作，在屋外也没有自由可以享受。她不意愿去做性的探险，她深信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可恶的。要是她不顾一切防御，为某一诡计多端的花花公子所诱惑而失去贞操的话，那么她的处境就更为可怜了。

现代独身女姓受过良好的教育，不难过上舒适的生活，不需看父母的脸色行事。既然父母对女儿没有经济权力，他们也便不从道德上斥责女儿。

去指责一个不愿意被指责的人，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目前职业阶层中的未婚女子，只要她聪明和姿色出众，在不想要孩子之前，她便可以享受惬意的生活。一旦生儿育女的欲望占了上风，她就非得结婚不可，而且会失去工作，她的生活也就不会像她已习惯的那样舒适了。因为其丈夫的收入很可能还不如她原先挣的多，况且那收入还得维持一个家庭，而不像她从前那样，只需要养活自己一个人。

作为尝过独立生活甜头的人，她发现为了必需支出的每一分钱向另一个人索要有伤自尊心。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这种女人才裹足不前，不敢做母亲。

当一个女子不顾一切而做了母亲，那么她会遇上前几代女人不曾遇到过的问题，即难以找到称心合意的家庭仆人。她不得不将自己拴在家里，亲自去做那些与其能力和所受的训练不相称的活，如果她不亲自动手，会因为呵责那些偷懒的仆人而坏了情绪。如果她花精力去了解这方面的事，她便觉得把孩子交给保姆，是在冒最大的危险，像清洁与卫生这些最简单的事也不能如愿，除非她有钱雇佣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保姆。

由于忙于亲自操持家务，这样的女人变得让丈夫厌烦，让孩子憎恶。

丈夫下班回来，她会不停地唠叨。她和孩子的关系，必然会为自己做出的种种牺牲而向孩子索要回报。

为家所累，反而失去了一家之爱。要是她不问家务，而保持着欢乐和温情，他们或许倒会爱着她。这是她不得不承受的不公正损害。

现在，英国的城市居民，远远多于乡村居民。在美国，这一情形还不严重，但城市人口在迅猛增长。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占地辽阔，出城要花很长时间。那些居住在城里的人只得满足于一套房子，那是不带一寸泥地的小屋。收入微薄的人也只能满足于得到极有限的狭小空间，如有孩子，日子就更不好过，没有房间供他们嬉闹。职业界的人渐渐都住到近郊去了。对孩子来说，无疑是好事，却给大人的生活平添了许多辛苦。

过去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主人决定要做什么，奴隶就做什么，主人总是喜欢他们的奴隶，因为奴隶给他们幸福。奴隶们可能憎恨主人，不过这并不像民主理论所推测的那样普遍。即使他们恨主人，主人也一无所知。

一旦民主理论被接受，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一贯顺服的奴隶不再顺服，一贯深信其权利的主人变得优柔寡断。摩擦发生，给双方都造成了不幸。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攻击民主，因为动乱在重大的过渡时期都是免不了的。我们不应该因为在过渡时期，对损害人们幸福的事实视若无睹，不管不问。

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一个特例。父母再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权利反对孩子们，孩子们也不再感到他们应该尊敬父母。原先服从的美德现在变了。精神分析使受过教育的父母深感不安，唯恐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孩子。他们亲吻孩子，会造成恋母情结，不亲吻，可能会让孩子生气。

他们命令孩子去做事情，可能产生犯罪感，孩子又会染上不良习惯。比如他

们看见婴儿在吮吸大拇指，便想出无数骇人的解释，但又惊慌失措，不知该怎样去阻止他。

威风凛凛的父母，变得畏惧软弱，充满疑惑。古老而又单纯的欢乐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单身女子要做母亲，要比从前做出更多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谨小慎微的母亲对孩子要求太少，而唐突的母亲则要求太多。

前者压抑着自然的情爱而变得羞羞答答，后者想在孩子身上为那些割弃的欢乐寻得补偿。前者，使孩子的情爱得不到满足，后者，其情爱则受到过度刺激。

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最完美的家庭，都得不到纯朴的幸福。

白人的文明有一个奇异的特征，就是男女吸收这种文明的程度，与其生育率成反比。最文明的人生育孩子最少，最不文明的人生育孩子最多，两者之间还有一系列等级。如今，在西方一些国家，最聪明的那些人正在渐渐死去。要不了几年，西方民族将会减少，而由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移民来补充。

如果移民接受了所在国的文明，他们也会相应地缩减生育数。因此，具有这一特征的文明是不稳定的，除非这一文明能在数量上增加繁殖，要不然它早晚会灭亡，让位给另一种文明，在后一种文明里，父母的行为有一定的力量，能阻止人口的减退。

在西方国家，道学家们都竭力规劝。他们认为，每对夫妻都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生育孩子，不必考虑这孩子日后是否健康和幸福。身为男性的教士们，大谈母性圣洁的欢乐，称一个尽是贫困的大家庭是幸福之源。政府游说什么，相当数量的炮灰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足够的人留着给毁灭，所有这些奇特的武器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奇怪的是，做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论据能用于旁人，可一旦要用到自己身上时便不出声了。

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走了歪门邪道。教士只有在用地狱之火来威吓人们时才会获得成功，现在只有少数人相信这种威吓。任何威吓，如果不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它们决不可能左右人们的行为。政府的说法也太凶狠残酷了。人们也许会赞同由别人去当炮灰，但自己是不会去的。政府能采用的唯一对策，是尽力使穷人处于愚昧之中，这种努力，据统计，除了西方国家最落后的地区外，并无作用。

即使真有公共责任存在，男女出于这种责任感而生育的也不会多。他们生孩子，也许是相信孩子会增添他们的乐趣，也许是对如何避免孩子的出生全然不知。后一种情形至今仍很普遍，然而却在慢慢地减退。

如果一个人只考虑人类天性，而不考虑当时的情形，他一定会清楚地看到，做父母能从心理上给人以最大的幸福。这对女人来说更为真实，这对男人来说，这种幸福感是不好推测的。赫古巴对孩子的关心，远甚过对丈夫的关切，麦克德夫对儿女，也比对妻子更关爱一些。《旧约》里，男女双方都热衷于留下后裔。

在中国和日本，这一精神延续至今。有人认为这种欲望来自祖先崇拜。我认为恰恰相反，即祖先崇拜是人类重视家族延续的反映，与我们过去所说的职业妇女截然不同，除非生育的行动非常强烈，不然不会有人愿作牺牲。

对我而言，我认为做父母的幸福感，大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幸福。我相信，当环境诱使男人或女人舍弃这种幸福时，必定会留下遗憾。

如想一生幸福，在青春年华流逝之后，必须把自己当作是生命之河的一部分，发源于最初的细胞，不停地流向遥远而无人知晓的未来。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情感，如用固定的词句来表述，它自然是极其文明的世界观。作为一种模糊的本能情感，它是原始的自然的，与高度文明不和谐。

一个能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会名垂青史，他能以其工作来满足生命延续。平凡

人，只有借孩子来聊以自慰。

那些不愿生育的人，已将自己与生命之河分离，并冒着生命枯竭的危险。对他们来说，死亡就是结束一切，除非特别超脱。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拥有子孙，并且爱着他们的男男女女，未来尤其重要，这种感觉不仅出于道义，也出于自然和本能。如果一个人能这样将其兴趣扩展到个人生活之外也能将其扩展到更远的地方。像亚伯拉罕那样，当他想到其后代将去承受福地时，便感到无比快慰，有了这种感觉，他才摆脱了空虚，否则他会变得麻木不仁。

家庭的基础，无疑是父母对其亲生儿女所具有的特殊情感，它有别于父母之间的感觉，也不同于对他人孩子的感觉。有些父母毫无慈爱之心，有些女人能对他人的孩子产生如同对自己孩子的慈爱。尽管如此，父母之爱，是正常人给予自己的孩子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是我们祖先的传世之宝。

弗洛伊德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充分地考虑到生物的因素。不管任何人，只要观察过母性动物是怎样对待其幼仔的，就会发现这种行为，与它对雄性伙伴的行为截然不同。人类也存在这种差别，不过不那么显著。

如果不是为了各种特殊的情感，那么家庭作为一种制度便无需赞扬了，孩子可以让专家们去照看。只要他们的本能不曾衰退，那么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特殊情爱，对孩子，对父母本身都有重大意义。

对孩子来说，父母慈爱的价值，在于它比任何别的情感都值得信赖。朋友爱你是看中了你的优点，情人爱你是欣赏你的魅力，如魅力消失，朋友和情人或许会悄然离去。但父母却是在患难中最值得信赖的人，无论是在病中，还是在蒙受耻辱。

别人称赞我们的优点，我们都会感到快乐，虽说这样的称赞并不可靠。父母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感到他们比谁都可靠。

在男人青云直上之时，这或许不重要，但在他潦倒落魄之际，那就是你的宽慰和庇护。

在人类关系中，单方面的幸福往往很多，但双方都感到幸福就来之不易。狱卒可能以看守囚犯为乐；雇主或许以威胁雇员为乐。统治者以统治臣民为乐，而老式的父亲会以棍棒教子为乐。这些都是单方面的快乐，我们相信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使双方都感到快乐。

父母应该从孩子身上得到更多的乐趣，父母也应该增添孩子们的幸福。

如同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所有平等关系一样，这需要某种敏感和温柔，对别人个性的尊重，却不为日常生活的好斗性所推崇。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做父母的幸福：第一，其生物的本质；第二，父母以尊重他人个性的平等态度对待其孩子所得到的快乐。

为人父母的乐趣具体两重性。一方面是感到自身的部分肉体又获得了另一种形貌，使其生命得以在其它部分延续下去，这部分又能以相同的方式，赋予其部分肉体以另一种形貌。

小生命无依无靠，做父母的便有满足其需求的行为，这行为不仅满足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满足了父母的权力欲望。

只要你认为婴儿需要帮助，你对他的爱便不是无私的，这种爱是出于保护自身脆弱的天性。对父母权力的迷恋和为孩子利益的欲望，就发生了冲突，虽说左右孩子的权力在一定程度内是天经地义的，但孩子能尽早学会在各方面独立自

主，却是一件好事，不过它并不使具有恋权行为的父母感到愉快。有些父母从不明白这一冲突，仍然对孩子实行专制。

有些父母认识到了这一冲突，却因此遭受情绪冲突的痛苦。

在冲突中，做父母的幸福化为乌有。他们对孩子关怀备至，却发现孩子变得完全不合他们的期望。他们希望他成为军人，他却成了一个和平鼓吹者，或者像托尔斯泰，他们指望他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倒参加了黑色百人团。

如果你去喂一个能自理的小孩，你将权力置于孩子的幸福之上了，虽说你的本意是想减少他的麻烦。如果你使他清晰地认识到危险，是因为你想让他一直依靠你。如果你对他情感外露而期待回报，那么你或许想以他的感情来紧紧地抓住他。父母的占有行动将不同程度地引导他们走上歧路，除非他们心地非常纯洁。

有些父母，认识到这些危险之后，便失去了管教孩子的信心，对孩子来说，其父母的帮助远不及他们犯自然错误那么有益，因为让孩子最为担心的事莫过于大人缺乏决断和自信。

如果父母真心希望孩子幸福，便不应该让精神分析的教科书来指点他们怎么做，什么不该做，让他们走上正道。这种情况下，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将始终是和谐的，既不会引起孩子的反抗，又不会招致父母的失望。

这要求父母必须尊重孩子的个性，不仅仅是伦理的原则，应当作为某种近似神秘的信仰。并完全抛弃占有和压迫的欲望。这种态度不仅适合对待孩子，在婚姻和友谊中，也是非常适宜的。它将渗透到人类群体的政治关系之中，不过这是一种极为遥远的期望。

虽说人们普遍需要这一慈爱，尤其孩子，他们需别人的照料，又因为他们软弱，常遭到大人的轻视。现代人要获得父母的完美的欢乐，必须深刻体会上述那

种对孩子尊重的意义。对父母来说，他们不会因压抑其对权力的爱慕而恼怒，也不会像专制的父母那样，为孩子获得了自由独立而失望。具有这种态度的父母，他们所得到的欢乐，远甚于专制父母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经过温柔洗礼而清除了一切专制的爱，能给人一种更美妙，更亲切，更神奇的欢乐。

我很重视父母的情感，人们会觉得，做母亲的应当尽可能地为孩子多做事。在育儿知识不为人知的时代，这不难做到，那时，年轻母亲只是从老妇人那儿，接受一些并不科学的育儿法。

现在的育儿方法，只有那些在大学里研究过这一课题的人才做得好。儿童教育只有成为大学课程中所谓“教育学”的一部分，它才能被大众承认。就拿书本知识而言，人们都认为孩子到专家那里去学，要比从母亲那里学要好得多。但在其它领域，这并没有得到公认，因为所需的经验并没有得到认可，有些事情还是由母亲做比较好。随着孩子长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由别人去做更好。如这普遍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做母亲的可以省许多心，这的确不是她们的专长。

一个有专业技术的女子，即使在做了母亲之后，也应该继续发挥其专长，这对她，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在怀孕后期和哺乳期内，或许她无法工作，但婴儿出生九个月以后，它不应当成为母亲职业活动的障碍。当社会要求母亲为孩子做出不合情理的牺牲时，如果这母亲不是圣徒，就会希望从孩子身上获得补偿。

在许多情况下，凡称作出自我牺牲的母亲，对其孩子是异常自私的。尽管做父母可以和人生中的某个成份一样重要，如果把它看作是整个人生，这会使人感到不满，不满足的父母很可能会从感情上拴住孩子。所以为了子女和母亲的利益，做母亲的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兴趣和事业。

人们并不指望父亲为其孩子过分操心，但孩子爱其父亲，就像爱其母亲一样容易。如果妇女的生活能摆脱不必要的奴役，孩子就能在她的精心养育下健康成长。

男性渴望幸福孩子的利益

一个孩子作为家庭成员，所得到的利益，应该是应当有一些极好的教育环境，这些教育环境，应当胜过绝大多数家庭。还要注意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因为女性的道德对家庭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由于父亲的缘故。

我们必须研究，家庭对孩子个人心理的影响——这是佛洛伊德曾用精神分析法讨论过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制度在提高或减少父亲的必要性方面所具有的影响。我们必须弄清，是否希望国家取代父亲，甚至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取代父亲和母亲。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父母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环境，也必须注意其他复杂情况，如某一方不能承担做父母的职责，或者双方都不适合，为了孩子的利益，还是分开好。

在那些信奉神学而反对性自由的人中，流行着一种反对离婚的观点，他们认为，离婚对孩子是不利的。他们并不地道，因为既然主张这种论调的人具有神学思想，但他们却不能容忍离婚，也不能容忍避孕。即使父母一方有性病，而孩子也许会染上性病，也不能容忍。这说明，如果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走向极端，那就只能是种残酷的借口。婚姻和孩子利益的问题，应公正地去探讨，要认识到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绝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清楚的。

家庭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制度，它的存在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父亲的帮助是孩子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我们从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岛民们那里所看到的一样，类人猿也是如此，这种帮助，在原始状态下，并不是父亲存在的理由。

原始的父亲，不关心孩子和他的生理有直接联系，认为孩子只是他所爱恋女人的后代。因为他亲眼看到孩子的降生，正是这一事实产生了他与孩子之间的本能联系。在这个阶段，男人在保护他妻子的贞操时，并不注意生理上的重要。他发现妻子另有新欢时，会产生本能的妒忌。在这一阶段，他并不把孩子当作财产。

随着智力的发展，男人开始意识到孩子是他播种的结果，他要保证他妻子的贞操。妻子和孩子成了他的财产，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他们是很有价值的财产。他通过宗教使妻子和孩子对他产生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孩子尤为重要，虽然他比年幼的孩子健壮，但他总会衰老，而孩子则将进入生机勃勃的成年期。到那时，他们应当孝敬他，这样才能保证他的幸福。古训这样说：“孝敬你的父母，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得快乐。”

古代文化中，杀害父母的恐怖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不会想象自己会犯的罪行，如吃人肉的行为，是不能让我们恐怖的。

古代畜牧业和农业社会的经济条件，使家庭进入繁荣时期。那时，大多数人都得不到奴隶，获得劳动者最便利的途径，就是繁殖劳动者。为了使孩子们相信，他们应当为他们的父亲干活，而不得不借用宗教和道德的全部力量，使家庭成为一种神圣的机构。

从这时起，却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西方国家的家庭已变得模糊不清。家庭衰落的原因，一部分是经济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充分发展的家庭，无论对于城市居民还是对于以航海为业的人，都不是很适合。现代之外的各个时代，贸易历来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贸易可以使人们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沟通交流，并能使人们克服种族偏见。所以，在以航海为业的希腊人中，家庭的约束比他们同时代的人当中要少很多。我们还可以在威尼斯、荷兰和女王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看到航海对于摆脱家庭束缚的影响。

当家庭某一成员长期外出，其他成员留在家中时，他无疑是摆脱了家庭的约束，而家庭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削弱了。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也会产生和海上贸易相同的结果，即减少家庭的力量。另一种影响是奴隶制，在下层社会中，这种影响更为重要。主人很少关心奴隶的家庭生活，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男女奴隶配为夫妻， he 可以和任何他喜欢的女仆进行性交。这些影响是不会削弱贵

族家庭的，因为贵族家庭的建立是依据门第关系，以及古代城市生活中，所特有的家庭之争的胜利——就像中世纪下半叶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市生活。

在最初的罗马帝国，贵族制度曾失去过它的地位，最终获胜的基督教反对家庭，而且规定了把家庭放在次要位置上的道德标准。其位置之低，是道德标准中从没有的。在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中，重要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灵魂和上帝的关系。

佛教的情况提醒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纯粹经济上的原因。佛教注重个人的灵魂净化，是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也值得怀疑。所以有关家庭的思想，对他们比对任何其他阶级都更为有利。后来，人们普遍轻视现实世界，而寻求灵魂拯救，致使家庭在佛教的道德标准中，处于一种不重要的位置。除了穆罕默德之外，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如果孔教可以称为宗教，孔子也在其列——一般都对社会和政治十分冷淡，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反省、训诫和自我否定使灵魂达到尽善尽美。

有史以来所产生的宗教，与史前的宗教相反，它们是个个人主义的。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孤独的生活中履行他的一切责任。这些宗教也说，如果一个人有社会关系，他必须履行那些与社会关系有关的责任，但他们一般从不把社会关系的结构视为责任之内的事。这一点适用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历来反对家庭制度。

《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爱父母胜过我者，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应当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他的父母认为是错误的——这种观念是不被古罗马人和旧式的中国人所接受的。

基督教中这种个人主义，逐渐削弱了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在那些最热心的人中。这种影响在天主教中比在新教中要小。在天主教中，我们应当服从上帝，不是服从人。服从上帝意味着服从良心，但人们的良心是不同的。当良心和法律之间发生冲突时，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尊重服从自己良心的人，不是法律的命令。

在古代文明中，父亲是上帝，在基督教中，上帝则是神父，结果父亲的权利就被削弱了。

现代家庭的衰落，主要是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这种衰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家庭衰落起源于个人主义，青年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依从父母之命选择配偶，已婚儿子，住在父母家中的风俗也已不存在。儿子从学校毕业就要离家谋生，已成为一种风尚。过去，儿童可以在工厂做工，成为父母生计的财源之一。

在每个时代，人们都认为应以自己的收入情况而生育孩子。现代家庭的地位，由于国家的作用而降低了，即使是最牢固的家庭也不例外。在家庭的旺盛时期，一个家庭包括年迈的父亲、许多成年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许还有更小的。

这些人同处一处，通力合作，像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就像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国民一样。今天，家庭成员仅限于父母和他们年幼的孩子。

这些孩子，也根据国家的法律，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有益于他们的事情。现在，英国的父亲不但不能像罗马的父亲那样拥有对孩子的生杀之权，如果他按照一百年前大多数父亲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道德观去对待孩子，还可能被指控犯有虐待罪。

父母一贫如洗，国家会免费提供医疗帮助，并供给孩子食物。这样，父亲的作用就被降到最低限度，父亲的作用大都被国家取代了。

随着文明的进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原始状态中，父亲是必不可少的，就像飞禽和类人猿中的父亲一样。由于经济原因，为了保护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免遭伤害，父亲的确举足轻重。对资产阶级来说，父亲去世比父亲健在效果更好，因为他会把财产留给他的孩子。在工薪阶层，父亲还是有经济作用的，就整个雇佣

劳动者而言，这种作用正由于人道主义的观念而不断减小。

现在，最具有重要意义的父亲存在于中层阶级中，因为只要他活着并有丰厚的收入，就能使他的孩子得到昂贵的教育，这种教育又使他们保持住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他去世，而孩子还很幼小，这些孩子就很有可能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父亲都因忙于工作，不能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早上，他们急于上班，无暇与孩子们交谈。晚上回到家时，孩子们已经上床。

曾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一个前来过周末的人”。父亲很少照看孩子，这种责任是由母亲和教育工作者分担的。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虽说他很少有时间与他们相处。

星期天，在伦敦的贫民区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父亲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因能有这短暂的机会与孩子们相处，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上层社会中，父母很早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再把他们送去上学。母亲负责选择保姆，父亲负责挑选学校，这样就完整地控制了孩子的思想，这在工人阶级中，是无法做到的。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大户人家通常不如在雇佣劳动者家密切。

大户人家的父亲虽然在节假日与孩子有游戏活动，但他们对孩子的实际教育，并不比工人阶级的父亲多。现在家庭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它能使父母获得情感。父母的情感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最能影响人类的行为。

有孩子的男女通常都是根据孩子来规划他们的生活，也只有孩子最能使普通男女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变得无私，买人寿保险恐怕要算是最明确、最显着的例

子了。

买人寿保险的心理，完全是在经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动机之外。这种政治经济从心理上说并不是自动的，因为一个人对于财产的欲望，是与父母的感觉密切相关的。

里夫斯说，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起源于家庭。他指出，鸟类只是在孵卵的时候才有私产，而其他时间是没有的。人类也是这样，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就好比没有孩子要贪婪得多。这种结果是属于本能的，它是自发的，是下意识中产生的。

从这一点来说，家庭对人类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是那些富人攒钱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常引起父子之间的误会。工作的父亲对游手好闲的儿子说，他一生做苦工全是为了他将来的幸福。孩子宁愿现在只得到一张金额不大的支票和些微的爱抚之情，也不愿在父亲死后得到一大笔遗产。孩子还会很快注意到，父亲到城里上班，完全是由于习惯的支配，而不是出于爱子之心。在孩子的心理，会断定父亲是个骗子，正像父亲认为儿子是不肖之子一样。

孩子只看见他父亲所形成的一切习惯，而没有看到形成习惯的原因。父亲在青年时代也许遭受过贫困的磨难，他的本能使他发誓不再让孩子遭受痛苦。

这种决心永远支配着父亲的行动。这也就是家庭仍具吸引力的原因。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父母的重要事情，就是使孩子得到更多的爱抚。毫无疑问，父母的爱抚对孩子的性格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避孕已很普及，家庭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传种接代。

如果一个人看不到孩子带来的快乐，又没有机会和孩子发生密切关系，他就

会感到生孩子没什么意义。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经济制度稍微改变一下，家庭的成员也许只剩下母亲，父亲不久就会被完全取代。这样，妇女就可以和国家，而不是和父亲共同抚养孩子了。

男人限制家庭的发展，往往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当然，女人也有这种原因，但她还有自己所特有的原因。一些有职业的男人，为了能使家庭受到高等教育，情愿承受物质享受方面的损失。

有人说，如果男人不再负责任，会不顾一切地生孩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个希望得到孩子的男人，也会希望得到孩子带来的责任。在流行避孕的今天，男人有孩子往往不只是他追求快感时的意外结果。男女总是需要一种永久性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男人才能享受到成为父亲的乐趣。

如果法律和习俗都赞成孩子仅属于母亲的观点，妇女就会觉得任何与现有婚姻相似的事情，都会侵犯她们的独立，会给她们对于孩子的占有权带来麻烦。

这种制度会减少男女关系的严重性，使男女关系变成一件单纯，而不是一种有关心灵、理智和肉体的密切结合。这将使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变成冷淡，男人都把自己的热情集中在事业、国家或与个人毫无关系的事情上。这种说法太片面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被一个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事，在另一个人眼里可能是好事。

我认为，消灭父权，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淡漠乏味，会引起厌烦和绝望情绪的增长，生育将逐渐趋于灭亡。

男性渴望幸福不同的婚姻观

《旧约》和早期文明时的大多数法典一样，是禁止通奸的。但《旧约》里所说的通奸，指的是与已婚女子性交。

例如，当亚伯拉罕带着撒拉来到埃及时，他告诉埃及国王说，撒拉是他的妹妹，国王相信了他的话，把撒拉领进了后宫。后来，国王发现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不禁大惊失色，他知道他已不自觉地犯了罪，于是，指责亚伯拉罕对他撒了谎。

这是古代的一般法规。一个女人如果有婚姻之外的性交行为，就会被视为犯罪，而一个男人只有与他人的妻子性交才会受到谴责，因为他犯了侵犯他人财产的罪。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一切婚姻以外的性交都是不道德的。这种观念的根据是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就是婚姻以内的性交也不例外。这种观念违反生理事实，只能被那些心智健全的人视为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失常。

圣保罗的观念，得到古代教会的重视。独身主义被视为是圣洁的，人们都到荒野中去和撒旦搏斗，因为撒旦在他们的意念中充满了淫欲的幻想。

教会反对洗澡的理由是，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污垢受到称颂，圣洁的声誉越发深入人心。圣保罗说：“身体和衣服的洁净意味着心灵的不纯。”

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虱子满身是圣洁之人不可缺少的标志。

“隐士圣亚伯罕在他信教之后共活了五十年，从他信教的那天起，便开始拒绝洗脸洗脚。据说，他是一个相貌极为英俊的人，一个为他作传的人竟然意欲天开地说：‘他的脸反映出他心灵的纯洁。’”

一个名叫西尔维娅的处女，虽然已年满六十，虽然她由于自己的习惯而身患

疾病，但她仍然遵守宗教规则，坚决拒绝洗刷身体的任何部分，只有手指除外。

圣幼发拉刻司亚加入了一所有 130 名修女的修道院，她们从来没有洗过脚，只要提到洗澡，浑身发抖。

有一次，一个隐士在幻想中被魔鬼所嘲弄，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因污垢和多年曝露而浑身乌黑的裸体人，一头白发随风飘拂，从他眼前跑过荒野。

埃及的圣玛利从前是一个美貌女子，为了免除自己的罪过，她拒绝洗澡竟达四十七年之久。假如那些修道士偶然违反了那些习俗，将遭到很多非议。

男修道院院长亚历山大，回顾过去时悲痛地说：“我们的父老从未洗过他们的脸，而我们却常去公共澡堂。”

据说，沙漠中有一座修道院，修道士由于没有水喝而感到极为痛苦，但在修道院院长狄奥多西祈祷之后，出现了一条水源丰富的小河。很快，有些修道士见水动心，放弃了原有的尊严，劝说修道院院长利用这条小河，建造一座浴室。浴室建成了，一次，那些修道士享受了一次沐浴之乐，那水就突然断流。祈祷、流泪和禁食均无用。整整一年过去了，修道院院长终于把上帝愤怒的物体——浴室毁掉了，于是，那水又出现。

凡是有一种性观念流行的地方，即使有性的关系，也近乎于兽性和粗俗的。就像在禁酒时期饮酒一样。因为在这种地方，爱的艺术已被遗忘，婚姻也是兽性。

那些禁欲主义者，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人们开始相信贞洁是一件至高无尚的事情。这些禁欲主义者的工作虽然伟大，但却遭到了损害，因为他们对婚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教父们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虽然可以找出两三篇描写这一制度的绝妙文章，但总的说来，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最粗俗、最令人厌恶的制度。

为了弥补死亡的损失，自然要规定一种关系。按照林尼阿的说法，这种关系就是在花一般的世界里也是会有的，但人们认为，这关系是亚当堕落的结果，婚姻几乎是最坏的一种结果。

至于婚姻所表现的温存的爱，以及随着婚姻而出现的那些圣洁和美好的家庭特征，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禁欲主义者的目的是吸引人们去过一种纯洁的生活。

婚姻在他们眼里是一件低俗的事。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的繁殖，以及摆脱更大的罪恶，婚姻的确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但它仍是堕落的条件，是所有想成为真正圣洁的人应当摆脱的。圣耶柔米那认为，圣徒的目的就是“用圣洁的大斧砍倒婚姻之树”。如果允许别人赞美婚姻，那只是因为婚姻可以产生童男处女。

禁欲主义者的这种激情，给家庭生活中的其它关系带来了痛苦。如果丈夫或妻子患了宗教狂，带来的后果就是使幸福的结合成为幻想。有宗教性的一方会立即想过一种孤独的禁欲主义的生活，即使没有固执地要求离异，至少也是过一种婚姻中非自然的分居生活。

在教父的训导书里，以及圣徒的传说中，都充满了这种思想。如：圣奈勒司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产生了盛行的禁欲主义的欲望，经过一场痛哭，他的妻子竟然被说服同他离异；圣安梦在新婚之夜，以历数婚姻之恶迎接他的新娘，结果两人立即同意分手；圣美拉尼亚长时间恳切地说服她的丈夫，终于获准离开他的床；圣亚伯拉罕，在新婚之夜抛弃妻子出走，等等。

据传，圣亚历西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是许多年后，他又从耶路撒冷回到他父亲的家，他的妻子还在那里为她的被抛弃伤心落泪。圣亚历西斯经过乞求，得到一个类似慈善待业的安身之处。他在那里居住着，受人蔑视，举目无亲，无

声无息，一直到死。

罗马天主教并不像圣保罗和提贝易德的隐士们那样不合乎生理之道。

圣保罗给人们的印象是——婚姻只是一种发泄性欲的合法出路。他对于节制生育是不反对的，他认为怀孕和生育是很危险的。教会则相反。在正统的基督教的教义中，婚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圣保罗所承认的，另一个是生男育女。教会使性道德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婚姻外的性交是非法的，就是夫妻间的性交也是罪恶，除非性交的目的在于生育。

根据罗马天主教教义，希望得到合法的孩子，是性交的唯一合理动机。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不惜采用任何残酷的手段，即使妻子厌恶性交，即使她可能死于第二次怀孕，即使孩子会生病或成为精神病，即使没有足够的经济，也不能阻止男人去行使他在夫妻关系上的权利，只要他有生儿育女的希望就行。

罗马天主教关于这个问题的教义有两个根据：一方面，它根据于那种禁欲主义；另一方面的根据，即给这个世界带来尽可能多的灵魂是一件好事，因为每个灵魂都是能够得救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灵魂也是会灭亡的。

罗马天主教教徒，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阻止新教教徒实行节制生育，但又相信，由于他们的政治行动，所造就的绝大多数新教教徒的孩子，来世是要受苦的，这使他们的行为显得有些残酷，无疑也是神秘的，是那些凡人所无法理解的。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承认，孩子是婚姻的目的之一。他们的结论是，不以孩子为目的的性交是罪恶的，但它却没有允许人们因不生育而解除婚约。无论一个人盼子之心如何强烈，如果他的妻子不会生育，那他在基督教的道德中是无法得到补救的。事实上，婚姻的积极目的，即所谓生育，并不很重要，而它的主要目的，正如圣保罗所说，在于防止罪恶。私通还是处在中心的位置，婚姻从根本上说来还是两件不幸之事中的一件幸事。

罗马天主教极力遮掩他们对婚姻的厌恶，说婚姻是一种圣礼。这种说教就是使我们相信，婚姻是不可解除的，不管两个人中间任何一方的行为如何，即使其中一个人得了精神病或花柳病，或酗酒成性，或公开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两个人的关系依然是神圣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永远得不到重新结婚的权利。当然，这种情况常会造成极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既然是上帝的意志，也就只能忍受。

除了这种极端严酷的理论之外，罗马天主教对所谓的罪有某种程度的宽恕。罗马天主教承认，人的天性不能按照教会所规定的行事，因此，对于私通行为，补充了赦罪的办法：即犯罪的人承认他的罪过并肯于忏悔。这种宽恕，是牧师们增加他们权利的方法，只有他们可以赦罪，只要能赦罪，那私通便可以免掉惩罚。

新教的观念在理论方面，似乎显得温和一些，然而在其它许多方面，比罗马天主教还要严酷。“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句话给路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和一个修女恋起爱来。尽管他曾发誓要实行独身主义，但是他和那修女都有结婚的权利。人们也这么认为，如果他不结婚，就会更加增加他的性欲，使他陷于犯罪的境地。

在新教盛行的地方，放弃婚姻是对礼的说教。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允许离婚。但是新教教徒对于私通，比罗马天主教教徒更是望而生畏，他们所受的道德谴责也要严厉得多。罗马天主教认为，人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罪过，因此它制定了各种应对办法。

在现代美洲，可以看到这种态度的两个方面，在那里离婚是极容易的，但是，同居却会受到比在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国家严厉得多的谴责。基督教道德学的整个体系，无论是罗马天主教的，或是新教的，都需要重新进行研究。一种再三强调的说教，可以使大多数人尤其在孩提时代，产生坚定的信仰，甚至支配他们的下意识。

所以，许多人认为对于正统观念的态度是十分解放的，实际仍被这些说教支配着。

我们必须自问：教会为什么要反对一切私通呢？教会的反对是否具有正当的理由呢？如果它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除了教会所提出的那些理由外，是否还有别的理由使我们得出结论呢？

古代教会的态度是，性行为中存在着某些本质上不干净的东西。这种态度纯粹是迷信的。教会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那些造成反对性的态度的缘故。那些最先提出这种观念的人，在身体上一定是病态的。

谈到性的问题，那是一个具有某种倾向性的问题，全在于我们描写时是从当事人的观点出发，还是从有嫉妒心的旁观者的观点出发，我们自己的举止是“风流”，而他人的行为却是“通奸”。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富有感情色彩的词句，但必须十分谨慎。

基督教的道德因注重纯洁性，便降低了妇女的地位。由于道德家都是男人，所以女人都成了妖妇。如果道德家是女人，那么男人也就取代了妇人的位置。既然女人都是妖妇，所以应当减少她们引诱男人的机会。结果是那些有地位的女人受到约束，而那些没有地位的女人则被视为是罪恶的，受到极大的鄙视。

直到近代，妇女才开始恢复她们在罗马帝国时代享有的自由。父权制度与束缚妇女关系密切，但在基督教产生以前，这种情形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到了康斯坦丁之后，妇女的自由又在保护妇女、免除罪恶的借口下锐减。

到了近代，妇女才又开始恢复她们的自由，人们对于罪恶的看法已大大改变。教父们的作品充满了咒骂妇女的语言：

“女人被视为地狱之门和人类罪恶之本。她只要想到自己是一个女人，就应当感到内疚。她应当在忏悔中生活，因为她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灾祸。她应当为她的服饰而羞愧，因为这是她堕落的象征。她应当为她的美貌而内疚，因为这是魔鬼威力武器。”

女人的姿色，历来是教会咒骂的主题，尽管也有例外。

在中世纪，主教们身体上的美常被标在他们的墓碑上。在六世纪，有一个省议会甚至禁止女人裸体受圣餐，因为女人是不洁的。女性的地位一直很低。财产法和继承法都是根据反对女人的思想更改的，正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出现，女性才重新获得了继承权。

男性渴望幸福有关父权的争议

做父亲的一旦知道了那孩子如《圣经》所说，是他的“种子”时，他对孩子的感情就会增加。这主要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父权之心和死后继续存在的欲望。他认为，后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成功，他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人类的事业不会因他们的死亡而告终，而是通过他们后裔的奋斗继续发展。

在母系社会中，家庭事业由女人掌管，但由于女人不能打仗，所以家庭事业不及男人掌管有用。因此，父权的发现使人类社会更有竞争性，更有能量，更有生气和掠夺性。此外，还有一个注重妻子道德的原因，嫉妒中那种纯粹本能的成分，并不像大多数现代人所想像的那样强大。

在父权社会中，嫉妒最强有力的表现就是担心后代的合法性。一个人厌恶他的妻子，爱着他的情妇，虽然他发现另一个人也在爱着他的情妇，他的嫉妒远不如当他发现妻子有外遇时那样强烈。

一个合法的孩子是一个自我的延续，他对这孩子的感情是一种自我主义的表现。如果这孩子是非法的，这个父亲就遭到了愚弄，而在那和他没有生理关系的孩子身上滥用他的爱子之心。

父权的发现导致了女人的隶属地位，这是保证女人道德的唯一手段——这种隶属起初是生理上的，后来则是精神上的，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由于女人的这种隶属地位，在大多数文明社会，夫妻之间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主从关系，一方面是责任关系。

男人的一切重要思想和意志只能为他一个人所有，女人被认为由男人利用着，以至对任何事情都很冷淡。

从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印象，就是他和他的朋友，都把男人视为真正爱情的唯一对象。男人感兴趣的事情，即使那些高贵的雅典妇人也是完全茫然的。在中国，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到现在还是如此。在波斯，就是在波斯诗歌伟大的时代，也有这种情形。男女之间的爱情被确定孩子合法性的欲望破坏了。不仅爱情，就是女人对于文化所能做出的一切贡献，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阻碍。

当人们看待后代的方式改变时，经济制度也随之改变。

在母系社会里，一个人所继承的是他的舅舅。在父系社会里，一个人所继承的则是他的父亲。父系社会，父子之间的关系，比母系社会中所存在的男性之间的任何关系都要密切。

我们认为应属于父亲的功能，在母系社会里是由父亲和舅舅所分担的，即感

情和抚养来自你父亲，权力和财产来自舅舅。男人只有当父权制度建立之后，才开始要求他们的新娘是处女。

在母权制度下，青年女子和青年男子一样放荡，但让女人相信婚姻以外的一切性行为都是罪恶的，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时，人们就不能容忍了。

做父亲的一旦发现了他们存在的事实，便开始行使他们的权力。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逐渐减弱的纪录。在大多数文明国家，早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父权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时至今日，在中国和日本仍存在着祖先崇拜，这种崇拜是古代文化的普遍特点。父亲对于他的孩子具有绝对权威，有时竟拥有生杀之权。

在文明世界，做女儿的，没有父亲的允许是不能结婚的。她们嫁谁，是由父亲决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从未有过独立生存的阶段，开始隶属于父亲，之后隶属于丈夫。

在许多国家男孩也一样，一个老年妇女在家庭中也具有专制的权力，她的儿子及儿媳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的儿媳是完全屈服于她的。

在中国，直到现在我们也能听到，年轻的媳妇不堪婆婆的虐待而自杀的事情。其实，中国所存在的这些现象，在欧洲和亚洲各个文明国家都存在。

当基督说，他来是为了使儿子反对父亲，儿媳反对婆婆时，他所指的正是我们在远东看到的那种家庭。父亲起初通过他强大的力量所得到的这种权力，又由于宗教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大多数宗教都相信上帝是站在国家一边的。祖先崇拜或类似的行为，在各地都很盛行。

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充满着父亲的威严。社会上那种君主和贵族组织，以及继承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是以父权为核心的。古代的经济目的是维护这一制度的。

在《创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众多的子孙，当他们得到了众多的子孙之后，那情形对他们是何等的有益。

随着文明的进步，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罗马昌盛之后，那些贵族就不再有大规模的家庭了。罗马强大之后的数世纪里，尽管有道德家的劝告，原有的贵族仍在不断地减少，那些劝告就像现在一样无效。离婚成了一件既容易又普遍的事情，上层社会的妇女，得到了和男人几乎平等的地位，父权越来越弱。但这仅限于上层社会，对于那些贫穷而且不能从中受益的人来说却是一点未变。

古代文明和我们今天的文明不同，它仅限于少数人，因而多灾多难，这是古代文明的危险所在，古代文明虽然能够存在，但最终还是被下层社会迷信的动乱所战胜。

基督教和野蛮人的侵略摧毁了希腊——罗马的思想体系，父权制度保留下来，而且得到比罗马贵族制度更强大的力量。它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分，即基督教关于性的观念，以及从基督教关于灵魂拯救的教义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个人主义。没有一个基督教的社会能够像古代和远东文明那样完全依据于生理。此外，基督教中的个人主义逐渐影响了基督国家的政治。

现代社会虽然还是父系的，但比起古代社会对于父亲关系的重视，已远远不能比了，家庭的作用也比以前减少了。

现在的男人希望通过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而不是通过拥有众多子孙来成就一番伟大事业。这种改变是传统道德和传统神学不如以前的原因之一。这改变的本身实际上是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好书推荐官微信 2219344884 那么这种改变是怎样产生的，宗教是怎样影响人们对于家庭和婚姻的观念的呢？

自从父亲的身分被确立之后，性就一直是宗教中一件具有意义的事。这完全在人们意料之中，因为宗教与一切神秘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

在产业和畜牧时代的初期，多产无论是对于庄稼、牛羊或女人，都是很重要的事。庄稼并非总是丰收，性交也并非总是导致怀孕。人们就用宗教和巫术去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按照巫术的一般见解，人们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人类来促进土地的生育。许多原始社会的人所希望的人类生育，则是通过各种宗教和巫术的形式促进的。

在古埃及，母系时代尚未终结之前，就有了产业，在那里，宗教中性的成分起初并不是男性的生殖器，而是女性的生殖器，其形状类似玛瑙贝的壳。这种贝壳被认为是具有魔力的，以至被用做了钱币。然而，这个时代过去了，在埃及，以及在大多数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也是如此，宗教中性的成分采取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人们认为月亮是所有孩子的真正父亲。

这种观念是和月亮崇拜紧密相关的。日历在宗教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的英国和1917年革命以前的俄国，人们一直使用一种不正确的日历，因为他们觉得格里历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

那些致力于月亮崇拜的祭司，也在到处提倡这种极不准确的阴历，所以阳历的胜利来得很缓慢，而且是部分的。

在埃及，这种冲突一度成为内战的根源。“月亮”一词有过一场文法上的争执，直到现在，“月亮”这个词在德国仍是属于阳性的。

在基督教中，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至今仍留有痕迹，因为基督教诞生在冬至，而他的复活则是在逾越节的满月时分。

所有的古代宗教，都具有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成分，这就引起了教父们的强烈

反对。尽管他们反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现象，还是存在于整个中世纪，只有新教才最终把这些现象消除。

许多地方，有身分的女人，常到寺院去，与祭司或和相遇的陌生人性交，那些女祭司本身都是圣娼。这种风俗，是出于通过上帝的恩赐使女人生育，或用巫术去求到庄稼的丰收目的。

反对性的成分，起初也赞成性的成分。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这些成分就战胜了它们的对手。在一些基督教或佛教影响不到的地方，男女祭司们都宣誓实行独身主义。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埃森人派别，他们认为一切性交都是不洁的。

这种观念早在古代就有它的地位，即使是在那些最仇视基督教的人中间，也不例外。

在罗马，曾有过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的倾向。伊壁鸠鲁主义几乎灭绝了，在有文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又出现了斯多噶主义。在《伪圣》中，常表现出一种以女人为玩物的态度，这和《旧约全书》古卷中，男性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新柏拉图派几乎和基督徒一样禁欲，波斯人，关于物质即罪恶的说教传遍了整个西方，接着又带来了另外一种信仰，即一切性交都是不洁的。

在某些环境中，人们对于性有着一种自发的恐怖感。当这种恐怖感产生时，它和那种更普遍的对性的爱好一样，成为自然的冲动。

哪种性制度更能满足人类的本性呢？我们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从信仰中寻找这种态度的根据是徒劳的。

这些信仰最初是由情绪所产生的，一旦产生，它们会比情绪更持久，或者至少比那些根据情绪的行为更持久些，但不能成为反对性的态度的主要原因。产生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嫉妒和性疲劳。

如果产生了嫉妒，即使是很轻微的，也会成为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那种引起性行为的欲望也会同样令人厌恶。

一个纯粹根据本能的人，如他能随心所欲，会要求所有的女人都爱他。这种情感很容易使他对性产生厌恶，尤其当这女人是他妻子时。

我们从莎士比亚的书中可以发现，所有的男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子有热情。他认为理想的女人，应能根据义务的感觉投身于她丈夫的怀抱，但不能有情人，因为性本身对于她是不愉快的，她所以能忍受，仅仅是道德法律要求她这样做的缘故。

一个按本能行事的丈夫，当他发现他的夫人对他不忠时，不但会对她厌恶，并会讨厌他的情人。他会得出一种结论，即一切性都是可憎的，尤其是当他由于性交过度或年迈而丧失能力时。

性疲乏是文化带来的现象。

在动物中，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在不开化的人们中间，性疲乏也很罕见。一夫一妻的婚姻中，也不可能发生性疲乏，因为大多数男人喜新厌旧的冲动，会导致他们生理上的过度行为。

如果女人有拒绝男人要求的自由，性疲乏大概也是不会发生的，女人会像雌性动物一样，要求每次性交之前有调情行为，直到感觉男人的性欲非常冲动时，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为文化的缘故，这种纯粹本能的情感和行为已经很少发生了。

对于制约这种情感和行为最有用的因素是经济。

已婚女子和娼妓都是通过她们性的资本去谋生，所以她们不能仅靠自己的本能冲动，去满足对方的要求。这极大地减少了调情的作用，调情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缓解性疲乏的手段。

那些没有严格道德约束的人，肯定会沉溺于过度的性行为中。这种行为最终导致疲倦和厌恶，并会产生一套禁欲的理论。

当嫉妒和性疲乏同时出现时，反对性的热情就会高涨。在那些非常淫乱的社会中，所以会产生禁欲主义，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男女祭司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被视为已和上帝结了婚，他们必须拒绝一切与普通人性交的行为。他们自然被视为是特别圣洁的，于是圣洁和独身就合为一体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修女仍被视为是基督的新娘，她们与普通人性交是一种犯罪行为。

还有其他几个更为隐晦的原因与古代末期不断增长的禁欲主义有关。

在一些时代，生活是快乐的，人类是朝气蓬勃的，人世间所拥有的乐趣，也足以使人们得到满足。但还有许多时代，却与此相反。人类需要通过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向往未来的生活，来弥补人世间的空虚。

关于禁欲主义，那当然是萎靡不振的一种表现。基督教的伦理学，正是在这衰退和病态的时代里形成的。后来那些朝气蓬勃的人，不得不遵循那种生活，而那些有病态的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生物价值和人类生活延续的本能。

权力之道男人的地位

严格地说，地位是一种虚假的赝品，其目的是获取人们的敬意，其实它就是一种假冒的东西。可以说，荣誉是向舆论支取利益的汇票，其价值在于发放人的信誉。它代替抚恤金，为国家节省大量的钱财。

如果受予荣誉，就要严格慎重，人们还可以拿它作其他用途。我认为，荣誉这东西时时处处都在向民众们说：“这人不像你；他已做过某些事情。”一旦奖励发不公平，或不能进行适当的选择，或滥发奖品，奖品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价值。所以颁发奖品一定要像商人们签署汇票一样慎重。任何奖品都应授予那些建立了功勋的有功之人。

谈到荣誉，这个问题比地位的问题深得多。如果说：“荣誉是外在的意识，意识则是内在的荣誉。”但是这样的定义显得过于空泛粗疏，几乎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如说，“从客观方面看，荣誉是他人对我们价值的评判；从主观方面看，荣誉是我们对他人评判的关注。”从主观点看，要享誉四方就要对他人发生一些经常有益但并非纯道德的影响。

人只要没有完全堕落，就有廉耻之心，在任何地方，荣誉都有特别的价值。原因是：人很难依靠个人力量达到这个目的。但一旦他的良知得到发展，他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欲望，希望人们当作一名有用的社会成员，把他当作一位为人们发挥作用的人，以此获得享受社会生活之恩的权利。要作为一名有用的社会成员，必须做两件事：一是无论在什么地方，要肩负起社会对个人所要求的责任。二是要肩负起社会对每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具体位置所要求的责任。

人常常会尽可能给世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并很在乎这一美好印象的建立。这是人类基本的、内在的本性，即所谓的“荣誉感”，或“耻辱感”。只要想到被人菲薄，便顿感羞愧耻辱，甚至即使知道自己是无辜的，自己并没有完全忽视自己的责任，而只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范围内没有尽心尽力。确信他人的敬重比任何东西给自己的勇气都多，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给自己帮助和保护，而这是

防范生活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与自己所作的努力比较起来要有效得多。

为赢得他人的信任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导致了多种荣誉之间的差异，其区别主要是“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差别，其次在各种誓约行为，最后在两性关系。存在着主要的荣誉，每一种荣誉又有多种形式。市民的荣誉，公务上的荣誉，和两性之间的荣誉。

“市民的荣誉”范围很广。它基于这种假定：我们应无条件地尊重别人的权利，所以不可以使用任何不正当或违法的手段谋求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这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条件。

任何公然妨碍这种友好交往的做法和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事情，都会使其受到损害。荣誉是根本的基础，它在于坚信道德品性是不可改变的，而单纯的邪恶则意味着将来在同样环境下发生的同样行为也同样邪恶。这里不妨用英文中表示信誉、名声、荣誉的“品性”一词恰到好处地表达这层意思。一旦荣誉扫地，就永远无法恢复，如果由于阴差阳错，情况就不会这样，诸如被人中伤、诋毁或其行为被人误解。法律则提供了对诋毁、诽谤乃至侮辱进行制裁的手段。虽然侮辱和辱骂相差无几，侮辱却是一种抛弃理性的诽谤。如果一个人辱骂他人，就表明这人没有真正合适的理由控诉别人，否则，他就会把这些作为前提，让公众自己作出结论，他企图让人相信，他这样做是想得到简便。

市民的荣誉是中层阶级要获得存在而得的，它完全适合于所有阶级，任何人都不可藐视它，它是一桩地地道道的正经事，任何人都会小心在意，不可稍存不敬。失去自信的人会永远失去信心，不论他做哪些努力，也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无济于事；这种可怕的结局防不胜防，无法制止。

从某种意义上讲，荣誉具有否定性，并与名声的肯定性相对立。荣誉并非人们对某人碰巧独有的特殊品性的看法，而主要是人们对希望某人能表现出来的品性的看法，这种品性是真情实意的，而不是虚假的。因此，这种荣誉意味着人们

没有特殊之处，而名声则是必须要赢得的东西。荣誉是不可失去的东西，没有名声无非是默默无闻。而失去了荣誉则会令人羞愧，它具有实实在在的性质。我们不能把荣誉这种否定性同消极的东西混淆起来，现实性是荣誉的根本特性。只有这一特性是直接来源于表现这种特性的，这种直接关系，就是他的所作所为，与别人的活动或其他人给他设的障碍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之中。

荣誉也有间接价值。如果他人对我们的想法，对我们产生影响，且他人的行为举止对我们的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这就需要我们与他们一起生活、从事各种活动时，他人的看法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但在文明的国度里，保障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却是社会，我们的一切行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而别人，在和我们交往前必须信任我们。别人的看法，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尽管这种看法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西塞力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说，“我完全赞成克里希波斯和第欧根尼说过的话，如果声德美名果真一无是处，声德美名就不值得我们去追求了。”

人们在国家中必须履行的责任越重大紧要，他所担任的公职就越高越有权势，人们对于适合自己职位的道德、理智的品行所持的看法越强烈。地位越高，就享有更多的荣誉。这在他的官位和他人对他的态度上都能表现出来。

通常来说，一个人的官位就包含了 he 应享受到的某一特殊程度的荣誉，但这种态度会因为大众对这一官位的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而受到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担任有特别职务的人比普通公民享有更多的荣誉，普通公民的荣誉就在于不断地清除耻辱。

公务的荣誉还要求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忠于职守，使自己的同事和下属恰到好处地完成自己承担的义务，抵制一切妨碍公务或公务人员的行为。例如，他绝不能对任何玩忽职守的行为掉以轻心，或对没有给公众带来福利的公务置之不理。他必须给这些危害行为以法律的惩罚，以证明这种行径在本性上是不能谅解

的。

那些能为国家效力的人，如医生、律师、教师、军人，及其他在某些学科里学有所成，或向公众宣布有资格从事某种专业技术的人，他们的荣誉也属于公务的荣誉。从严格意义上说，“军人”这个词其实就是对这种人的看法，他们决心去捍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具备一些必需的品质，这种品质——特别是勇气促使他们去这样做。一个人的勇敢和力量，完全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发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抛弃自己所忠于的战旗。

提到“两性的荣誉”，和它所依赖的原则，我们有必要更加注意，并作出更为详尽的分析。其实，所有的荣誉都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自然部分——女人的荣誉和男人的荣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会产生不言自明的群体精神，其中以女人的荣誉为重，因为在女人生活中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她和男人的交往。

女人的荣誉，在少女阶段是人们对她的纯洁的一般看法，而在为人妻后则是人们对她的忠诚的一般看法，这是因为妇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依靠男人，而男人，只在一个方面依赖女人。所以需要有一种安排，使男女双方相互依赖——男人要对女人的所有需要和由于男女结合而产生的子女负责，这一安排是以女性的利益为基础的。为了贯彻这一安排，妇女们还联合起来对付她们的共同敌人——男人。

为了对男人进行围攻、和平共处、征服男人、占有男人并分享其美好的东西，妇女们的荣誉都迫使自己遵守这一规则：除了婚姻，决不将自己给任何男人。这一措施完全是为了女性的利益。

无论什么地方，妇女们都在极力维护她们的集体精神。如果一位少女违背了这条规则，她就背叛了整个女性。其他女性就会厌恶她，攻击她。以她为“女流”的仇敌。如果除某一女人外所有的妇女都这么做，幸福就会全部崩溃。她就要为

此含垢忍辱，失去她的荣誉，再也不会和其他任何女人来往，人们也会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她。对女人来说，谁敢扯断婚姻的纽带，她就会失去男人们妥协投降的那些条件；而这种举止会吓坏其他男人，使他们不敢再作同样的妥协，这就会危害她那些姊妹们的利益。

这种欺骗、粗鄙的破坏誓约的行为是应受惩罚的罪行，不仅应剥夺她个人的荣誉，还要剥夺她市民的荣誉。我们之所以看中妻子而不看重少女的耻辱，原因就在于这里。对少女来说，结婚可以为她恢复荣誉，而妻子一旦破坏了誓约，荣誉的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这种“群体精神”被认为是女性荣誉的基础，这不仅是有益的，也是必需的。它对妇女利益的重要性将会被人们认识到。但除了具有相对的价值外它别无所长，它存在于其他生存目的范围之外，而且所赋予的价值超过了生命本身。

贞女们被迫的越轨行为不值得称道，这种行为很容易酿成可悲的滑稽戏，并引起可怕的感情突变。女性荣誉的全部规则，并不能禁止人们对埃格蒙特的克拉拉表示同情。女性荣誉的这个原则，走到极端就是舍本求末。这种夸张的比喻暗示，两性荣誉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它只有相对的价值。当然从托马西乌斯时代到家教改革时代，不论在哪个时期和哪个国家里，看到法律是允许和承认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是不损害女性的荣誉。在生活中，有很多因素使婚外恋不能发生，尤其是在天主教国家。从道德来讲，完全无需各种礼仪的考虑，宁愿缔结门庭悬殊的婚姻。完全可以无视外部的礼节，这是对妇女和牧师们的退让，妇女和牧师总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在一个国家里，除王子及一些可怜至极的人外，每个男人都可以娶他所喜欢的女人为妻。王子属于他的国家，他的婚姻只是出于国家的考虑，即为了国家的美好与富强。他仍然是人，作为人，他宁愿服从自己的情感。

事实上女性荣誉的原则毫无缘由，这已由许多残忍的牺牲得以证明，如杀死自己的孩子和母亲的自杀。一位未婚的少女要是违背了这一准则，就会触犯所有

的女性，是一种不忠的行为；但这种忠诚仅是一种默契，不是堂而皇之的誓约。在很多情况下，使她自己的前途受到最直接损害的，不是她的过错，而是她的愚昧。

女人的“群体精神”已使男人在婚姻关系中放弃了自己的权益，而对他的征服者来说，却大有利益，所以，这种“集体精神”就需要他细心地维护婚姻中的条款，使协议自身在执行过程中不因为丝毫的松懈而失去效力。

男人们就算放弃了一切，他所独自享有的东西，还为他所有。一个妻子，丈夫与她离异，她会对婚姻纽带的断裂深恶痛绝，而丈夫，离婚却是他的荣耀。如果他宽容冒犯他的人，他的同伴就会羞辱他，但这种羞辱，还远不如失去荣誉的女人的耻辱令人难堪；这个污点并非污秽不堪，因为和他生活中的其他关系及其他重要事务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这类荣誉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其原则贯穿于所有民族和任何时代，虽然女性荣誉的原则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还有另外一种荣誉，与我们所讨论过的荣誉全然不同，希腊人和罗马人毫无所知，甚至中国人、印度人和伊斯兰教徒也浑然不觉。

这种荣誉不在于他人对我们的价值评判，与他人内心的看法也没有关系，也不必在意是否了解他们所持意见的理由；关键就是他们是否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由于我们的行为，别人可能还会拥有恶劣的看法，或鄙视我们。只要没有人表现出他们的看法，我们的荣誉就不会受到玷污。如果我们的行为和品质能从其他人口中获得的荣耀，除了表示敬意别无选择。一旦有人公然贬斥我们，无论他多么恶毒愚蠢，我们的荣誉都会受到损害。除非我们能努力恢复我们的荣誉，否则就会永远付诸东流。

权力之道男人的骑士情结

骑士的荣誉不在于别人想什么，而在于别人说什么，其道理可以这样证明：如有必要，则通过道歉收回其侮辱，之后便会缄默不语，仿佛他们从来没有侮辱他人。至于是否要矫正恶语中伤背后的看法，和人们为什么要公然凌辱，那完全无关；只要收回所说过的话语，就可以一切释然化解。

实际上，这类行为的目的并非求取，而是强逼他人的敬意。

这类荣誉并不依赖人们所为，而是依赖他们所遭遇的坎坷。这种荣誉与其他的荣誉都不一样，它不以自己的言行为根本，而在于他人的所言所行。即在于那些成天无事生非、说长道短的人，如果有人刻薄非难，这种荣誉顷刻之间就会成为人海的泥牛，除非受到人身攻击的人，靠了不懈努力，冒着失去生命、健康、自由、财富和心灵平静的危险，力挽狂澜，重新恢复自己的荣誉。就算某人的行为完全公正高尚，灵魂纯净如水，理智健全发达，一旦有人以侮辱他为荣，他的荣誉就会顷刻之间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即使那个人是一个流氓，根本没有诋毁他的荣誉，或是冥顽不灵的暴徒、白痴、赌徒或负债者。一般来说，喜欢侮辱他人的人就正是这种人。

这些人有理由对荣誉的原则感恩戴德，是因为这一原则把他们与那些在其他方面高过他们的人扯平了。如果有人乐于羞辱自己的荣誉，比如攻击他人品质如何恶劣，人们就会把这当作是有充分根据的评价。如果不立刻予以痛击，那么这一裁决就会永远被人们看作是公正合理的。被辱者就会像是散播恶言的人所侮辱的那样。即使侮辱他人的人是世界上最卑鄙的无耻之徒，那些体面人也将和他一刀两断，就像对待麻风病患者一样，无论他在哪里出现，人们都不愿与他交往。

明智的诉讼，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世纪，一直到15世纪，在所有刑事诉讼中，不是起诉人必须证明被告有罪，而是被告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并且被告可以通过发誓来证明他无罪。如果他不能找到帮助他的人，或起诉者反对他的支持者，就必须诉诸神的审判，这时，一般就要以决斗来见真假。因

为被告蒙受了耻辱，他必须得洗刷自己的耻辱。耻辱的概念和盛行不衰的体面人的整个制度就源于此。这也解释了那些体面人为何一旦受骗，就要怒火中烧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样的责备必须要用血来雪耻。尽管谎言无处不有，这种事情却很少发生。

一般来说，因为别人的谎言而威胁要杀死他的人，自己决不会说谎。中世纪刑事审判还容许更简单的形式，要答复起诉者的指控，被告只要说：这是撒谎。就只能靠上帝来裁决了。所以骑士荣誉的习惯是，只要有人说谎，结果就是诉诸于武力。还有比侮辱更恶劣的，只要有人一想到极恶——人们就会给他一记耳光，一顿猛打。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完全支配了所有的荣誉，其他的侮辱可以通过流血事件来雪耻，而这只能靠致命的一击来恢复荣誉。

这种荣誉和从天性而来的德行毫无关系，与他的道德品性是否能变得高尚或卑下是没有关系的，与这些学究式的问题也没有关系。如果你的荣誉受到玷污，或显得岌岌可危，你就只能采取决斗的方法补救，你的荣誉才会得到恢复。如果挑衅者并不属于上流社会，他并不承认骑士荣誉这类习俗，那么，对这种人身攻击，可以靠拳头来决胜负，或仅仅用语言争吵较量就行了。如果你手中有武器，你可以把对手击倒在地，这就恢复了你的荣誉。

如果你不愿采取这种形式，担心产生令人不快的结局，或不在乎挑衅者是否会受到骑士荣誉立法的制裁，那么，“以牙还牙”也是一种维护荣誉的办法，即以更为强烈的粗野来回报粗野。如果口头的侮辱达不到目的，就可以用拳头狠打，直至你的荣誉完全得到恢复；如有人打你一耳光，你可以用棍棒来回报，被人棍打则可以用鞭抽来回敬，甚至可以用刀剑来杀你的对手。如果这些都徒劳，你决不能因为害怕流血而逡巡不前。

受人侮辱意味着体面扫地，抛弃了侮辱便有了荣誉。如我的对手有真理、公正和理性支持他，我就要侮辱他，让他失去公正，体面扫地，而使我得到公正和荣誉；直到他靠着枪弹与棍棒击打我而重新得到这一切。所以，就荣誉而论，粗

野便取代了一切，并胜过了一切。强权便是真理。

如果在讨论或交谈之中，有人比我们有更渊博的学识，更热爱真理，判断力更明快，理解更深刻，使得我们相形见绌，我们就要立刻贬低他的优势之处，我们才会成为优秀的。

如果我们的对手不在乎我们的攻击方式，以使我们陷入以牙还牙的卑鄙竞争中，缄默不语，我们就取得了胜利，获得了荣誉。真理、学识、判断力、理智、才能，都会令我们退避三舍，而极度的傲慢无礼则会专擅其事。

如果有人敢敌视体面的人，或他的才智已超过了他们的智慧，那些体面人就会恼羞成怒，跨上战马予以还击；一旦发生争执，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们就会到处寻找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击打便当的野蛮武器。很显然，人们以为这一荣誉的原则醇化了社会风气。而这一原则来自另一原则，它是整个骑士习俗的灵魂和核心。

这意味着，人们在冲突中为追回荣誉所诉诸的最高法庭，其实就是武力的法庭，即残忍野蛮的法庭。所有粗野无礼的行径，严格地说，都须求助于残忍野蛮的体力较量；它宣告了理智力量和道义都无力做出仲裁，宣告了必须以武力解决冲突。富兰克林把人解释为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人的争斗由人类所持有的武器来决定胜负，武力的仲裁却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有名的“强权即公理”原则。

如要说市民的荣誉，对你我之间的关系极其审慎认真，信守诺言，承担义务，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骑士习俗，所展示的就是最高尚的慷慨精神，除荣誉的诺言不能破坏外，任何其他承诺都可以置之不理。就算发生了最坏的事情，甚至不守个人荣誉的诺言也容易发生，只要我们决斗，同那些坚持认为我们发过誓的人决斗，我们就能保住自己的荣誉。只有一种债务，那是惟一的、决不能不偿还的债务，那就是赌债，所以有人把赌债称为荣誉之债。而其他债务，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欺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即使这样，骑士的荣誉也不会有丝毫的辱

没。

在人类本性中，这种不可思议、野蛮而荒谬地获取荣誉的习俗，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毫无道理的。它发挥的作用，仅仅在于增加人的恶感。它只为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所独有，而且仅局限于上流社会，局限于官员、军人和模仿他们的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对这种荣誉习俗或原则都一无所知。

在亚洲，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民族，对此都闻所未闻。在他们之中，再也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荣。他们的行为已表明了他们不是靠别人摇唇鼓舌来甄别他们。他们认为，人的所言所行对他自己的荣誉也许会有所影响，但决不会企及他人的荣誉。

对他们来说，在某些情况下打击不只是打击。打击可能会让人愤怒并立刻报复。打击和荣誉并没有任何联系，谁也不会对打击或侮辱的语言以及是否要求决斗耿耿于怀。对古人来讲，他们的勇武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丝毫不逊于基督教欧洲的诸民族，希腊人和罗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英雄民族，他们对决斗一无所知，如果他们有了决斗的概念，这与高尚的人生就不会有联系了；它仅仅是唯利是图的角斗士、专事屠宰奴隶治罪的犯人，在罗马人的节日里，为取悦人而轮番与凶猛的野兽残杀表现出来的野性。基督教占统治地位后，角斗士表演已被废除了，在基督教时代，他们的位置已被决斗取代。

如果说角斗士的搏斗是由于向往壮观的场面而做出的残暴牺牲，那么，决斗就是存在偏见的残酷牺牲品。牺牲的并非罪犯、奴隶和囚徒，而是高尚和自由。

骑士荣誉的整套习俗完全不为古人所知，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其简单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人生总是抱着自然不带偏见的态度，而且避免使自己受到这些堕落可恶的傻瓜的影响。对他们来说，一记耳光并算不了什么，不过是身体上受到点轻微的伤害而已。相反，人们则会大做文章，把它当作一场灾难，当作悲剧的主题。例如，在高乃依的《熙德》，或最近反映德国中产阶级生活的作品中，把

它叫做“环境的力量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成是“偏见的力量”。如果巴黎国民议会的某些成员被人打了耳光，这件事就会立刻传遍整个欧洲。

骑士荣誉的原则完全不是根源于人的本性。它不过是人为的结果，其根源不难发现：一旦人们使用拳头胜于大脑，教士的权术束缚了人们的理智，那么产生它的时代就来了，并且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盛行而倍受赞扬。在这个时代，人们不仅让万能的上帝管理他们，而且要上帝为他们做出仲裁。一旦遇到疑难案件，便由仲裁者来判断，即上帝的审判，就会毫无例外地意味着决斗。不仅贵族这样，普通市民也是这样。

事实上，骑士荣誉的原则，今天也还盛行。这些决斗者通常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也并不深刻。有些人把决斗的结果看作是处理冲突事件的神圣判决，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传统感情的结果。人们要把来源问题弃置一边，必须看清，这种原则的主要目的在于用肉体的恐吓来强取表面的敬意。而事实上，人们认为那样是很困难的，以致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这就和手握温度计使得水银柱升高，以为这就说明了房间的温度较高一样。事实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市民的荣誉旨在和睦友好的交往，其荣誉要受到他人意志的左右，他们认为人们值得信任，因为人们没有条件地尊重他们的权利；而骑士的荣誉却规定了他们必须要使别人感到恐惧害怕，要决斗才能维护自己的荣誉。

依赖感并不完全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使人恐惧和使人依赖比较起来，使人恐惧更根本。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要自我保护。并直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在文明生活里，国家会保护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

骑士的荣誉的应用范围只局限于人身攻击这些小事，在法律看来，这些小事只会受到轻微的惩罚，有时甚至无罪，因为只是一些小小过错，有时仅仅是个玩笑。由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受到局限，它迫使自己夸大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它使这些欢欣鼓舞变为神圣的东西。因为在它的眼里，国家生硬地给予那些造成轻微伤害犯罪的惩罚太轻了，所以要亲自出马，对挑衅者施予终生或大半辈子的

打击。这完全依靠极度的狂妄心理，完全忘却了人的真正本质。那些决意靠蛮力实现这一原则的人宣告“逆我者亡”，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应把他们逐出国土。

要缓解这种狂妄心理，人们习惯多加些谦让。如果有两位勇猛无畏的人碰到一起，谁也不让步，那么，就算毫不足道的事也会酿成一场辱骂，然后发展成为斗殴，最后直至以性命相搏；而去掉中间的过程，立即诉诸于武力，乃是更有教养之人的作风。要诉诸武力，就要有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样就能构成一部最为庄重的滑稽剧。如果两位无畏的人在某件小事上发生争执，较聪明的那一位就会让步，他们也就可以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证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不承认骑士荣誉的原则，而让争执自由地发展。

据说良好的社会风俗和风气完全是以这一荣誉的原则为基础的，以其决斗的方法来表明，它是一座抵御野蛮残忍之攻击的堡垒。希腊人、罗马人都自信地夸耀，他们并没有任何骑士荣誉的妖魔支持，社会也一样美好甚至天下大治，民风 and 民俗都很有秩序。

权力之道个人的勇气

在今天的社会里，男人宁可舍弃其他品性而只需勇气。

个人的勇敢是一种很不重要的德性，它明显地标志着一种次要的德性。这种德性就连低等动物都能胜过我们，你决不会听到有人说“同狮子一样勇敢”，它离社会的标准还很远。骑士的荣誉为不诚实和邪恶，以及卑劣的野蛮行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它所需要的只是尊敬和粗野无礼。人们的缄默不语常常掩盖了这种粗鄙野蛮的行为，因为不会有人冒着断头的危险去指责这种行为。

在政治、金融方面都没有令人敬佩的民族，决斗倒使他们嗜杀成性的热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何鄙视或仇恨的表示都会招致他人的恼怒怨恨，这是人的本性，正如西塞罗所说：“有些东西被忌妒的利箭深深

射穿，甚至聪明富有的人在痛苦的地方也会发现自己的创伤。”除少数宗教教派外，世界上没有谁能对侮辱和攻击处之泰然。人们最自然的要求，就是对冒犯者给予相应的报复，一般不会走到极端而置人于死地，以作为对他人虚伪愚蠢、懦弱的适当惩罚。

报复来自于愤怒，并非出于这种荣誉的责任和义务，而骑士制度的提倡者却试图归之于这种责任。指责越真实诽谤就越严重。某一过失，如果切中要害，只要一点暗示，就会得罪他人。如果毫无根据，即使是恶毒的谩骂，也不会让人动怒。

确信自己不值得人们蜚短流长的人，就会蔑视它，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就会泰然处之。而有关荣誉的理论却要求人们表现出一种自己不具有的敏感，并对他无法觉察的侮辱表现出不满，但他自己必须拥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能正确估计自己的价值，他就会对侮辱无动于衷。如果他无法讨厌侮辱，那么稍具精明和修养，就会使他不露声色，掩饰愤怒。如果他能够消除这种有关荣誉的迷信：有人受到中伤时，其荣誉就会消失殆尽，他一旦给予报复，荣誉便会恢复。

如果我们可以让人们不表现出恶行、粗野、傲慢无礼，用战斗来捍卫这一切，就有了合法的权益，我们就会得出一条一般性的意见：侮辱与轻蔑就像一场战争，而遭受损害的人赢得了战争。

我们要严肃地对待问题，就必须考虑，这样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得罪那些笨蛋。这类人，即使最不足道的小聪明也会大惊小怪，心怀不满。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常常会受到那些除了狭隘与愚蠢便一无是处的傻瓜们的反对。假如这些都像我们想的，理智上的优越性就可以在社会中占据它应当占据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现在把持了这一位置的，却是体格上的优越性，即一种战斗精神。尽管人们不愿承认这点。两者交换的结果就是：最优秀的人更没有脱离社会的理由。这为引入一个温文有礼、真诚坦率的美好社会铺设了道路，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在希腊、科林斯和罗马都曾一度存在过。

我试图找到一些确实的理由，来证明这一论点：一部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自信，确认打人是可怕的事情。我认为，无论是从人的动物本性看，还是从其理性的角度看，要证明这点都是徒劳无益的。一拳头永远只是一个人给予他人肉体上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损伤。所以只能说明他在体力或技巧上胜人一筹，或说是乘人不备暗下毒手之外，什么也不能证明。无论如何分析也不会有进展。一个骑士把来自人手的打击看成最邪恶的事，而同样是这位骑士，倘要被他的坐骑踢得凶狠十倍，当他强忍疼痛蹒跚走开时，又会根本不把这当作一回事。

在战斗中，骑士可能被同样的手砍杀刺伤，他会确信：他所有的创伤不值一提。据说无论如何全面的拍打也比不上手杖的打击恶劣，而且，不久以前，军校的学员有可能挨其中一种器械的痛击，听说最高的荣誉倒是授予骑士爵位。

这就是我所能发现的全部心理的或道德的根据。对我来讲，要做的只是宣告，整件事情都是有深刻根源的过时的迷信。

我的观点会由于这一事例而使理由更充分。在高度文明的中国，人的本性不会按照同样的规律去发展。相反，不带偏见地去看人的本性，就可看出，人的打斗和猛兽的撕咬或用角的抵触进攻一样自然。人也可以说成是打斗的动物。我们的感官，一旦听说有人咬人，就会令我们顿生厌恶之感。

对人来说，挨打或打人都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有教养，我们就可以相互克制免于打斗。在世界上有过多的十足的罪恶，以至于不能容忍。我们通过想象中的灾难来夸大这种罪恶，这种臆想会在人们的人生旅途中带来真正的灾难，然而，这正是这种迷信的结果。

在 19 世纪，还有大量的生活浸透着这种影响，这是对我们的羞辱！现在真正到了该彻底

消除的时候了。今天的男人们连斗狗、斗鸡都不允许，在英格兰，斗狗和斗鸡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但由于这一荒谬的迷信和可笑的原则，人们违背自己的意志陷入了生死搏斗，这个原则强加给我们的义务，正像那些胸怀狭隘、支持和拥护这一原则的人宣布的，就是去为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像角斗士一样互相打斗。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放肆嘲笑这种愚蠢的过度迂腐。令人作呕的是，这一原则的荒谬习俗，却能在国家的范围内形成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容易被运用，它只认强权不认公理。它飞扬跋扈，对在他势力下的上层社会实施暴戾的统治。它可以用最经不起推敲的借口提审他人，并在当时当地两人之间的生死之争审判。如果他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一分子，他就会威胁甚至杀死最高、最优秀的人物。

现在，法律决不会让这些坏蛋在光天化日下袭击我们，侵害我们的生命财产！这种结果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每时每刻生命都要受到那些满脑子都是粗野、狂暴、愚昧而有恶毒想法的无赖威胁；两个幼稚未开、易于激动的人，就由于发生了几句口角，便要受到伤残甚至被杀害，这是穷凶极恶的。

在国家范围内的这种暴戾势力和迷信的力量，可以通过这一事件而看到：由于挑衅者地位的优越或卑下，或其他造成人们地位差别的东西，那些无法恢复骑士荣誉的人常常会绝望而自杀，从而导致一种悲剧式的结局。如果人们发现事情的结局和逻辑结果相悖，人们就会明白，这件事情是错误而且荒谬的。在这点上，我们的言行也是荒谬绝伦的。因为一方面任何官员不得参与决斗，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向他挑战，而他拒绝应战，他就会受到解除职务的惩罚。

在一场合理的战斗中，公开杀死敌人，与施放暗箭杀死敌人，之间的最大区

别，完全是从这一事实推论出来的必然结论，我以上所说的国家范围内的权力，只承认强权，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即力大者有理，并求助于上帝的审判，以此作为整个习俗的基础。因为要在一场合理的战斗中杀死敌人，要证明行为公正，就必须设强权者的理是公理。

事实是如果我的对手不能保护自己，他就有被我杀死的可能，而这并不意味着符合公理。公理，即道德的正当理由，完全依赖于我取他性命时的动机。甚至可以假定我有充分的杀人动机，而没有置人于死地的理由。这完全取决于我是否比别人射击得更准或击剑击得更好。无论如何，这和我杀人的方式毫无关系。从道德上看，力大者的权力并不比技巧更熟练的人有说服力。倘使要奸诈地谋杀一个人，人们便会使用技巧。这样，强权和技巧就有了公理。在决斗中，这两者都起作用，因为伪装只是奸诈的代名词。如若我认为我取人性命是公正的，我首先就要弄清别人是否比我更精于射击和剑术，这是愚蠢的。

卢梭认为，洗刷耻辱的恰当方法，不是和冒犯者进行决斗，而是暗杀他。但他只是在《爱弥儿》的某一卷中，以小注：谨慎地暗示了这个观点。这说明哲学家本人完全受到了中世纪这种骑士荣誉之迷信的影响。

认为杀死对手是公正的，这是一种偏见。只要在公开的竞争中和在使用同样的武器时存在这种偏见，它就会把强权当作公理，同时，把决斗当作上帝的干预。意大利人在哪儿碰到对手，就会在哪儿勃然大怒地打起来，并毫不客气地杀死他。他的表现坚定并且自然，但他没有决斗的人那样恶劣。如果有人说他在决斗时杀死对手是正当的，因为对手也正要杀死他，我们就可以回答他：正是因为你有这种决绝的要求，才使对手不得不保护自己。由于相互之间都要进行自我保护，决斗的人就要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以便凶杀他人。我宁愿凭借“勿故意为恶”的法律原则来判断行为的正当与否，因为决斗双方都同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法律。

通过表明受伤害一方在意志上不愿受到伤害，就已批驳了这一论据。因为正

是这种残酷暴虐的骑士荣誉原则，由于荒谬的信条而迫使把人拖入了血腥的争斗中。

关于骑士的荣誉，我讲得很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道德堕落，理智丧失，而奥革阿斯的马厩只有用哲学的扫帚才能清除干净。有两件事物，比任何东西更使得现代生活的社会结合方式不适宜与古代人的社会结合方式相比较，这两种事物给我们带来了黑暗、阴郁；而古代人的社会结合方式，新鲜且自然，完全是自由的。这就是现代荣誉和现代弊病，“一对高贵的搭档！”这两者相互勾结，危及所有的生活关系。特别是现代弊病的影响更深远，它不仅是一种生理的疾病，还是一种道德的弊病。

从在丘比特的箭袋中发现毒箭时起，男女关系中就渗入了一种挑拨离间、相互敌视、穷凶极恶的因素，就像在他们相互交往的经纬线中编进了一缕令人恐惧和怀疑的不吉祥线，而这条线又间接地动摇了人类友爱的基础，对整个人生多少要发生些影响。

骑士荣誉原则产生了与此类似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造成了现代社会人的呆板木讷，阴郁悲观，胆小羞怯，迫使人们时刻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提心吊胆。它每年要从一些高贵的家庭找来一大批孩子，作为它的贡品，这些孩子并不只是来自某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整个欧洲。现在已经到了该彻底打击这种愚蠢制度的时候了，这就是我现在要努力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找到几种方法，一是现代荣誉的医治方法。二是通过哲学来纯净我们的观念，消灭现代弊病。因为只有消除我们的观念，才能根除邪恶。

如果他们真想消除决斗制度，我建议以法律来取得我准备担保的事情的成功。这不是酷刑，不需要断头台、绞刑架或死刑就能推行。它只是一枚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小药丸。如果有人向别人挑战或应战，就请让下士把他带到禁闭室，狠狠地打他一顿；军士或职位低的人则打六棍，如果已经发生了决斗，就按照惯例

进行刑事诉讼。

一个人有了骑士的概念，也许会反对说，如果一位体面人受到这样的惩罚，他就可能开

枪自杀。我认为这种家伙既然这样愚蠢，就让他自杀好了。政府不会卖力地去制止决斗，那些行政官员和军官，对他的服务，只付给很少的报酬，并且还要由荣誉来补偿，而荣誉又由爵位和勋章来体现，所以，决斗对那些有地位的人来说，无疑是经久耐用的身外之物；他们在大学里就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一旦发生偶然事件，他们就要制造流血事端。

而国家荣誉，是指所有民族的荣誉，由于这里不存在什么可申辩的法庭，而只有武力的法庭。国家的荣誉就在于形成一种意见，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不仅要坚信这种意见，还要敬畏这种意见，绝不允许对它的权威进行攻击。

权力之道人格的力量

人格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它是我们幸福的惟一源泉。而其他的东西只是媒介和手段，不会对幸福产生根本影响。

人们的意识是靠持久和永恒的东西形成的。任何时刻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受个性左右，即使有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是偶然的、转瞬即逝的，而且还会受到各种机遇和变故的制约。

亚里斯多德说：始终不渝的不是财富，而是品格。人们宁愿忍受外来的不幸，却不愿忍受来自自身的不幸。因为运气是不断变化的，品格却不是那样。源于内心的福事——高尚的品性、杰出的才智、优雅的气质、开朗的心境和完美健全的体格及健康身体内健全的精神，都是幸福首要的、也是重要的因素。

最能使人幸福的是愉快而美好的心境。良好的性格会让自己直接受益。快乐惬意的人总有多多的理由去快乐，而其他任何东西都难予代替这种性格。

记得一本书里这样说：“你若笑口常开，你便幸福；你若悲哀不已，你便不幸。”

多简洁的格言，一旦快乐敲响了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应主动为它敞开，否则，快乐是不会贸然闯入家门的。

我们有理由满足，但我们又惟恐精神的欢乐与严肃的反省或深沉的忧虑相抵触。快乐是一种直接的获取，对于幸福，它就像实实在在的货币，但不像支票。惟有快乐能使我们获得眼前的幸福。幸福，往往处于两个永恒之间的那一瞬。促进这种快乐感并使之得到有效的保障是我们追求幸福的目的。

财富不能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快乐，而健康却能最大限度地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常常在低等阶层即工人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脸上，看到欢乐和满足；然而在上流社会，却常常会看到充满抑郁烦恼的面孔。

要保持健康就应避免一切过度、放纵、不愉快的情感及精神上的过度劳累，坚持每天在新鲜空气里锻炼、冷水浴等，从事些能够促进健康的活动。没有适量的锻炼，就无法保持健康。为了充分发挥身体各个部分的机能，要尽可能多做些运动。

亚里斯多德曾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生命的真正本质。人体的各个部分都在持续不断地运动。心脏，由于复杂的收缩和舒张，才强劲有力而不停地跳动。心脏每搏动 28 次，血液就会穿越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运行一周；肺脏就像一台蒸汽机，在连续不断地呼吸；大小肠在不断地蠕动；各种腺则在不断地吸收和分泌激素；甚至大脑也随着每一次脉搏的跳动和每一次呼吸进行着双倍的运动。一旦某一部位不能运动了，就会变得像无数被安置在不能活动的场景中的人们一

样，外部无法活动，内心又在进行着激烈的骚动，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眩目的、致命的平衡。

由于内部运动需要外部运动的配合，我们不得不压抑一些情绪。这里简洁地表达这样一个法则：物体运动的规律是，速度愈快动得愈厉害。我们将精神愉快、身体强壮时和因病痛而抑郁沮丧、烦恼苦闷时的外部环境分别与事件对我们的影响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精神又依赖于健康状况。这并非是客观的“事物是什么”，或“事物自身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使我们幸福或不幸。近 90%的幸福依赖于健康，而所有事物都会由于健康而令人快乐。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能令人愉快；甚至伟大的心灵、快乐的性格，也会由于缺少健康而大为逊色。人们相遇时，首先就是相互问候彼此的健康，表达自己对他人身体健康的关注及良好祝愿。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幸福的首要条件。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为了其他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健康。除健康外，无论是什么样的幸福，如利益、晋升、学问或荣誉，都是愚蠢的行为。为了转瞬即逝的肉体快乐而糟蹋自己的健康的行为就更不必说了。任何健康的东西都能带来更多的幸福。

健康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们带来快乐。但快乐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一个人在体格上可能十分完美健全，但也许他还会多愁善感、忧郁悲哀，并屈从于一些悲哀的念头。我们确实可以在生理构成上，特别是在一个人的感受性和他的体力、肌肉力量的关系中找到这种心情的最后根据。感觉性不正常，就会导致精神平衡，周期性地奔放纵情，就会出现颓丧消沉的心理。天才往往是些坚强或感觉性敏锐的人。

亚里斯多德说：“在哲学、政治学、诗学或艺术方面有着杰出才能的人几乎都是些多愁善感的人。”西塞罗也说：“亚里斯多德说过，智者多虑。”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剧中说到人的两种天生的气质：自然漫长的岁月塑造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人拿眼睛窥视打探，就像苏格兰吹笛人的笑声，有人言辞尖刻，

但他们笑不露齿，尽管涅斯托尔发誓说滑稽令人捧腹。柏拉图根据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印象表现的敏感性程度，对快乐进行了划分。

让某人感到悲观绝望的事情也许会让其他人感到乐观并充满信心。一般来说，对不愉快印象的感受越强，对快乐印象的感受就越弱。同一件事既可能产生坏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好的结果。性格抑郁难处的人，一旦结果不妙便会悲观失望苦恼忧伤，就算事件是令人快乐的，他也不会有快乐的兴致。相反，温和快乐的人既不会为不妙的结果担忧，也不会为此恼怒不安，一旦情况有了好转，他就会为此而高兴。

有的人办事十次有九次成功，但他却不会感到高兴，他会对其中一次失败耿耿于怀。相反，有的人即使只有一次成功，也会努力地从经验中找到安慰并保持快乐的心情。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几乎没有什么灾祸是完全得不到补偿的，性格忧郁悲观的人所要克服的不幸和苦难，总的说来，多半是虚构出来的，因此不如那些无忧无虑乐观开朗的人面临的困难和疾苦真实。总是看到事物的黑暗面，常常因害怕坏结果而采取相应行动的人，同总是看到事物的光明面的人一样，也不会经常失望。

神经不正常，或消化器官紊乱失调，且天生多愁善感的人，往往会由于长期的不安难受，而厌倦人生，导致他产生自杀的愿望，甚至某件微不足道而令人不快的琐事也可能令他自杀。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坏的地步时，他就更可能自杀了。一个人因为长期的不幸而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会冷静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定。

受难的人由于平常受到监护，所以他急切地等待着人们疏于防范的时机，然后毫无内心的挣扎，无所畏惧或退缩，以极其自然随便的抗议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解脱。甚至最健康的人、最为乐观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执意去死。如当他的苦难，或对某一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恐惧超过他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死亡。惟一的区别是导致这种致命行为的必然的苦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快乐的人来说，这种程度要高得多，而抑郁的人，一丁点苦难便可导致他（她）自杀。人越是多愁善感，就越容易自杀，走到极端的人甚至没有什么痛苦也会自杀。如果一个人乐观开朗，有健康的身体作为精神支柱，那么，不遇到灭顶之灾，他就不会去自杀。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自杀行为，有的是因为天生的抑郁加剧而自杀，有的是健康乐观者的自杀，但他们都是有实在的理由的。

美被认为是个人的优点；严格地说，它却不能直接给我们带来幸福。美只是间接地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是在相互引荐时帮助我们生辉的外在标志，使我们在心理上对英俊潇洒的人预先获得某种好感。荷马说，红颜丽质不可轻易丢撒，除上帝外，谁也不能给人以美貌。

只要略加考察就会发现，痛苦和厌倦是幸福的两大劲敌。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摆脱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却无法摆脱。人生一定程度上游移于这两者之间，原因在于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双重的对立：外在的或客观的与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困境和贫穷使人痛苦，但境况太好又令人厌倦。

处在社会底层的男人，常常不断地为谋取生活必需品及摆脱痛苦而疲于奔命，上层社会却不断地受到厌倦情绪侵扰。这种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源于一个事实，对痛苦的感受和对厌倦的感受成反比，因为感受是直接与心灵的力量相关的。就像晦暗麻痹的心灵与迟钝木讷的感觉，以及任何刺激也无法使之受到影响的神经，和对痛苦与忧虑均漠然无知的性格相联系。从根本上讲，精神麻木，是在脸上反映出来的灵魂空虚，是对外界各种无谓的琐事表现出来的持久而强烈的反映。厌倦根源于为充实心灵和精神而不断地追求刺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乞求一些可耻卑鄙的娱乐，一心想着社交的乐趣，或依仗着一些“长舌妇”或作风懒散的人。由于内心空虚，他们乐于与人交际，追求声色犬马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有许多人落下了颓废悲惨的下场。一种精神

财富，再没有什么比摆脱这种凄然悲伤更好的了。精神越富有，就越免于厌倦，而思想的活力却永远也不会枯竭。我们可以在自我和自然的各种现象间找到些新材料，使自我和自然结合成新的联盟，从而不断激励自己。

非凡才智还根源于超常的感受性，意志的力量越大，人的热情就越高，两者结合起来，情感的能力便如虎添翼；不能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对障碍的不满情绪越大。由于想象的力量及在思想范围内所具有的鲜明生动的特性，加上那令人不快的事情，痛苦忧虑的情绪就会被恣意夸大。无论是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人越是接近人生某种苦难的根源，他离其他苦难就越远。

男人有一种尽可能使自己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相一致的天性，所以人都会与自己最容易遭受到的苦难进行殊死的较量。

聪明男人往往把追求自由闲适、避免痛苦和忧伤放在首位，他注重恬静闲适、质朴适度的生活，而避免各种遭遇。在和人们有了交往后，他宁愿过隐士般的生活。如果他很有理智，他还可能离群索居。因为一个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越丰富，他便越少求别人，同时，别人也很难再给他什么。如果单是从量上相加就能使人聪明的话，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值得的。相反，就算把成千上万的愚人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一个人聪明起来。

对另一种犹豫不决的人来说，一旦没有了对日常必需品需求的痛苦，就会不惜一切地努力纵情岁月，与名流周旋，贪恋他的所有欲望。任何离群索居的人，都会依靠自己的一切来谋求快乐，这时他的内在所有也常常会充分展露；而衣衫华丽的愚人却在低劣人格的重压下痛苦地呻吟。他不能摆脱这种重负，而聪慧的人却会以他那富有生气的思想来摆脱单调乏味的处境。

我们通常发现，只有智商很低的人才喜欢交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选择不仅仅是孤独寂寞，但也不会过于粗俗。黑人是最喜欢交际的，他们的智力较低。一篇文章这么说：“北美的黑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在狭小的场所

里，大多都缄口不语，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塌鼻子朋友。”

人们把大脑看作有机体的寄生物，好像它就是寄居在身体里的佣人。一个人充分享受自己意识和人格的时间，就是生存得以休息的产物。生存，是为了操持劳作和奋斗。极度闲暇往往会导致烦恼和沉闷单调。当闲暇被感官的快乐和愚蠢占据时就例外了。从人们度过闲暇的方式可见，有价值的闲暇很少。如阿里奥斯托评价：虚度时光的无知者是多么悲哀啊！凡夫俗子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打发时光，而天才却常想着要如何利用它。

智力不健全的男人容易烦恼。

原因是他们的智力仅仅是意志的原动力借此发生作用的中介。无论何时，导致意志运动的东西都没有特别之处，意志停滞不动，他们的理解力就会告假歇息。由于与意志同步平行，它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才能活动起来。其结果就是人所具有的后天能力都变得停滞迟钝。为了消除这种感觉，人们就会去从事一些琐事以便获得快乐。为了使人的能力活动起来，寄望于意志希望推动智力的活动。

在其他国家，社交场合主要的消遣方式是打牌。打牌是衡量一个人思想是否空虚的标准。因为人们在不想着从事其他事情时打牌，就可以试图赢得别人的钱财。所以可以说打牌为进入大千世界并从事商业活动作好了准备。人们可以借助打牌学会如何巧妙地利用那些偶然而又不可改变的情况，想法从其中获取所能得到的、尽可能多的东西。他必须学会迷人眼目，学会用漂亮的装饰来掩盖商品的低劣。

因为这个原因，打牌又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径。它的整个目的就在于用各种诡计和技巧来赢得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在牌桌上的这种习性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延续到生活中去。

在商业活动的日常生活中，男人们会把我的和你的财产权利看得和牌戏一样

轻巧，一旦不受法权的制约，就会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拥有的有利条件。所以说，闲暇是生活之花，或生存之果，闲暇使人回归自我。只有那些自身拥有某些真正东西的人才是幸福的。你会从绝大多数人的闲暇中得到什么呢？——大概只有些于你无助的伙伴。

没有哪个国家比很少输入商品或根本无须进口的国家生活得更美好，同样，最幸福的人就是精神富有的人，对外在生活条件需求极少或无所需求的人。

权力之道如何认识自我

自我是人们所能获取的美好事物的源泉。

人们越是能从自身发现快乐的源泉，人们就越幸福。所以，亚里斯多德说：“知足者常乐。”因为幸福的其他源泉，在本性上是不可靠、不确定、转瞬即逝和偶然巧合的。就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容易耗尽一空，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老年，爱情、才智、旅行的渴望、马背上的欢乐及社交的能力等这些产生幸福的源泉都会离我们而去，亲戚朋友会被死神从我们身边夺走。这就要依仗一个人内在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内在的东西才会长久地伴随着他。只有它才是幸福的持久的来源。

世界充满了悲哀和痛苦，没有人能摆脱悲哀和痛苦。命运残酷无情，人类孱弱可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内心富有的人才像圣诞节明亮温暖、充满幸福的房子一样，内面温暖外面却是数九寒天的冰天雪地。所以，谁拥有这种杰出而丰富的人格，谁就会获得幸福的命运。

在天性和命运中已赋予了智慧的人，最关注和渴望的，是维护他固有的幸福的基础，为此，必需能独立自主并享有闲暇。克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娱乐消遣。因为他的愉悦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局限在外部世界。所以，他不会因渴求加官进爵、牟取钱财、贪恋名声或同伙的赞誉而误入歧途，也不会为满足低俗的欲望和粗鄙的趣味而放纵自己；他会听从贺拉斯在给乌其纳斯的书笺中所作的劝

告：舍弃其内而求诸于外，为荣华富贵而放弃心灵的平静及闲暇和独立，不啻为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即时而赞美牲畜的饱食，时而倾向阿拉伯人的富有悠闲和自然奔放。

那些厌倦于呆在家里的男人，常常离开自己的大厦而到外面去，然后又转回来——原来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他骑着马疾驰而去，疯狂地奔往自己的别墅，就像赶去帮忙救火一样。然而他双脚一迈进门槛，就打起呵欠来，或昏昏沉沉地寻求着把所有的事物都忘却，或者急急忙忙地再赶回城里。

这种人年轻时体力过剩且精力充沛，那不同于心灵能力的力量并不能使充沛的活力长久得以维系。但到了晚年，他们在精神上的力量就荡然无存了，也不会再有想发挥这些能力的思想了，所以他们处境困窘，但却还有意志，因为这是他们惟一没有枯竭的力量，他们用容易使人激动的兴奋剂，来刺激他们的意志，诸如给靠运气取胜的游戏下大赌注，这是一种最堕落的恶习。也许有人会泛泛而论，认为一个人发觉自己无事可干，就会选择某种自己擅长的、合适的娱乐。如玩球、下棋、打猎、绘画、骑马或听音乐；打牌或写诗，研究哲学等。

这些爱好可以还原为三种基本的能力或因素。

首先是由于旺盛精力而产生的快乐，对于食物、美酒、休息和睡眠的快乐。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快乐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其次是由于具有强健的体力而产生的快乐，如散步、跑步、跳舞、击剑、骑马及类似的休闲活动，有时这种需求采取运动的形式，有时则采取军事生活及战争的形式。第三，是由敏感性引起的快乐，如观察、思想、感觉，或对于诗歌或文化的鉴赏力，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哲学和诸如此类的事物。

在这一点上，敏感性的快乐比其他两种基本的快乐更为重要。因为这两种快乐也一样地存在于野兽中。精神的力量乃是敏感性的形式，所以敏感性的优势能使人获得与心灵相关的快乐，所谓理智的快乐，敏感性越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就会获得越多理智的快乐。寻常之辈只对能使他的意志激动起来的事物感兴趣，即对那种让他个人高兴的事物感兴趣。不断地刺激意志不是纯粹的美事。

纸牌游戏这种“优雅社交”的一般娱乐，便是为提供这类刺激而发明出来的，而它的乐趣却是非常短促且微不足道的，因此所产生的结果倒是不尽的痛苦。

一方面，理智健全的人只对仅仅与知识相关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不掺杂任何意志的成分，这就会把他置于一种与痛苦不能相容的境界。另一方面，精神力量极大的人则富于思想，生活充实多彩，意味无穷，一旦他自由自在地去从事这些工作，那些客观的对象就获得了价值，而且变得趣味横生，从他自身便会产生出最为惬意的快乐来，他所必需的外在激励来自于大自然的作品，产生于对人生的沉思及伟大的时代和伟大国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惟有这样的人才能欣赏到这一切，就仿佛惟有他才真正理解和感知到这些。许多人都只是为自己活着；他们向他提出呼吁，其他的人仅仅是偶然听到这个呼吁罢了，这些人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他们的追随者，都仅仅局限于一知半解。

理智的人的这种特性，意味着他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需要，他需要阅读、观察、研究，需要沉思冥想，需要实践，需要不受任何干扰的闲暇。这正如伏尔泰的评说：“没有现实的需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为什么对这样的人来说快乐是可以理解的，而其他的人却拒绝接受？原因就在于对大自然、艺术、文学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好事物的需要。如果有人既不想得到这些快乐也无法欣赏这些快乐，那么即使把快乐堆积在他周围，也是完全徒劳的。人一旦超人一等，就会过着两种生活，即肉体的生活和理智的生活，后者逐渐被看作是真正的生活，前者则被认为仅仅是达到后者的媒体。

有人把这种肤浅空虚、忧虑烦恼的生存方式当作目的。由于洞察力日益提高，知识不断增长，生活就像一件慢慢形成的艺术品那样，变得越来越连贯一致，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与理智的生活比较，斤斤计较于肉体安逸舒适和范围宽泛而实质肤浅的生活，显得非常可怜无聊。

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没有激情来刺激，就会令人沉闷厌烦，枯燥乏味；有了激情，生活又很快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那些因自然赋予了超凡理智的人，及除必须听从其意志命令的东西外的某些事物的人，才是幸福的。这能使他们过理智的、无痛苦而趣味横生的生活。仅仅只有闲暇自身，即只有意志的作用，而无理智，那是不够的，必须有实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于意志的作用而求助于理智。由于心灵的生活随着实在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心灵的生活能够无止境地展开。

男人们以他们的身外之物当作生活幸福的源泉，如财产、地位、妻室儿女、朋友、社交，及诸如此类的一切；一旦失去了，或失望了，他的幸福的基础就崩溃了。他的重心并不是自己。因为各种愿望和奇怪的想法在不断地变化着，如果他是一位有资产的人，他的重心有时就会是他的乡间宅第，有时则是买马，或宴请友人，或旅行。简单地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就是他从他的身外之物寻找快乐的原因。

有些男人，健康和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试图用果子浆和药物来恢复健康和力量，而不去开发利用自己的生命。在讨论相反情况前，我们先比较一下在两个极端之中的这一类人，这种人并没有杰出的精神能力，但理智又比一般人强一些。他对艺术的爱好仅仅限于粗浅的涉猎，或只对某个科学的分支有兴趣。如，植物学或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能在这种研究中找到极大的乐趣，那些导致幸福的外在推动力一旦枯竭，或不再能满足他，他就会靠这些研究来取悦于自己。这种人其重心已经部分地存在于自身之中了。但这种对艺术一知半解的爱好与创造性的活动迥然有别，对科学的业余爱好容易流于疏浅，而且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只有这种男人，重心才可能存在于自身之中，这样的人很少，无论他们的性格如何优秀，他们都不会对朋友、家庭或一般的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人却常常这样。如果他们心里只有自己，他们就不会为失去任何东西而沮丧。这样，他们的性格就有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不会使他们满意，这种孤寂对他们越发有效。他们就像本性与别人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时刻强烈地感到了

这种差别，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习惯于流离转徙浪迹天涯，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

我们的结论是，自然赋予他“理智财富”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比客观世界紧密；因为无论客观事物是什么，它只能起间接作用，而且还必须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

普通男人的命运注定有困扰，而它并不属于人的本性，一般人命中注定终生要为自己和家人谋生，为求生存而与艰难相搏，所以智力活动相对较少。常常很快就会厌倦无干扰的闲暇，而不需要任何不真实不自然的目的来占有它，人生就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由于这些原因，它受到了种种可能性的威胁，正如格言所说：一旦无所事事，最难的就是保持平静。

理智过于超常，就会跟变态一样不自然。如果一个人拥有超常的理智，他就是一位幸福的人，他所需要的无干扰的闲暇，正好是其的负担；一旦缺少了闲暇，他就会成为套上缰绳的柏伽索斯，就会不幸。设想外在的与内在的，无干扰的闲暇与极度的理智，碰巧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就会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如若结局一直令人满意，就会让人享有一种更高级、免于痛苦和烦恼、一种免于为生存而作痛苦斗争的人生，能够享受闲暇的人生，只需相互中和抵消，不幸就会消除。

理智过人意味着性格神经质，从而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会很敏感。这种天赋意味着性格狂热执着，想象更为夸张鲜明，这种想象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地伴随着超常的理智，它会使具有这种想象的人产生程度相同的强烈情感，使他们的情感无比猛烈，而寻常的人对于更轻微的情感则深受其苦。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情比带来快乐的事情多。理智的天资常常会使有天资的人远离其他人。因为一个人越丰富，他在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就越少，别人所感兴趣的事物，在他看来肤浅而乏味。

精神空虚贫乏的男人，由于其理智狭隘偏执平庸流俗，只能称作凡夫俗子。我宁愿采取更为偏激的观点，用凡夫俗子这个词指那些为着并不真实而自以为实在的对现实忙忙碌碌的人；但这样的定义只是一种抽象模糊的界说，所以很难理解。如果我们能令人满意地提示辨别凡夫俗子的本质特征，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阐明其他的定义。

我们可以把他们界说为缺少精神需要的人。相对于他自身，他没有理智上的快乐。没有真实的需要，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常人们并非靠着获取知识的欲望，靠着为他们自身着想的远见卓识，也不依靠那些与他们十分接近的富于真正审美乐趣的体验，来给他们的生活灌注活力。

如果上层社会欢迎这种快乐，这些凡夫俗子就会趋之若鹜，他强迫自己这样做，但他们所发现的兴趣只局限于在尽可能少的程度。他们惟一真正的快乐是感官的快乐，他们认为只有感官的快乐才能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在他们看来，牡蛎和香槟酒就是生活的最高享受品。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获取能给他们带来物质福利的东西。他确实会为此感到幸福，尽管这会引来他们的一些苦恼。就算他们沉浸在奢侈豪华的生活中，他也感到烦恼。为了解除烦恼，他使用大量的迷幻药物，玩玩球、看戏、跳舞、打牌、赌博、赛马、玩女人、饮酒作乐、旅行等等。而其实，这些都不能免除烦恼，因为哪里没有理智的需要，那里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快乐。

凡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呆滞愚笨，麻木不仁，与牲畜相似。任何东西也不能使他高兴、激动或感兴趣，一旦那种感官的快乐衰竭，他们的社会交往就会成为负担，这样，就会有人厌倦打牌了。他们无法舍弃那些浮华虚荣的快乐，他可以通过这些虚荣来享受到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快乐，如，他感受到自己在财产、地位相对于其他那些敬重他的人的权势及力量，都高人一等，或去追随那些富有而且具有权势的人，依靠他们的光辉来荣耀自己。

从凡人的本性看，由于他没有理智的需要，只有物质的需求，他也会与那些

能够满足他的物质需要的人进行交往。他把别人给他的理智能力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即使他碰巧遇上别人拥有这种能力，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憎恶。

由于除了令人不快的自卑感外，在他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愚蠢的妒意，他不得不把这种妒意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而这种妒忌却可能变成一种藏而不露的积怨。尽管如此，他也不会想到使自己的价值或财富观念符合这样一些性质的标准。他不断地追求地位、财富、力量和权势，在他眼里，只有这些东西才是世界上真正一本万利的，他志在使自己擅长于谋取这些福利，这就是一个没有理智需要的人的结局。

对理想丝毫没有兴趣，这是庸人最大的苦恼，而且为免于苦恼，他们不断地需要实在的东西；而实在的东西既不能使人知足，也很危险。当他们对这些失去兴趣时，他们就会疲惫不堪。相反，理想的世界是广阔无边的、平静如水的。

权力之道财富与权力问题

哲学家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类：一是自然必需的需要，当这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便导致痛苦。二是自然的但并非必需的需要，如某些感官的满足。这些需要难以得到满足。三是既非自然又非必需的需要，它们是阔绰豪华、奢侈挥霍的需要，即身居高位、光宗耀祖的需要，这种需要永无止境，要满足这种需要难上加难。

因为一个人的财富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财富的数量只是相对的。即正好维持在一个人想得到和他所得到的两者之间的比率上。因为衡量一个人的幸福，只根据他所有的而不根据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来衡量，就像只有分子而无分母的分式。对我们来说，决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引起我们的需求，而让我们感到它们的存在。没有它们，我们照样幸福，如果我们想得到某件东西而不能得到，其他的東西即使多出几百倍来也不会让我们满足。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准，而我們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我们有信心在这一水准内得到它，便会幸福，反之就会痛苦。在这一水准外的东西，对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富人们的万贯家财并不会使穷人激动不安。相反，腰缠万贯的人，其希望的破灭并不能因财富领先而告慰自己。

有人说，财富如海水，越喝越渴。原因就是，一旦命中注定不拥有财富，人们就会自始降低自己所要求的数量。一旦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要降低我们的要求就很痛苦。如若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不幸，痛苦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存在，这就像已愈合了的旧伤口。相反，一旦吉星高照，我们的口味就会越来越高。但这种感觉膨胀的过程一结束，快活的心情也就烟消云散，两者相辅相成。我们习惯于追求越来越多的欲望，因而对于能达到这些需求的财产也会不以为然。

人类还有很多的需求，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基础都是需求，我们想到这些，财富赢得最纯真的敬意与极大的荣耀就不足为怪了。只有赢利才能使生活变得更好，而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边。人们常常因为欲望钱财甚于其他，并且嗜财如命而受到谴责。人往往喜欢那变幻无穷的东西，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什么欲望就要实现它。任何别的事物都只能满足一个愿望，一种需要，如食物，只有在饥饿时才是美好的；生病时需要药物，皮裘能抵御冬天的严寒，爱情能满足年轻人的情感等等，都只是“相对的好”。

由于钱不仅能满足我们对某一特殊事物的具体需要，还能满足人们其他的需要。倘使某人有幸不受饥寒之苦，能够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他就会把钱当作一座防御可能会遭遇的多种痛苦和不幸的堡垒。他不会认为，为了获取人生的快乐便可以恣情纵乐，或这种方式毫无目的地浪费钱财。生来没有这一殊荣的人，由于尽情地发挥了他们所有的才干，结果成为巨富，这样的人常常会把自己的天赋看作自己的资本，而他们所获得的钱财则仅仅是这一资本所生的利息。如若他们只赢得了永久性资本的部分收入，他们就决不会罢休。但一旦他们金玉满堂，他们就会大肆铺张。

所以，他们又常常陷入贫困。他们的收入不断减少，到最后消耗一空，他们

的才能已消失殆尽——在优秀的艺术家那里就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才能只是在当时的一系列特殊环境里才能产生效益。一旦环境改变，他们的才能便不再奏效。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吃饭的人几乎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财富的，因为他们的技术不会丢失，即使丢失了，他们工友的技术还会替代，而且永远会有人从事他们的工作。

艺术家和专家情况多少有些一样，这就是他们为报酬优厚的原因，他们应当以他们的收益作为资本，但他们却不顾后果地把这些收益看作利润，结果却是倾家荡产。另一方面，那些继承了钱财的人至少也会知道如何区分资本和利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努力保住他们的资本，并使之不受损失。如果他们有能力，他们至少应该把利息的 12% 存起来以备未来的紧急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但资本和利息并不适用于商业生活。对商人来说，钱只是为获取更多利益的媒介，就像工人手中的工具，即使他们手中的资本完全达到了他们努力的目的，他们还会用它来保存这笔财产并使资本增值。

一般来说，真正知道需要什么和缺乏什么的人，比起那些通过道听途说了解贫困的人，

更不会为需求而担忧，因而就更容易奢侈浪费。在优越环境里成长的人，对将来比那些靠运气突然摆脱困境的暴发户要慎重认真得多，在生活上要节俭得多。如果贫穷离我们很远，贫穷倒仿佛并不是一件真正令人痛苦的事情了。但是，生而富有的人把财富看作是没有它便无法生存的东西，就像没有空气就不能生存一样。所以，他喜欢有条不紊地正常生活，喜欢深思远虑勤俭节约的生活。生而贫困的人则会把贫穷看得十分自然，倘使侥幸发了横财，他就会认为过分多余了，要把它奢侈浪费掉，即使最后两手空空，他仍然不过和从前一样，而且忧虑更少。

如格言所说：骑马的乞丐会让他们的坐骑亡于奔命。

据说，这种人对已使他们摆脱贫困满足需求的命运和某种特殊的手段，怀有

坚定执着的希望；他们和天生富有的人一样，不会把少许贫困看得深不可测。他们认为，即使已完全失败，也还会重振旗鼓。

人类的这一特点解释了这个事实，贫家女在婚前比那些给丈夫带来丰富嫁妆的女子贪心更大，而且更奢侈铺张，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闺秀不仅比贫家女带来了更多的财产，还带来了更多的热望和遗传的天性，以保护其财产。如果谁怀疑这个真理，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他就可以从阿里奥斯托的第一篇讽刺诗里得到验证。

约翰逊博士的观点和我完全一致。他说：“有财产的妇女，善于管理钱财，并且她会极其明智审慎地使用这笔财产。而从婚礼一开始就牢牢地控制了钱财的女人，则花钱如流水，穷奢极欲，把钱财花光。”我奉劝娶穷小姐为妻的先生们，不要将资产而只能将利息留给她们，而且千万不要让她们去掌管孩子们的财产。

这里我并不是在漫谈某些不值一提的话题。因为一步入生活，就需要有足够的资产，使我们能独立起来，不必工作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虽然对此不宜评价过高，却是一大优势，因为这使得我们不受饥寒交迫之苦，而穷困潦倒就像瘟疫一样在人们生活的周围盘旋着，被迫的劳作是自然给以凡夫俗子们的命运，而资财却能从艰难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有命运相助，才能说某人是自由的。即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才能在每天早晨说“今天属于我自己”

但一旦继承的资财花在具有极高精神力量的人手中，就会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他可以执意去追求为谋取钱财之外的不同的生活，命运给予他双倍的酬劳，他的天赋就是他生活的目的。而他以百倍的价值来回报人类，他就会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成就，他会创造某些作品，使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受益无穷，而且可以提高整个人性的尊严。

有些人可能用自己的财产去从事慈善事业，使自己赢得大家的崇高敬意。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和不想这样做的人，及从来不想了解某些知识的基本原理以便

提高知识水平的人，尽管是生在富贵之家，也仅仅是一个虚度光阴、懒惰卑劣、无耻下流的家伙。他不会幸福，因为对他来说，需求已得到了满足。他会遭受其他极端的痛苦，如果他因为贫困而有事可干，情况倒会好一些。一旦遇到苦恼，他就容易去挥霍浪费，与之不配的优越之处就会失去。很多人发现自己有着无尽的需求，其原因在于他们有钱时，只是为了从折磨他们的烦恼中得到片刻的解脱，靠花钱解忧。

如果有人志在取得政治上的成功，那就是两码事了。在政治生涯中，重要的是获得他们的朋友及党派团体的好感，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加官晋爵，平步青云。如果这位胸怀宏愿的人并非来自门庭显赫之家，而仅仅是一位有天赋的人，那么穷困潦倒就会促使他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无论是谁，平常和人相处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证明自己胜人一筹，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如此。因此，只有彻底的寒门之子，才会自感在所有方面都低人一等。一文不名，无足轻重的人，能够不声不响地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只有他才会一直卑躬屈膝、曲意逢迎，在必要时真实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会屈从于一切，而又藐视一切；只有他才懂得功绩荣誉毫无价值；只有他在必须和他的顶头上司及达官显贵交谈或给他们通信时，不会粗声粗气，鲁莽冒失。如果他的上司随手乱抹了几笔，他就会大加称赞，称其为妙笔杰作。只有他在几乎还是孩子时，就知道该如何去恳求，所以走出社会后，他便成了通晓这一隐秘的高级僧侣。歌德指明了这一隐秘：抱怨卑贱的目的没有用处，无论别人说什么，都想是它们支配了整个世界。

而不愁温饱的人，心灵上往往倾向于能够独立自主。他习惯于高视阔步，也许他会有些滥用天赋，尽管他知道这一点，他决不会用这种能力去和那些奴颜卑膝的平庸之辈争高低；他终究会明白那些顶头上司的卑劣无能，倘使他们侮辱了他，他会倔强执拗，感到羞耻。这样的人肯定赞同伏尔泰的观点：即使我们只能再活两天，倘使要向卑鄙无耻的流氓委屈求全，我们宁愿即刻去死。

权力之道傲慢是男人的劣根性

人们常说的愚昧有三点：贪婪、虚荣和傲慢。

虚荣和傲慢的区别在于，傲慢是确信自己在某一特殊方面具有卓越的品质，虚荣则是令他人“确信”的欲望。傲慢存在于内，是直接的自我欣赏。虚荣则是从外欲求达到这种自我欣赏。所以，虚荣心强的人能言善辩，狂妄自大，而又沉默寡言。爱虚荣的人，保持沉默应当知道要比喋喋不休更容易得到他人赞美。所以我们肯定：任何想假装傲慢的人都不是妄自尊大的人。

只要有坚定不移地确信自己具有杰出的品质和特殊的价值，就会使人产生严格意义上的骄狂，或由于偶然的以及一贯的性格优势而产生的确信。傲慢根源于确信，它很像没有经过我们仲裁的其他形式的知识。傲慢的最大障碍就是虚荣心。为谋求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评价打下必要的基础，虚荣心就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而傲慢则是以早就存在的确信为基础的。傲慢，其实就是吹毛求疵，尖酸刻薄。傲慢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傲慢的。一个人如果本性很好，又不自恃己长，与他人和睦相处，就像他与他人完全平等，他人就会真诚坦率地待他。我要特别奉劝那些卓越的人，卓越就像勋章和头衔一样，不能每时每刻都引起人们的注目。另外，亲昵生狎侮，或如罗马人曾经说的：愚人教智者。阿拉伯格言也说：与奴隶开玩笑，不久就会狼狈不堪。我们不能不注意贺拉斯说过的：获取你应该得到的名誉。

当谦虚这一美德具有虚构成分时，对愚人是很有利的。谦虚时刻都在拉平人们的差距。最虚伪的傲慢是民族的傲慢，因为一个人为他的民族而骄傲，就说明他自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否则，他就不会去求助于他的千百万同胞并与他们共同分享那份资本。

一般来说，独具个性的人有过多的先人之见。因此，就难予清楚地看到，他的民族有哪些不足，因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在他眼前不断出现以至于他无法看清。但那些一无是处的傻瓜，把自己所属于的民族当作最后的依靠，并为之骄傲；他常常乐意去掩盖民族的阴暗面，且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我们知道，德国人没有民族的骄傲，这表明他们是诚实的。可是也有些人装腔作势，借口为他们的国家感到骄傲，他们和那些为使国家误入歧途而向群氓媚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们一样让人愤恨、愤恨。

不论怎样说，个性都比民族性重要，任何特殊的个人都比民族重要千百倍。因为不说到大量的个人，就无法谈到国民性，人不可能既竭力捧场同时又保持诚实的作风。

所谓国民性，就是人类的渺小、堕落和卑劣的特性在所有国家里采取的个别形式。通常来说，我们厌恶一种，就会赞美另一种，直到我们对这另一种也厌恶了，我们才会停下来，不再赞美了。每一民族都在嘲笑其他民族，所以，民族之间的嘲笑没有什么公道与不公道之分。

登高的旅游者，只有越过他脚下蜿蜒曲折的道路，放眼望去才可看到一个通盘的概观。只有当我们走完人生旅途的某个阶段时，才可能认清我们全部行为间的真实联系：如我们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才能明白精确的因果链条和努力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沉湎于日常的生活琐事，就往往会按照自己的天性行动，并受情感的左右或能力的限定。简单地说，我们始终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我们认为正当的事业。只有当我们回首整个人生旅程和总体结果时，才能明白全部奥秘。

实际生活中，我们正在进行某项伟大事业或创造某个不朽作品时，一般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本身。我们考虑的只是达到眼前的目的，完成当时的计划。当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时，我们的品质和能力才能展示出来。这是一种引导我们的创造力，既能在理智的事物里被感知，也可以在世间的事物中被察觉。且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而以相同的方式导致不幸和灾难。

理智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现在与将来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以免由于过多地关注其中之一而损害另一个。有很多无足轻重的人，仅仅生活在现在，而

另一些人则沉湎于未来，总是忧心忡忡、愁思满腹。很少有人能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那些寄希望于未来、为之奋斗并仅仅生活在未来的人，对即将来临的事物总是翘首以待、急不可耐，仿佛这种东西一旦到手，就能获得幸福。尽管那些人聪明绝顶、气质非凡，严格说来也只像意大利的短尾猿，一种希望最终得到某种东西的冲力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始终急急忙忙、紧追不舍。

那事物总是恰好在他们的前面，而他们却始终试图得到它。就其整体存在而言，这种人置身于一种恒久虚幻的情景之中，生活于一种短暂的临时状态，直到走完人生的旅途。

既不要让未来牵引我们而思绪不宁、焦虑企盼，也不要沉湎在对往事的追悔惋惜，而要记住：只有现在才是实在的、确定的；未来总是无一例外地使我们的希望落空，过去也常与我们曾预料的相去甚远。无论是未来还是过去都不如我们的想象。同样的物体，由于间距，肉眼看来很小，思想却可以把它想象得很大。只有现在是真实可行的，它是惟一富有现实性的时刻，正是在绝无仅有的时刻，我们的生存才显得这样真实。

我们应当永远为此充满欢乐，欢迎它，并尽情享受这每一时刻带来的快乐。如果我们对过去的落空愁眉不展，对未来的前景焦躁不安，就难以做到这一点。拒斥当前的幸福，或为陈年往事懊恼、为未来忧心忡忡，都是愚蠢的。

男人一生中总有抱憾终身的时候，一旦往事成为历史，该想，逝者如斯，向它道声再见吧。而未来，我们只能认为它超乎人为，只有神知道。

只有那些必然降临的不幸才会侵扰我们，但能对此做出完满说明的人又寥若晨星。不幸或灾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可能，哪怕是极大的可能；一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就算是那些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的具体时间也不确定。如果我们总处在一种戒备状态，就会永远不得安宁。我们并不因为对灾难的恐惧而放弃生活中的乐趣，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不会很快发生甚至不会发生的灾难。

一个人心灵的宁静越不为恐惧侵扰，就越可能被欲望和期待骚动。心灵的宁静，是任何时刻享乐的本质，人生之乐稍纵即逝，须抓紧当下的分秒片刻。我们应当时刻记住：今日仅有一次且一去不返，接踵而来的明日只是新的一日，且也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常常忘记每一天都是一个整体，也是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我们总习惯于将生命看作一个观念或名称，它们无法体验，因此包容个体于自身之中的生命就遭到了破坏。

在那些幸福而充满生气的日子里，我们尽情地欣赏和享受，就算在悲苦忧愁时，也要回想过去的每一寸光阴。在记忆中，它们似乎远离痛苦与哀伤，令人妒羨。往昔犹如失却的伊甸园，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真切地体会到它们是朋友。我们欢度幸福时刻，但并没有珍惜它，当灾难逼近我们时，我们才希望它们归来。无数欢快和愉悦的时光都消磨在无聊的事务中；我们往往由于一些不愉快的琐事而错过愉快的时刻，一旦不幸降临，又为之徒然空叹。那些决不是平凡普通的时刻，往往被漫不经心地打发过去，甚至急不可耐地置之一旁，而它们正是我们应引以为豪的。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流逝的时光不断使当前变为过去，在那里，记忆使之理想化并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只有当我们处在窘境中时，面纱才被揭去，我们也才会为之抱憾终身。

人的最大特点是能适应各种环境。将自己固定在单一的生活方式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怎么说是生活呢？这只能说是为了生存。

只有那些多才多艺、善于交往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幸福。

如果让我按我的生存方法培养自己，我就不会去固定在某一种生活方式上，不管这种方式有多么吸引人，这是因为我不想依赖它。

生活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总是在迁就自己，被自己的爱好牢牢束缚住，到了不能偏离，不敢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

做自我的奴隶。

人最美好的行为方式正是那种最放松、最自然的行为方式，最好的工作是最不勉强的工作。那条规劝人们，愿望必须与能力相符的箴言对我们是多么合乎情理啊！没有比这更有益的哲理了。“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的一句话，这是一句内涵丰富的话。

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事情上去。如果我不去和许多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不能缺少的人和平共处，却一心要去高攀我的交往能力达不到的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难道不能说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吗？我生性懒惰，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反，这就使我免受妒忌和敌意的困扰和威胁。

把享受生活的恩惠作为生活的目的，就应当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性情的乖戾和挑剔。我赞赏多层面性格的男人，这种男人能张能弛，能上能下。不管命运把他摆在哪里，他都能随遇而安。他能同邻里聊他的房子、他和别人的纠纷，能和一个木匠或花匠成为好友。

我羡慕有些人，他们能使仆役感到可亲可近，还能以适合下人的方式与他们谈话。别人琢磨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显得空灵和高深，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浅近平实。拔高和夸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男人的思想并非只在讨论重大话题时才表现出它的特性，在私人交谈中同样能表现。我能从朋友的微笑中了解他们，有时在餐桌上比在会议上更能洞察他们。

我认为，和女性交往时精神上的享受不及在前一种交往中那样强烈，但感官的享受——在这种交往中感官参与得更多——使它几乎和前一种一样令人快乐无比。当然，和女性交往时我们必须有所戒备，尤其那些易受肉体冲动影响的人更应小心从事。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吃过肉体冲动的苦头。据诗人们说，这种冲动会发生在那些放任自流，约束能力差、判断力不强的人身上。

在男欢女爱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这是一种荒唐之举。如果缺乏爱情基础，只是逢场作戏，迫于年龄和习俗的要求，扮演一次大家都演过的角色，不投入自己的感情，这就是一种懦夫行为。就像一个人因害怕危险而放弃自己的荣誉、利益或欢乐。坚信这种做法的人，是不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美满结果的。

命运之神很奇特，它有可能会格外恩宠一些女人的外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一个女人——即使她长得相当丑——是不想男人讨人喜欢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显示她的年轻，或她的笑容、身姿。没有一点长处的丑女如同没有一点短处的美女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没有的。

婆罗门种人有个习俗，凡是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可以炫耀的女性，都要到一个大广场上，向被召集在那里的人们展示自己女性的部位，让人们看看她们是否有资格找到一个心爱的丈夫。

我认为没有丘比特就没有维纳斯，犹如没有孩子就没有母爱一样，二者的本质是互相归属互相依存的。欺骗行为的恶果必将由欺骗者自己吞食，不付出努力的人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把维纳斯敬为女神者，认为她的美不是肉体的美，而是精神的美，这种人寻求的爱不是男女的爱，也不是动物的爱，是一种虚假的精神之爱。

应该承认，所有动物的爱，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低级粗俗。我们看到，想象和欲望如何使动物兴奋，如何在肉体之先刺激它们。我们看到，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的动物，都会在群体中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象，它们之间能保持长期的恋爱关系。那些体力不强的动物，还能因爱情而浑身颤动或发出嘶叫。

动物在交配前充满希望和热情，当肉体完成其应该享受的职能之后，甜蜜的回味仍使它们欢乐无比。有些动物交配后骄傲地昂首阔步，或发出快乐和得意的鸣叫，好像在说它们心满意足了。

我很少去找烟花女作乐的，这并不是因为寻花问柳危害健康，而是出于对这种行为的鄙视。我喜欢让困难、欲望以及某种胜利的荣耀把爱情的快乐刺激得更加强烈。

我很注重女人的心灵，但她的肉体也必须令人赏心悦目。

如果心灵的美与肉体的美必须舍其一，我宁愿舍弃前者。心灵可以在更重大的事情上派用场，在爱情这件视觉与触觉有关系的事上，没有美好的心灵可以，没有美好的肉体却不行。姣好的容貌是女子的优势，她们的美是那么独特，以至我们男人的美虽然要求另一些特征，但只有与她们的美有了共同之处才算美到完美。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有偶然性，它不仅完全取决于自己，同时也取决于别人。第一种交往因其寡见鲜有而令人惆怅，第二种交往随着岁月增长而日渐凋零，它们没有满足男人一生的愿望。

男人的责任男人为什么要离婚

现在在许多国家，离婚现象已普遍被人们认可。

离婚的目的，不是要取代一夫一妻的家庭，只是想减少痛苦。有人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已无法忍受婚姻的痛苦了。

离婚法在不同国家也是有区别的。在许多非基督教的文明国家中，丈夫很容易获准离婚，另一些国家，妻子也不难获准离婚。摩西的法律允许丈夫提交离婚申请，中国的法律也允许离婚，条件是将妻子的嫁装如数奉还。

天主教视婚姻为圣礼，无论何种原因也不准离婚。如果确有许多证据表明婚姻无效，也是可以离的，尤其是涉及到大人物的时候。

在基督教国家，对离婚的宽大程度，与人们信教的程度成正比。米尔顿赞成离婚，因为他是新教的忠实信徒。

过去，当英国新教会的人，曾承认因通奸而离婚，其他原因不在考虑之列。现在，英国教会的绝大多数教士都是反对离婚的。斯堪的纳维亚拥有非常宽松的离婚法，美国大多数新教地区也是如此，苏格兰比英国更赞成离婚，在法国，反教权主义拥护离婚自由，苏联只要一方提出离婚，即可获得批准。

由于通奸或私生在苏联不受社会或法律惩罚，所以那里的婚姻也就失去了它在其他地方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至少这适用于统治阶层。

离婚最奇怪的现象，就是法律和习俗是两回事。最宽松的离婚法并不是总能产生最多的离婚事件。在革命前的中国，人们几乎不知道离婚是什么，虽有儒家先例，离婚仍被视为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

我认为，法律和习俗之间的这种差别是很重要的，我虽然主张对离婚一事应有宽松的法律，但只要父母双全的家庭，仍被视为是标准模式，风俗就会成为反对离婚的强大因素，只有个别的情况例外。我不光把婚姻看成是性的结合，而是把它看成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一种合作。由于各种经济因素，会造成婚姻的破裂，但如果婚姻会破裂，离婚也会遭到破坏，因为离婚是因为婚姻存在而有的一种制度，离婚是婚姻的保证。

第二种方式，即不生孩子的秘密性关系。这是在实践中最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反对理由。一切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不好的，既无孩子又无共同生活的性关系自然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如果男女双方都年轻，我们不应

说你们不能再生孩子了。

第三种方式，即“公开的犯罪生活”是对个人和社会危害最小的一种方式，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种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一个企图过公开犯罪生活的医生或律师，会失去他的病人或顾客。教育工作者会立即失业。即使经济状况使这种公开犯罪生活成为可能，大多数人仍会受到影响的制约。男人希望与俱乐部有联系，女人则希望受人尊敬，失去这些乐趣显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公开的犯罪生活是很难实现的，除非他是富翁、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在那些不允许因精神失常而离婚的国家里，例如英国，那些患精神病的妻子或丈夫就落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除了神学的迷信之外，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去赞成这种情况。不但适用精神病，也适用花柳病、习惯性犯罪和习惯性酗酒。以上这些事实都会给婚姻带来危害。它们使伴侣生活成为一个梦想，使生育成为一种罪恶，使孩子和犯罪的父母得不到应有的接触。反对离婚的理由只能是：婚姻是一个圈套，我们要用这个圈套把那些上当者骗入地狱，让他们经受痛苦。

真正的分居是离婚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是把已有的即婚姻已经破裂的事实，追认一下罢了。从法律的观点出发，这种作法会带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果遗弃或分居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那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遗弃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已婚男女迫切渴望离婚，以至主动创造法律所承认的一切离婚条件。过去在英国，如果一个人想离婚，他必须有虐待和通奸的行为。因此，丈夫和妻子预先约定在佣人面前殴打妻子，作为虐待的依据。

我认为，通奸本身不应作为离婚的理由。除了那些受教权的命令和强烈的道德自责的人外，其他人都不可能不对通奸产生强烈的冲动。但这种冲动绝不意味着婚姻的失效。即使有了这种冲动，夫妇之间仍会有爱情。

比如说，一个出差多日的男人，如果他的身体健全，就很难压制住性欲，尽管他很爱他的妻子。这种不忠行为不应成为夫妻日后幸福生活的障碍，每对夫妇都应当有这种暂时的兴致，因为只要那种潜在的爱仍然存在，这种情趣总会产生。

传统道德歪曲了通奸的心理，它认为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中，如果对一个人有了爱情，就不可能再对另一个人产生真正的爱情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但由于妒忌心作怪，所有的人又都根据这一伪理论，把蚂蚁说成大象。所以，通奸并不能构成离婚的充分根据，除非人们在通奸的侍候，真的认为第三者比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好。

这当然不是指那种导致生孩子的通奸式的性交。一牵涉到私生子，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如婚姻仍在继续，丈夫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孩子，也要抚养别人的孩子，还要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这是违反婚姻法则的，会带来无法忍受的本能上的痛苦。

因此，在避孕法产生以前，通奸也许确实是一件大事情，但随着避孕法的出现，已使人们很容易把性交和伴侣生活区别开来。

合理的离婚理由有两类。第一类是由于某一方有问题，如精神病、酗酒和犯罪行为。第二类是根据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理由可能是：双方经常争吵，无法和睦生活。双方都从事重要工作，工作要求双方必须分居两地，其中一方虽然不讨厌另一方，但对第三者一往情深，以至无法忍受婚姻的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不能给予帮助，危险就会出现。如果婚姻破裂是由于双方合不来或某一方对第三者怀有极为深切的爱慕之情，法律不应做出否定的判决。双方自愿是最好的离婚理由。如果一方有重大问题，离婚就不需要征得双方的同意。

制定离婚法很困难，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法官和审判员总要受情感支配，丈夫和妻子也会极力歪曲立法人的本意。按照英国的法律，夫妇之间的协议不能作为离婚的依据，事实上，夫妇之间常有这种协议。

在纽约，人们往往走得更远，他们会雇用伪证人，作为可依法处罚通奸的凭据。

从理论上说，虐待完全可以作为离婚的充分根据，但对虐待的解释却莫衷一是。因不能性交而无法生育的婚姻应当同意解除。这就是说，如果夫妇希望离婚，妻子持有不能怀孕的医生证明，他们便可以离婚。

孩子是婚姻的结晶，把人们束缚在一种没有生育的婚姻中，只能是一种欺骗行为。

离婚在美国之所以很普遍，是由于美国人在婚姻中，所寻求的并不是他们应当寻求的东西，另一原因是由于通奸得不到宽容的缘故。双方都应当把婚姻看成是一种伴侣生活，而不应当把它视为暂时的私通。这种视婚姻为私通的作法，很容易毁灭父母双全的家庭，如果一个女人每隔两年换一个丈夫，并从每个丈夫那里得到一个孩子，那些孩子就会失去他们的父亲，婚姻也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从孩子的利益来看待婚姻，就会提出另一种观点。凡是疼爱孩子的父母都应当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使他们的孩子能获得幸福。

这需要父母具有极大的自我克制力，这要求父母认识到，孩子的权利远胜过他们自己的浪漫感情。如果父母的感情是真实的，这一切都会是自然的。

有人说，如果夫妻不再彼此热烈相爱，不在意对方婚姻以外的性经历，他们就不能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通力合作。因此，沃尔特·李普曼先生说：“没有爱情的伴侣，在生儿育女上，是不会像伯特兰·罗素先生所要求的那样真诚合作的，

他们毫不在乎。他们认为夫妻关系只是一种责任而已。”

没有爱情的伴侣，在生儿育女一事上，当然不会通力合作，但是在孩子出生以后，他们是不会像沃尔特·李普曼先生所说的那样，失去父母的养育的。

李普曼先生可能没有听说过法国的情形。因为法国家庭非常稳固，父母也十分尽职尽责，尽管他们在通奸享有特殊的自由。

美国人的家庭观念很淡薄，离婚率非常高。如果家庭感很浓厚，离婚率就会降低，即使在法律方面离婚是很容易的。美国人轻易离婚的现象，应当看成是从父母双全家庭向纯粹母性家庭过渡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痛苦的阶段。孩子们都希望既拥有母亲又拥有父亲，而且在父母离婚之前，有了相当深的父子感情。只要父母双全的家庭仍被公认为社会的标准模式，离婚的父母，因重大原因离婚的除外，就属没有尽到责任。

从法律上对已婚男女进行强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应该给双方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婚姻变得更为人们所接受。应该让双方认识到孩子的重要性，因为圣保罗和浪漫主义运动，已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性上。

离婚在许多国家，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轻易的离婚，也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有效办法。为了孩子的利益，稳固的婚姻是必要的。稳固婚姻的最好途径是把婚姻和单纯的性关系区别开来，注重夫妻之爱的生理方面，而不是浪漫方面。

我并不是说婚姻可以摆脱法律上的义务。按照我所建议的制度，人们可以摆脱夫妻间性忠实的义务，应该有控制妒忌的能力。

幸福的婚姻离不开自身的约束，与其约束那丰富的爱情，不如克服妒忌之心。

男人的责任两性关系中的性道德

如想要建立一种新的性道德，应如何规定两性之间的关系呢？

人为地使男人、女人和孩子，对有关性的事情一无所知，是否正确呢？在这方面的无知对个人是有害的，一个制度，如要依靠这种无知去维持，那是行不通的。

我认为性道德，只能为那些懂得这个问题的人所接受，它的感染力决不会依赖于无知。正确的行为决不会为无知所促进，也决不会为知识所阻碍，只有少数偶然的事情除外。

如果甲方希望乙方能够以符合甲方利益，而不是乙方利益的方式去行动的话，不让乙方知道那些会使乙方了解到甲方真实利益的事实，这对甲方也会是有用的。这种作法在证券交易所比较适用，但一般来说是不合乎高尚的道德的。

政府也会隐瞒它活动的大部分事实。例如，每一个政府都会禁止透露战争失败的消息。失败的消息一旦透露，就有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了解这一事实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却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一开始人们只是为了蒙蔽女性。因为人们希望她们的无知，能有助于男性的支配地位。妇女竟然慢慢形成思维定式，认为无知对于道德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她们的影响，人们认为儿童和青年，无论男女，都应当对性的问题尽可能地无知。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动机不再是出于支配的目的，而是进入了理性的忌讳的范畴。

无知是否合乎需要，还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因为如果拿出证据来说明无知是有害的，就会触犯法律。

英国法律宣布，儿童和青年绝不能知道性的事实，他们了解这些事实究竟有益无益，那无关紧要。现在我们不是在法庭上，而这本书也不是写给孩子看的，

我们就可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那种蒙蔽孩子的传统作法，究竟是对是错？

传统的作法，父母和老师都是在蒙蔽他们的孩子。孩子从未见过父母的裸体，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见不到他们的异性的裸体，他们被告诫不许抚弄或谈论他们的性器官，涉及性的问题，就遭到呵斥。

当然，他们迟早会从其他孩子那里了解到那些事情。孩子认为，他们父母之间的行为是难以启齿的。他们总是极力遮掩，他们还知道，那些老师，也在欺骗他们。

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男女，很少有人能对性和婚姻产生高尚的感觉。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欺骗和说谎，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眼里都是美德。一切性关系，即使是在婚姻之内，都是可恶的。在传种接代的时候，男人所服从的是他们的兽性，女人所服从的则是她们痛苦的责任。

这种观念。使婚姻对于男女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那种得不到满足的本能，变成了蒙着道德面具的残暴行为。

道德家认为，性冲动的表现形式，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婴儿期性冲动的方式，是喜欢抚弄身体的某些部位，童年后期的表现方式，是好奇心和“脏”话的偏爱，青春期则采取了更成熟的方式。

是的，性的意识会导致性的不良行为，实现道德的最好方法，就是使青年人的身心绝对脱离与性有关的一切事物。我们不能对他们谈论任何有关性的事情，必须尽可能地阻止他们谈论这些问题，成年人必须装作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类话题。通过这种方式去蒙蔽一些少女，一直蒙蔽到洞房花烛夜那是可能的。

可以预料，那些事实会使她感到极为震惊，并会表现出所有道德家认为的女人应具有性态度。

对于男孩，这个问题则更困难。因为我们不大可能把他们蒙蔽到 18 或 19 岁以后。对于他们，最好的方法，是告诉他们手淫会导致精神错乱，与妓女性交会染上花柳病。

这两种假设虽然不是真的，但也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它们是为了道德才编造出来的。我们还应当教育男孩，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谈论性的问题，即使在结婚之后。

当他们结婚后，他能使他的妻子厌恶性，从而防止她有通奸的危险。婚姻以外的性是罪恶，婚姻以内的性不是罪恶，因为它是传种接代所必需的，也是人类的一种不适当的责任，是对人类堕落的一种惩罚。

但性行为总是和快乐相联系，除非我们遭受到极大的痛苦。通过充分的道德教育，这种现象是可以防止的，至少在女性中。

在英国，在印刷品上宣称妻子能够而且应当从性交中得到快乐，那是违法的。

这种态度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最大后果是它阻止了青年对科学的好奇心。凡是有智力的孩子，都希望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他们经常问及关于火车、汽车、飞机，以及雨的来源和孩子的来源等。好书推荐官微信 2219344884 所有这些好奇心，所依据的不过是巴甫洛夫称之为“这是什么”的反射，这种反射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源泉。

当孩子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到这种冲动却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时，他对科学的好奇心也被抑制了。起初，他并不知道哪种好奇心应当有，哪种不应当有。孩子是怎样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一种罪恶，那么飞机是怎样造出来的，也一定是一种罪恶了。他必然会得出一种结论：对科学的好奇心，是一种不能抑制的危险冲动。

一个人在了解某一事物前，得认真询问一下，这种知识究竟是邪恶的，还是合乎道德的。对性的好奇心遭抑制后，孩子必然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他所渴望得到的知识都是邪恶的。以上原因破坏了孩子们对知识的追求，结果孩子被人为地变成白痴。

不能否认，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女人通常要比男人愚蠢，这主要是由于她们年轻时，被有效地阻止了对于性知识的追求？

除了智力上的损害，还有一种严重的道德上的损害。正如佛洛伊德指出的，所有与孩子有交往的人都会发现，关于鸛鸟和醋栗的神话是没有人相信的。

于是，孩子们就会得出一种结论，就是父母在骗他们。既然父母会在一件事上说谎，他们也会在另一件事上说谎，结果他们在道德和知识上的威信荡然无存。

父母在涉及性的问题上说谎，孩子们自己也可以在这类问题上说谎。他们就会养成欺骗和隐瞒的习惯，由于父母的恐吓，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疑惧。心理分析表明，父母和保姆如指出手淫的恶劣后果，往往导致精神错乱，不但在儿童时代，在成年时代也是一样。

在性问题上所采取的传统作法，不仅会使人们变得愚蠢、虚伪和胆怯，还会使相当多的人患精神病。

现在，所有与青年人有交往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这些事实。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却不知道这些事实。每一个有充分的性知识而又必须与孩子来往的人，都要做出抉择：要么违反法律，要么使那些他负有责任的孩子，遭受道德上和知识上无可挽回的损失。

改革法律是很困难的，非常多的人都已走上歧途，他们对于性的兴趣，只是

根据这样一种信念，即性是邪恶、肮脏的。在那些老人和中年人死去之前，改革的希望不大。

道德家的目的，是要防止我们被性问题所纠缠。这种纠缠目前是很普遍的。一位校长指出，学生之间的谈话，不是沉闷的就是淫秽的。如果我们把性神秘化，就会增加青年人的自然好奇心。如果成年人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回答孩子们提出的一切问题，给他们所要求的或所能够理解的知识，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产生淫秽的观念。

性的好奇心与其他各种好奇心一样，一旦得到满足，很快就会消失。防止青年人被性问题所纠缠的最好方法，就是尽量告诉他们关于性的一切事情。

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孩子中的下流行为，正是成年人假正经的结果。现在的孩子，对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问题，表现出自然而健康的兴趣，他们对发动机和铁路却没有这样浓厚的兴趣。无论大人是否在场，他们对这类问题从未表现出探求的趋向。

我发现有一所学校的孩子，他们的年龄从二岁到三岁，甚至是四岁，情况和我的孩子是完全一样的。然而，那些六岁或七岁的孩子却已经受到了教育，他们认为任何与性器官有关的事情都是不好的。

在这所学校里，这类事情，可以和其他事情一样谈论。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有了轻松的感觉，但仍认为这类话题是不正当的。一旦他们发现那些成年人并没有阻止他们的这类谈话，他们也就慢慢变得没有杂念了。

现在，当新入校的孩子，想和他们谈论那些所谓不正当的事时，他们总是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如果我们让新鲜的空气吹拂这个问题，这问题就会得到消毒，它在黑暗中所滋生的有毒的微生物就会消失。

性问题自然要和排泄过程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把这排泄过程看作是厌恶的事，自然会在心理上，把它与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与孩子相处时，我们不应当对排泄一事过分挑剔。为了卫生起见，预防措施是必要的，但只要孩子能够理解，我们就应当向他们解释，这些预防措施只是为了卫生，而不是因为其功能不好。

男人的责任对性生活的态度

对于性知识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呢。

我们应当把性知识传授给青年人，我希望这能得到教育者的赞同。

我现在还要谈的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恐怕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就是所谓的淫秽作品的问题。

英美两国的法律规定，凡被认为是淫秽作品，在某些情况下，应由当局查禁，其作者和出版商应当受罚。

在英国，这法律就是所谓《一八五七年坎贝尔爵士决议》。决议宣称：“如果有人检举，证据确凿，在任何住宅或其他地方存有任何淫秽书刊，其目的在于销售，如果能够证明这地方的书刊已经销售了一册以上，如果确切了解到，这些书刊的性质和描写，它们的出版会产生不良影响就应当予以起诉。在得到特别许可之后，应当将这些书刊扣留。在传讯这所住宅的居住者之后，如果证明那些被扣留的书刊确实具有上述性质，而且保存的目的也如前所述，就可以命令将这些书刊销毁。”

这个决议中所提及的“淫秽”一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如果那地方官认为某出版物是淫秽的，那么这出版物就法定是淫秽的，也不需去听专家们的任何证词。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下，那些被视为淫秽的出版物还是有某些用处的。这就

是说，任何一个撰写小说、社会学论文或改革法律议案的人，如果他的作品与性问题有关，只要被某些无知的老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这作品就将难逃劫运。

在欧洲各国，学生们可以获得大量关于同性恋的知识，那里的法律比较开明，但在英国，这种知识却不允许传播，无论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或幻想小说的方式都行不通。

在英国，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是非法的，但想提出任何论据，去改变这种法律却非常困难，因为任何论据都会被指控为非法。

研究这个问题的人知道，这种法律是迷信的产物，我们不能提出毫无理性的论据，去拥护这种法律。对于伦乱，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态度。几年前，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这法律使伦乱成为犯罪行为，但根据《坎贝尔爵士决议》，我们是不能讨论这一问题的，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除非那些论点毫无用处。

《坎贝尔爵士决议》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许多不能用一般语言提及的问题，可以用那类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理解的冗长的专有名词去研究。在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在印刷品上提及“性交”问题是允许的，但不能使用简单明了的同义词去表达。这是在审理《徒劳的差使》一案时定下来的。有时，这种禁止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禁令，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向有钱的人宣传节制生育是可以的，向雇佣劳动者及其妻子宣传节制生育则是犯法的。

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引起优生学会的注意，这个学会，总是因为雇佣劳动者的生育速度比中层阶级更为迅速，而感叹不已，但却丝毫不期望改变造成这一事实的法律。

有人认为，这种反对所谓淫秽出版物的法律，会造成令人遗憾的后果，但还是有必要。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有什么法律，一方面，任何法律都做不到禁止恶的同时不禁止善。一方面，如果性教育方式得当，即使是货真价实的淫

秽出版物，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如果我们知道英国《坎贝尔爵士决议》的历史，那么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了解一下有关《坎贝尔爵士决议》的争论，就会发现，这个决议仅仅是要查禁色情文学，而不会去反对其他形式的文学。

有关审查的问题，在莫里斯·厄恩斯特和威廉·西格尔合着的一本书中得到很好的讨论，他们讨论了英国和美国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在英国，对于戏剧的审查，那些旨在挑逗情欲的轻薄的戏剧很容易通过，因为审查员不愿意被人视为假正经，那些涉及重大问题的庄重的戏剧，如《沃伦夫人的职业》，却历时数年才得以通过。像《圣希》那样富有诗意的优秀戏剧，虽然剧中没有一句挑逗情欲的台词，却用了一百年时间，才征服张伯伦勋爵那伟大胸怀中的厌恶之心。

还有一个反对审查的理由，那就是坦率的色情文学。因为它是开诚布公而没有含羞意味的，所以比起因隐讳神秘而变得有趣的色情文学，危害要小。几乎每一个有钱人在青少年时期都违背法律看过淫秽照片，并为拥有这些照片而自豪。那些具有传统观念的人认为，这类东西对于他人很有害，却不承认这类东西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有害的。

应该承认，这类东西会激起短暂的性欲。对任何个性功能健全的男性，这种感觉无论如何总是要产生的。一个男人经历性欲的次数，取决于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引起这种感觉的机会，则取决于他处的社会风俗。

古代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常对女人的踝骨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但对现代的男子来说，女人大腿以下的任何部位都不会使他们动情，这不过是服装的式样问题而已。

如果裸体成为一种风俗的话，那么裸体就不会激起我们的性欲，因此，女人不得不借助服装以使自己在性的方面有吸引力，就像某些不开化民族那样。

维多利亚时代有刺激性的东西，对开放时代的人来讲，已毫无感觉了。正人君子们越是限制正当范围之内的性欲，这种性欲就越容易产生。

色情文学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道德家们反复向青年人，灌输那种对于性的猥亵感，无论国家法律作何规定，这一点都是不可避免的。

对裸体的忌讳，阻碍了我们对性问题持有的纯洁态度。

在自然的情况下，孩子们看到彼此以及他们父母的裸体是有益的。大约在三岁左右，孩子们对他父母之间的区别会感兴趣，会把他自己和姊妹之间做比较。此后，他对裸体就像对衣服一样不感兴趣了。如果做父母的不愿意让孩子看到他们的裸体，孩子一定会产生一种神秘感，一旦有了这种感觉，他们便会成为好色之徒。

就健康而言，也有许多人，赞成在适当的环境中裸体的理由，例如，阳光明媚时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使皮肤健康。

当我们看见孩子不穿衣服在户外玩耍时，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不但更加懂事，而且与他们穿衣服相比，行动更加自由，姿态更加优雅。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风俗允许，裸体很快就不再引起我们的性欲，我们的举止也会更加文明，人们的身体，由于直接与空气和阳光接触而变得更加健康。

关于美的标准，也会更加依据健康的程度。

大家知道标准的美，不仅仅在面部，也包括身体和身体的姿态。所以，我认为希腊人的习俗是应该提倡的。

男人的责任精神上的自由

长期的不自由，在思想的交流中猜疑的强制，思想家使自己担负的培育工作，都意味着在教会的和宫廷的准则内或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上思考；长期的精神的意志对一切发生的東西按照基督教的一个模式加以解释，并且还在任何偶然事件中重新发现和辩护基督教的上帝，所有这些粗暴的东西、专断的东西、严酷的东西、令人战栗的东西、反理性的东西，反悔本身作为手段使出来，通过这手段，就为欧洲的精神培植出它的强大、它的肆无忌惮的好奇心和细微的运动过程；还要承认的是，在此同时，也无可弥补地在力量和精神方面必定多有扼杀、窒息和败坏。

几千年之久欧洲的思想家们只为了证明某种东西而思考，而今天则相反，“想证明某种东西”的任何思想家对我们来说是可疑的，至于在他们看来，那种作为他们的最严格的思考的结果应该产生出来的东西，例如像从前在亚洲的占星学或像今天还在基督教的无害的道德上解释个人的最接近的事件“为了尊敬上帝”和“为了拯救灵魂”，总是已经确定了：这种专制，这种严格的和伟大的愚蠢，已教育出精神。

在较粗的和较细的理解中，奴隶状况是精神的培育和培养不可缺少的手段。

人们可以对任何道德这样去看：其中的“本性”教导要仇恨自由放任，仇恨太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制的视野的需要，对最接近任务的需要，它教导要使观点变狭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导要愚蠢，作为生活和成长的一个条件。“你应该长久地服从某一个人，否则你就灭亡，并且丧失对你本人的最后的尊敬”这在我看来是道德本性的命令，此命令肯定既非“绝对的”，像老年的康德向它所要求的，也不是向着个别的人。

勤劳的种族把忍受懒惰看作巨大的痛苦，英国本能的杰作在于星期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神圣化的活动和感到厌倦，以至于英国人又不知不觉地渴望他的工作日，作为一种聪明地发明的、聪明地插入的斋戒，像类似在古代世界中可以充分觉察到那样。必定有多种

的斋戒；而且凡强大的欲望和习惯风行之处，立法者必须关心于插进闰日，在闰日中这种欲望受到束缚，并且又一次学习节食。

从一个更高的位置出发来看，全部的世代和时代在附带着某一种道德的狂热性而出现时表现为这样的插进去的强制和斋戒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个欲望学习屈服并且跪倒，但也通过学习使自身得到纯洁和增强。一些个别的哲学派虽允许如此解释。

在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它并不真正属于柏拉图，而且只出现在他的哲学中，人们大概可以说，尽管有柏拉图，即苏格拉底主义，对后者来说，他实际上是太高贵了。“没有人愿意给自己造成损害，因此一切坏的东西是非自愿地发生的。因为坏的人给自己带来损害，如果他知道坏的东西是坏的，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坏人仅出于一个错误是坏的；

如果人们把他从错误中解脱出来，人们必然把他变成——好的”。

用这种方式得出结论，有乱伦的味道，乱伦在坏的行动中只看到讨论的后果，并且在实际上判断说“采取坏的行动，这是愚蠢的”。

人们可以在道德的任何功利主义那里猜到这个相同的起源，并且追踪鼻祖，人们将很少走迷途。

柏拉图已经做了一切，为了把某种精细的东西和高贵的东西在解释时加入到他老师的命

题中，首先得把他自身也加入进去他，一切解释者中的最大胆的解释者，把整个苏格拉

底只当作一个通俗的题目和一首民歌从胡同中搬出来，以便把他改变成无限的东西和不可能东西，即改变成他自己的一切假面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关“信仰”和“知识”或者更清楚地说，有关本能和理性的旧的神学问题，这样的问题，就事物的价值评价而论，本能是否比理性应得到更多的权威，这还是那个旧的道德问题，就像它首先在苏格拉底的人物中出现，并且在基督教之前已经分裂了精神。

苏格拉底本人虽然以他的才能趣味，一位优秀的辩证法家的趣味——首先置身于理性的方面；而在实际上，除了嘲笑他的高贵的雅典人的笨拙的无能，苏格拉底在他的长期生活中做了什么？但在最后，他也偷偷地和秘密地嘲笑自己：他在自身那里，在他的更精细的良心和自我质问面前，找到了相同的困难和无能。

他为何劝说自己从本能中摆脱出来！人们必须帮助本能，也帮助理性，人们必须遵循本能，但是必须劝说理性用好的理由去促进本能。

这是那位伟大的神秘的讽刺家的实际上的谬误，他把他的良心带到这样的地步，即他满足于一种自我蒙骗：他在根本上看透了在道德判断中的非理性的东西。柏拉图，在这类事物中更无辜的并且没有市民的机灵狡猾，花费了一切力量，花费了至今一位哲学家能够使用的最大的力量——想对自己证明，理性和本能自动地走向一个目标，走向善，走向“神”；并且自柏拉图以来，一切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在相同的道路上，这就是说，在道德的事物中，本能，或像基督教徒所称呼的“信仰”，或像我所称呼的“群居”，迄今获得了胜利。

人们本该把笛卡尔排除在外，这位理想主义之父，他承认只有理性才有权威；但理性只是一个工具，笛卡尔是肤浅的。

谁研究一门个别科学的历史，谁就在它的发展中找到理解一切“知识和认识”的最古老的和最相同的过程的一条线索；在那里进而和在这里一样，过于匆忙的

假设，追求“信仰”的那个良好而愚蠢的意志，在猜疑和耐心方面的缺乏，首先得到发展——我们感官很晚才学会，而且决不完全地学会充当认识的、精细的、忠实的、谨慎的器官。

在我们的眼睛看来，根据一个给出的诱因把一个已经常常生产出来的景象重新生产出来，比在自身坚持一个偏离的和新的印象更舒服一些：后一种做法需要许多的力量，更多的“道德”。听某种新东西，这对耳朵来说是痛苦和困难的；我们听陌生的音乐时很糟糕。在听另一种语言时，我们不自觉地试图把所听到的声音放到词中去，它使我们听起来是更熟悉的和更亲切的——新的东西也认为我们的感官是敌对的憎恶的。

一般而言，在感性的“最简单的”过程那里，已经盛行着情绪，如畏惧、爱情、仇恨，包括消极的懒惰情绪。在最奇异的经历中，我们还去注视某一个过程。这一切说明：我们从根本上从来习惯于说谎。或者，为了更有德行地和更伪善地，总之，更令人愉快地表达——比人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艺术家。在一次生动的谈话中，我常常看到与我交谈的人的脸，按照他所表达的意思，或按照我相信在他那里所唤起的思想，我对他的脸看得如此清楚和精细，以至于这种清楚的程度远远地超出了我的视力的力量。肌肉活动和眼睛表情的精细状况必定由我补充想象。

白天发生的许多事情在黑夜中出现，但也可能颠倒过来。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东西，预先设定了我们常常经历它，最终属于我们的灵魂的全部的家内事务，就像某种“现实地”所经历的东西一样。借助于后者，我们更富有或更贫穷，更多或更少地有一个需要，并且最后在明亮的白天，甚至在我们清醒的精神最快活的时刻有一点受我们梦的习惯的监督。

假定一个人在他的梦中常常飞起来，最终一旦他做梦，意识到飞行作为他的特权，也作为他的最本能的值得羡慕的幸运的力量和艺术；一个这样的人，他相信借助于最轻微的推动能够实现任何的曲线和角度，他知道神的某一种草率感

觉，一个“向上”而无须努力和强迫，一个“向下”而无须下降和贬低没有困难，具有这样梦的经验和梦的习惯的人最终在他清醒的白天怎能会不认为“幸运”这个词染上了不同色彩和不同的规定，他怎能会不用其他的方式渴望幸运？“扶摇直上”，像诗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与他自己的“飞行”相比较，对他来说，必定已经是太现世的、肌肉的、暴力的，已经是太“困难的”。

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财产表的差别中，还显示在对价值的多与少，对共同承认的财产的等级秩序彼此有不一致的意见——那个差别还更多地显示在他们视为现实的拥有和占有一个财物的那种东西中。例如，就一个女人而论，一个较有节制的人已经把对她的肉体的支配和性的享受看作拥有和占有的充分和满足的标志。

另一个以他对占有的猜疑的和苛求的渴望，看到了“疑问”，看到了这种拥有仅是表面的东西，并想更细致地检验，首先为了知道，是否这个女人不仅委身于他，而且也为了他而放弃她拥有的东西或喜欢拥有的东西——：只有这样，他把她看作“已被占有的”。第三个人在这里也还没有达到他的猜疑和拥有欲的界限，他问自己，当这女人为他放弃了一切，是否也许为了他的错觉而不这样做；他首先想彻底地、甚至深深地很好地被了解，以便完全能够被爱，他敢于让自己可以被猜中。

当被爱者不再欺骗自己，当她为了他的恶劣行为和隐蔽的贪得无厌的缘故如此程度地爱他，像为了他的善、耐心、精神性的缘故一样，他感觉到被爱者完全在他的占有中。一个人想占有一个民族，而且一切较高级的卡格里斯特罗和卡蒂里那的艺术对他来说适合于这个目的。另一个人带着一种更细微的占有欲望而对自己说“在人们想占有之处，人们不可以欺骗”，在他如下的观念那里是激怒的和失去忍耐的，即他的一个假面具控制了民族的心：“因此，我必须使自己被认识，并且首先认识我自己！”在乐于助人的和行善的人们中间，人们几乎有规律地发现那种笨拙的诡计，它首先恰当地使自己成为应该被帮助的人。

例如，似乎他“值得”帮助，渴望他们的帮助，并将忠诚地屈从地证明深深感谢他们的一切帮助，以这些想象，他们像支配财产一样地支配了贫困的人，当他们出于对财产的渴望而乐于助人的人的时候。当人们在帮助中遇到他们，或抢先他们一步时，人们发现他们是嫉妒的。父母不自觉地孩子中造出某种与父母相类似的东西，他们称为“教育”，没有一个母亲在她的内心深处怀疑孩子那里为自己生下了一个财产，没有一个父亲否定自己有权利可以使孩子服从他的观念和价值评价。确实，在从前，随意支配新生孩子的生和死，这在父亲们看来是正当的。像父亲一样，教师、有地位的人、牧师、诸侯，现在也还在任何新的人中看到了新的占有的一个无须考虑的机会。

犹太人，一个“为奴隶制而生的”民族，像塔希陀和整个古代世界所说的，“在一些民族中选出的民族”，像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和相信的——犹太人曾实现了价值颠倒的奇迹，由于这奇迹，在大地上生活，在几千年内得到了一种新的和危险的魅力：他们的先知们把“富有的”“无神的”“恶的”“暴力的”“感性的”融化成一个东西，并第一次把“世界”这个词改铸成卑鄙之言。在这种价值颠倒中有犹太民族的含义：在道德中的奴隶起义随犹太民族而开始。

在太阳旁边有无数暗的物体有待于推断，这类东西我们绝不会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比喻，而一位道德心理学家将全部的星体论着只当作一种比喻和符号的语言加以阅读，许多东西可以被隐瞒起来。

人们彻底地误解猛兽和掠夺性的人，人们误解“本性”，只要人们还寻找在根本上这些最健康的一切热带的巨大怪兽和植物的“病态”，或甚至寻找它们天生的“地狱”，至今一切道德家们那里的一种对原始森林和热带的仇恨？而且看来“热带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必定被破坏威信，不管是作为人的疾病和堕落，还是作为自己的地狱和自我折磨，究竟为什么？

所有这些诉诸个别的人的道德，并为了他们的“幸运”正像所说的除了与个别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危险性的程度相比是举止行为的建议外，这些道德还会是别

的什么东西；针对个别人的热情，针对他们的好的和糟糕的嗜好的药方，这些药方如此遥远地有权力意志，并如此遥远地想扮演主宰，大大小小的聪明之举和矫揉造作，附带着陈旧的家庭常备药品和老太婆的智慧发霉的气味，它们都处于奇异怪诞和非合理的形式中，因为它们诉诸“一切人”，因为它们不可普遍化的地方去进行普遍化的，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话，无条件地对待自己，它们都不仅仅用一粒盐调味，而是仅可忍受的，而且有时甚至诱惑人的，当它们被过分调味并且学会了危险地发出了气味，特别是“有另一个世界”的味道。

从智力上来衡量，这一切极少有价值，并且还远非科学，更不用说智慧了。

在只要有人的一切时代中，也就有人群，并且与少量的命令者相比，总有很多的服从者，考虑到服从至今最好地和最长久地在人们中被实施和培育，人们可以正当地作出前提，平均地看，有关的需要在现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天生的，作为一种形式的良心，对良心命令说：“你应该无条件地做某个东西，无条件地放弃某处东西。”一句话，“你应该。”这一需要试图满足自己，并且用一个内容去充实它的形式，按照它的强大、无耐心和紧张关系，它作为一个粗糙的胃口，它伸手时很少讲究，并且接受了仅由一切种类的命令者——父母、教师、法律、等级的偏见、公众舆论——呼唤到它的耳朵中去的東西。

人的发展的奇异的限制性，踌躇犹豫的东西，长期慢性的东西，常常来回奔跑的东西和其自身旋转的东西，立足于这样的事实：群体的服从本能最好地并花费了命令的艺术被遗传下来。

如果人们想象这个本能一旦走到最后的放荡的地步，那么，最终简直缺乏下命令者和独立者；或者他们内心苦于坏的良心，并需要首先把一个欺骗给予自身，以便能够下命令，即似乎连他们也仅是服从。

这种状况今天实际上存在于欧洲，我称之为命令者的道德上的虚伪。他们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在他们坏良心面前保护自己，除了他们表现为较古老的或较高级

的命令的執行者，或者從群體思維方式著手給自己借到群體準則，例如作為“民族的第一服務員”或作為“公共福利的工具”。

在另一方面，群居的人今天在歐洲裝出一副模樣，似乎他是惟一被允許的一種人，並頌揚他的各種特性，如團結友愛的精神，友好，關心照顧，努力，適度，虛心，寬容，同情，由於這些特性，他是溫順的、和睦的和對群體有用的，作為真正的德行。

對於有些情況，如人們相信領袖和領頭羊不能缺少時，人們在今天嘗試又嘗試：把聰明的人群加起來以取代下命令者。

例如，一切代議制的憲法有這個起源。儘管這一切，善行，從一種無法忍受的壓迫下解救出來，這些為這邦群居動物歐洲人而出現了一個無條件地下命令者，對這事實，拿破侖的出現所造成的影響給予了偉大的證明——拿破侖影響的歷史几乎是較高的幸運的歷史，本世紀在它最有價值的人和時刻中曾達到這較高的幸運。

一個瓦解的時代把各種族亂糟糟地拋出來，這個時代的人，他本身繼承了多種多樣的來源，這就是說，對立的和常常不僅對立的欲望和價值尺度，這些東西彼此相鬥，很少得到安寧，——具有較晚的文化和破裂的光線的這樣一個較弱的人，他最根本的渴望在於：在他之中的戰爭該結束了，對他來說出現了幸運，在與鎮靜的藥品和思維方式的一致性中，首先是休息、不受干擾、飽餐、最終統一性等方面的幸運，作為“安息日的安息日”，以使用神聖的修辭學家奧古斯丁的措辭，他本來是這樣一個人。

如果在這樣一種本性中的對立和戰爭像一種附加的生活的魅力和生活的嚮往那樣發揮作用，而且如果另一方面在實施與他們自身的戰爭中實際的技能和精明，因而自我克制和自我蒙騙也附加地繼承和培植到他們強大的和不可調和本能中。就產生了那種驚人的不可把握的東西和無法說明的東西，產生了為了勝利

和为了引诱而事先被规定的谜一样的人，后者的最美好的表现是亚尔西巴德和恺撒。

在艺术家中，也放进列奥那多·达·芬奇。他们恰好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较弱的类型以它对安宁的渴望处在显要的位置上。两种类型彼此从属，并且起源于相同的原因。只要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流行的有用性只是群体的有用性，只要目光只转向维护团体，并且非道德的东西与惟一看来对团体的持久存在构成危险的东西中被寻找。那么，还不可能有对最接近的人爱的道德。

男人的责任善与恶的关系

一个同情的行为在最好的罗马时代既不叫做善，也不叫作恶，既不叫做道德，也不叫做非道德，如果这同情的行为本身被称赞，那么，一旦它与某一个服务于促进整体、服务于国家的行为相比较，最多以一种不乐意的轻视与这称赞相符。“对最接近的人的爱”最终总是某种次要的东西，与畏惧最接近的人相比，一部分是习惯的东西和任意表面的东西。

社会内部结构在总体上表现为确立，并在外部危险面前得到安全后，对最接近的人的这种畏惧重新创造出道德的价值评价的新角度。某些强大和危险的欲望，诸如事业心、蛮勇、复仇欲、狡猾、掠夺欲、统治欲，它们至今在一种公益的意义上不仅仅受尊敬，而且必须被大大地教育和培养，它们现在在危险中被感觉到双倍地强大。

现在，缺乏排除它们的渠道——逐步地作为非道德的东西而受到谴责和诽谤。对立的欲望和嗜好达到了道德上的尊敬；群体的本能逐步地得出结论。如何多或如何少的对团体的危险的东西，对平等的危险的东西，在一种意见中，在一种状况和情绪中，在一种意志中，在一种才能中，这是道德的视角，在这里，畏惧又是道德的母亲。在最高的和最强的欲望那里，当它们激烈爆发地使个人远远超出和高于群体的良心。一般水平和道德败坏，团体的自我感觉就毁灭了，团体对自身的信仰，它的脊椎仿佛破碎了。

人们会竭力谴责和诽谤这些欲望。高级的独立的精神性，追求孤独的意志，伟大的理性，已经被感觉为危险；一切把个人抬高到超出群体并使最接近的人畏惧的东西，从现在起叫做恶的、忍受的、谦虚的、自身适应的、等同性的思想，中等的欲望得到了道德的名称和尊敬。在和睦相处的状况中，越来越多地缺乏如下的机会和强迫性：把它的感情教育成严格和严厉；而且现在任何的严格，甚至在公正中，开始扰乱良心，高极的和严厉的高贵性和自身责任心几乎在受伤害，并引起猜疑，“羊羔”，还有更多“绵羊”增加了尊敬。在社会的历史中有病态的柔和和柔弱的处所，在这里社会本身袒护它的损害者，袒护罪犯，而且很严肃地和诚实地这样做。处罚，这在社会看来似乎总有点不

合理——确实，“处罚”和“应该处罚”的观念使社会痛苦和畏惧。“使罪犯成为无害的，

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处罚？处罚本身是使人害怕的！”

从这个问题，群体的道德，畏惧之道德，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如果人们完全能够废除危险，废除害怕的理由。

人们也就同时废除了这种道德，它不再是必要的！谁来检验今天欧洲人的良心，谁将从道德的折叠和隐匿中可以引出相同的命令，群体畏惧的命令：“我们希望在某个时候不再有任何害怕的东西！”在某个时候——朝这方向的意志和道德，今天在欧洲叫做“进步”。

让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已经一百次地说过的东西，因为耳朵对于这样的真理，对于我们的真理，今天并不乐意听。

我们已经知道，当一个人竟然如实地和不带比喻地把人们当作动物时，这听起来像侮辱人似的。我们恰恰在涉及“现代观念”的人们时持久地使用“群体”、

“群体本能”和诸如此类的表达，这将几乎作为罪责归于我们。

这有什么帮助！我们不能做别的，因为在这里有我们新的洞察力。我们会发现，在一切道德的主要判断中，欧洲已成为一致的，还包括欧洲的影响在流行的一些国家：人们在欧洲明显地知道，苏格拉底不认为知道什么，那条古老的著名的蛇从前许诺教导什么，人们今天“知道”什么是善和恶。当我们总是重新坚持：那种相信在这里知道的东西，那种在这里用称赞和谴责而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东西，那种自称为善的东西，都是群体动物人的本能时，这听起来必定是严厉的并且很刺耳。按照日益发展的生理学对这种本能的接近和相似——本能是这接近和相似的征象，群体动物人的这种本能曾达到并且越来越多地来到前沿，达到优势，达到对其他的本能的统治地位。道德今天在欧洲是群体动物的道德。

像我们对事物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人的道德的一种，在它旁边，在它前面，在它后面，许多其他的德，首先较高的一些道德是可能的，或应该是可能的。但是，这道德用一切力量抵抗这“可能性”，抵抗这一“应该”，它顽固和无情地说：“我是道德本身，此外没有什么东西是道德！”

借助于一种对最崇高的群体的动物的欲望进行迎合和奉承的宗教，情况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甚至在政治的和社会的机构中寻找这种道德的一个日益可见的表达：民主的运动留下了基督教运动的遗产。

至于其速度对较无耐心的人，对有病的人，对嗜好群体本能的人来说，还太缓慢和迟钝，对此予以说明的是单日发狂的嚎叫，日益不加掩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狗露齿发怒，后者现在漫步穿过欧洲文化的胡同，表面上与安宁勤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的思想家对立，还更多地与笨拙的斗瓶醋哲学家和兄弟情谊之狂热者对立。

实际上与他们所有的人在彻底地和本能地敌视与自主的群体的社会形式不同的任何的社会形式方面是同流合污的，在顽强地反抗任何特殊的要求、任何特

殊的权利和特权方面是同流合污的；在对处罚性的司法的猜疑方面同流合污；在同情宗教方面，在怜悯被感受到的、在生活中受苦的人方面也同流合污；在同情的叫喊和不耐烦方面，在恨死全部的受苦方面，在几乎女人般地不能留住听众、去掉受苦方面，他们都同流合污；在非自愿的阴沉情绪和温柔多情方面同流合污。

在对共同的同情的道德的信仰方面同流合污，似乎这种道德是自在的道德，人所达到的高度，未来的惟一的希望，当代人的安慰剂，对从前的一切过错的重大摆脱；在对作为救世主的团体信仰方面，在对群体的信仰方面，在对“自己”的信仰方面，他们都同流合污。我们有另一种信仰。

在我们看来，民主的运动不仅是政治机构的一种衰败形式，而且是人的衰败，即被贬低的形式，是他平庸化和价值的贬低；我们凭希望必须向何处伸手？在新的哲学家们看来，总是没有选择；从精神看来，要有足够的强大和本源，以便推动对立的价值评价，并且对“永恒的价值”加以重新评价和颠倒；按照预先派遣的东西，在未来的人看来，他们在目前应该把强制和绳结联接起来，后者强迫几千年的意志走上新的道路。向上教导作为人的意志人未来，作为依赖于一种人的意志，并且准备重大的冒险，准备在培育和培养方面作全部的尝试，以便使荒谬和偶然之令人战栗的统治得以结束。“最大数量”的荒谬只是它的最后形式，为此目的，一种新的哲学家和下命令者在某一个时候将是必要的，在他们的形象里，一切在人世间隐蔽的、可怕的、友好的精神那里曾在此存在的东西都显得苍白无力和侏儒化。

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在我们的眼前飘浮：我是否可以大声地说出它，你们自由的精神？有些情况，人们为了它们的产生必须创造、必须利用的那些情况；假定的道路和检验，借此使一个灵魂生长到这样一个高度和强度，以便感觉到强制趋向于这些任务；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在它新的压力和锤子下，一个良心被锻造，一颗心被变成铜铁合金，使它承受这样一种责任心的分量；另一方面，这些领袖人物的必要性，令人惊恐的危险，他们缺席或可能变坏和蜕化堕落——这是我们真正的忧虑和沉重的心情，你知道吗，你们自由的精神？这是任重道远的思

想和雷雨，后者经历我们生活的上空。很少有像必须看到的、猜到过的或共同感觉到的这样剧痛：一个特殊的人如何迷路并且蜕变堕落；但是，谁对全部的危险有罕见的眼睛，这危险就是人本身在堕落，谁像我们一样认识到难以置信的偶然性——谁猜到厄运在白痴的天真烂漫和“现代观念”的轻信中，还更多地隐藏在全部基督教—欧洲的道德中。谁就受苦于一种无法比拟的害怕，他甚至用一种目光把握住一切靠有益地聚集和提高力量和任务从人中可以培养的东西，他凭良心的所有知识知道，人对最大的可能性来说还未被充分利用，而且人类已经经常地站在神秘的决断和新的道德旁边；他还更好地知道，根据他最痛苦的回忆，具有最高档次的很有前途的人迄今通常为一些可鄙的事物而粉身碎骨，沉陷沦落，成为可鄙的。人全部的蜕化堕落，沦落直至成为今天在社会中的笨人和浅薄者看来作为他们的“未来的人”的东西。

作为他们的理想，这种蜕化堕落和贬低为完全的群体动物，人动物化可具有相同的权利和要求的侏儒般的动物，这种动物化是可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男人的责任试婚的意义

按照理性的道德，没有孩子的婚姻是不能成立的。没有生育的婚姻容易破裂，只有通过孩子，性关系才能对社会产生重要意义，从而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在圣保罗的影响下，教会认为婚姻不是生育的手段，而是私通的一种方式。近年来，甚至连牧师们都意识到，无论男女都不会等到结婚才体验性交。

谈到男人，如果他们因嫖妓而有失检点，只要不为人所知，那他们是比较容易得到谅解的，对于那些不以卖淫为职业的女人，那些传统的道德家却很难原谅她们所谓的不道德。

自欧洲战争之后，这种情况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良家妇女不再认为保持她们的“贞操”会有什么价值，青年男子也不再寻找娼妓以求发泄，他们可以和他们想要娶的姑娘发生性关系。

这种现象在美国比英国更加普遍。我认为这是由于禁酒和汽车普及的缘故。由于禁酒，在所有欢乐的聚会上，每个人都会喝得微醉或酩酊大醉，这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礼仪。因绝大多数姑娘都拥有自己的汽车，她很容易避开父母和邻居的耳目，与情人私奔，这种事情的后果，在林赛法官的书中有过描述。年长者指责他言过其实，年轻人却不然。我曾询问青年人如何看待他的观点。我发现，他们都不否认事实。

在美国，绝大多数已婚并很有社会地位的妇女，婚前似乎都有过性经验，也不止有一个情人。即使没有完全的关系，也会有“爱抚”和“接吻”的行为。没有绝对的性交，只能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

我不敢说目前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

因为它具有传统道德家们反对的许多的特点。在传统道德没有改变之前，我认为这些不应有的特点不会被消除。非法的性行为与非法的酗酒行为同样卑鄙。我认为，任何人都会否认，在美国，与禁酒法律公布前相比，在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当中，酗酒行为增加了。在欺骗法律的时候，人们总是具有某种兴趣，并以手段巧妙而自鸣得意。

人们既然在饮酒方面可以欺骗法律，那他们在性方面也可以欺骗传统风尚。人们还认为，这种大胆的行为是可以激发性欲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就采取了一种极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往往是喝醉的时候。像酗酒一样，性所采取的方式，通常是短促而无味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避开当局的临视。

我认为，那种高尚的、合理的、诚挚的婚外性关系，在美国是罕见的。就这一点来说，那些道德家是胜利的。他们无法阻止通奸行为，相反，他们使通奸成为一件趣事，并变得更为普遍。他们的胜利在于，他们使私通成为像他们所说的

一种不可有的行为，就像他们使酒成为他们所说的毒药一样。他们强迫青年，把性看成是一件和日常交往，和心理上的亲密毫无关系的事情。

那些胆小的青年，虽然没有达到纯粹性关系的地步，他们却产生了一种因在性的方面得不到满足，而有长久的刺激，这种刺激会导致神经衰弱，并使以后在性方面的充分享受成为困难。

美国青年中所盛行的那种性刺激，又产生了另一种弊病，那就是工作的失败和睡眠的不足，那种情形必然要耗费大量时间。

如果青年人的行为传到某些道德卫士的耳朵里，这些青年人就会丧失他们的良知，从此沉溺于淫乱而卑鄙的秘密行动之中。因为，美国青年不能充分了解避孕的方法，意外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通常是人工流产。人工流产是危险而痛苦的，极难保守秘密。

在当今美国，还有一种不幸的结果，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缺少真正的亲密或友情，父母不能以劝告和同情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当年轻人遇到困难时，他们不能把困难告诉父母，因为这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之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便不再发生任何有益的作用。

相比之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民们要显得有教养得多，在那里，做父亲的会对他女儿的情人说：“你与我的孩子睡觉，这很好，请娶她吧！”

我们所讨论的都是美国社会的弊端，但美国青年与他们的前人相比，还是有着更多的解放机会。他们可以摆脱那种没有理论根据的权威的束缚。我认为，这些青年人并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残暴，那样粗鲁，以暴力行为消灭那些无政府状态的冲动，是美国生活的特点，这类冲动，无法在性中找到出路。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基本相同，因为没有禁酒法律和汽车数量不足，未能达到

美国的程度。我认为，在英国，尤其是在欧洲大陆，那种因得不到最大满足，而实行性刺激的现象比美国要少一些。在英国，总的说来，有身分的人，还不及美国有身分的人那样，充满着迫害性的热情，虽然也有某些例外。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试婚是一个明智的保守主义者的建议，其目的在于巩固青年的性关系，根除乱交现象。他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阻碍青年婚姻的原因是财力不足，婚姻中所以需要金钱，一部分原因在于孩子，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妻子不能自食其力。

他认为，青年应当采取一种新的婚姻形式，这种形式从三个方面区别于普通婚姻。

一是他们暂时不希望有孩子，这样青年夫妇就应当获得最先进的避孕知识。

二是只要没有孩子，而且妻子尚未怀孕，那么经过双方认可，就可以离婚。

三是离婚时，妻子无权要求赡养费。

如果这一制度得到法律的承认，绝大多数青年，例如大学生，就会进入一种比较持久的伴侣关系，这种关系将包括共同的生活，避免了性关系中具有类似酒神节的那种特点。他还说，那些已婚的青年学生，要比未婚的青年学生工作得更为出色。

显而易见，工作和性在较为持久的关系中，比在充满混乱和刺激的暧昧关系，及纵酒行乐中，更容易结合在一起。那种所谓两个年轻人，共同生活要比单独生活花费多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所以，那些导致晚婚的经济理由，也就不能成立了。

有人说，他夸大了婚外性关系的普遍性，他在污蔑纯洁的美国女人，因为大

多数人到三十或三十五岁都是乐于节欲的。我相信，试婚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我认为，所有成年人的性关系都应视为私人的事情。如果男女同居而没有孩子，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无论男女，如果他们从未有过性经历，就想进入以孩子为目的的庄重婚姻，我是不敢赞同的。

有证据表明，第一次性行为应当和有性知识的人发生。人类的性行为不是本能的。离开这个观点，如果要求人们在不知道他们在性的方面是否和谐的情况下就结婚，那是荒唐的。这就像一个人要卖一幢房子，但却不让在成交之前看到房子一样荒唐。

如果婚姻的生物功能可以得到充分承认，最好的程序应当是在妻子第一次怀孕之前，婚姻没有法律上的约束。

目前的观念是如果性交不能实现，婚姻则无价值，但婚姻的真正目的，在于孩子而不在于性交。在孩子出生之前，婚姻是不能视为圆满的。这种观念所依据的，是避孕法所造成的生育和单纯的性之间的区别。避孕法改变了性和婚姻整个面貌，使性和婚姻区别开来，这是从未有过的。

人与人的结合，或者单纯为了性，如卖淫，或是为了包括性成分的伴侣关系。试婚，或是为了建立家庭。这都是不同的说法，很难有一种道德，能够适应现代的环境。

男人的责任婚姻中的性行为

有一些国家，婚姻还是一种宗教制度，还有其法律性。法律制度所包括的行为，不但在原始人中存在，就是在猿猴及其它动物中也是存在的。

动物也有和婚姻一样的行为，因为在养育幼子时，雄性的合作是必须的。通常动物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按照一些权威的人士的说法，在类人猿中也是这样。如果这些话准确，幸运的动物就没有那些困扰人类社会的问题，因为雄性动物一

旦结婚，就会失去对其他雌性动物的吸引力，而雌性动物一旦婚配，也会失去对其他雄性动物的吸引力。在类人猿中，虽然它们没有宗教的帮助，也不知道罪孽为何物，但其本能足以形成良好的道德。

在最低级的野蛮民族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形。据说，澳洲丛林中的居民绝对是一夫一妻制。据我所知，塔斯马尼亚人对其妻子也很忠实。甚至在开化的人中，也可隐约看到一夫一妻本能的痕迹。谈到习惯对行为的影响，人们也许会感到吃惊，因为一夫一妻对本能的约束是万能的。这正是人类智力的特点，并由此产生出人类的罪恶和智能，即所谓打破旧习惯和创造新行为的想像能力。

首先破坏原始的一夫一妻制度的是经济动机，这种动机会影响性行为，它可以用奴隶制或买卖的形式取代以本能为根据的关系。

在古代农业和畜牧业社会中，妻子和孩子都是男人的经济财产。妻子要为他干活，孩子在五六岁后，也开始在田里或畜牧场上派上用场。因此，那些极有能力的男子总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妻子为目的。

一夫多妻制很少成为社会的普遍作法，因为女性的数量有限，只能成为首领和富人的特权。众多的妻子儿女是一种有价值的产业，那些拥有他们的人，其特权地位也因此更高了。这样，妻子的主要功能就成了赚钱的家畜，而性功能则变成次要的了。

在文明时期，男人休妻很容易，虽然他必须偿还她的嫁妆，妻子休掉丈夫却不可能。

大多数半开化的社会，对于通奸的态度也是根据这种观念来的。在非常低级的文明阶段中，通奸有时是默许的。

据说，隆摩亚人在外出时，希望他们的妻子在他们不在家时能够寻求安慰自

己的方法。在稍稍高级一些的文明阶段，女人通奸则会被判处死刑，至少也要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

我年轻时，芒戈·帕克描写的摩包君波非常出名，最近几年，我发现一些很有文化修养的美国人，竟把摩包君波视为刚果神，这使我感到痛心。他不是神，和刚果也毫无关系。他是上尼日尔人杜撰的妖怪，目的在于恐吓那些犯罪的女人。芒戈·帕克关于他的描写，暗示了福耳特尔对宗教起源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直被那些现代人类学者谨慎地遮掩着，他们不能容忍理智的恶去侵扰野蛮人的行为。

一个男人和他人的妻子性交，当然是犯罪，但和一个未婚女子性交却不会受到指责，除非他毁了她在婚姻上的价值。

随着基督教的产生，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宗教在婚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破坏婚姻法的行为会受到指责。和别人的妻子性交，是对那个人的犯罪，婚姻以外的性交行为，也是对上帝的犯罪，按照教会的说法，是更为严重的犯罪。由于这个原因，以前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离婚，现在成了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

这对于人类的幸福而言，是好是坏就很难说了，也很难说清楚。在农民中，已婚妇女的生活是很苦的。在最野蛮的民族，女人在二十五岁时就已经人老珠黄，不能企望有任何姿色了。那种把女人当作家畜来看的观点，对男人来说，无疑是好事，对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受罪。基督教在某些方面，使妇女的地位变得更为低下，尤其是在那些有钱的阶层中，但它至少承认，妇女在神学上和男人是平等的，也拒绝将女人当成男人的绝对财产。

一个已婚女子，没有改嫁他人的权利，但她可以离开自己的丈夫，去过一种宗教生活。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妇女更容易在大多数人中提高自己的地位。

纵观整个社会，究竟哪种状况能够造成婚姻的幸福，哪种状况会带来婚姻的不幸呢？结论是，越有文化的人，越不能与他们的伴侣共享白头偕老的幸福。

爱尔兰农民的婚姻，虽然至今仍由父母包办，但据那些了解他们说，他们总的说来是幸福的，夫妻生活是纯洁的。

从事实来看，婚姻在那些没有多少差别的人中，是容易幸福的。

一个男人和其他男人没有多少差别，一个女人和其他女人也没有多少不同，那就不会存在因没有和其他人结婚而后悔的理由。

如果人们的情趣、追求和事业千差万别，那他们就会要求其伴侣情投意合。当他们发现他们所得到的比他们所想像的要少时，就会感到不满足。教会关于婚姻的观念完全是从性的观念出发的，它看不到两者的不同之处，总是主张永久的婚姻，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痛苦。

造成幸福婚姻的另一个条件是，未婚女人的减少和男人社交机会的平乏。如果男人除了和自己的妻子，再没有和其他女子性交的可能，那么他们就会满足于现状。对妻子来说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不奢望婚姻会带来很多幸福的女人。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不奢望从婚姻中得到很多幸福，婚姻也许就可以算得上幸福。

社会风尚的稳定，也可以防止不幸福的婚姻产生。

如果我们承认婚姻的契约是无法改变的，那我们就不会去胡思乱想，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得到更迷人的幸福。

为了保证家庭和睦，凡是存在这种思想的人，无论丈夫或妻子，只要他们和人们所赞的高尚情操的标准相差不远就够了。

在有文化的人中，有人认为，可以造成所谓幸福的条件，是不存在的。所以，那种历经数年而仍然幸福的婚姻，就显得非常罕见了。

有些不幸的原因与文化有关，如果这对男女比现在更有文化，其原因就另当别论了。最重要的是不良的性教育，这种性教育在富人中，比在农民中要普遍得多。农家子弟很早就对所谓生活的事实司空见惯，因为这些事实，不但在人类中，而且在动物中也可以见到。他们既不无知，也不过分讲究。

一些受过精心培养的富家子弟，却没有一点关于性问题的实际知识。那些现代派的父母，他们也根据书本教育子女，他们无法使自己的子女见识，农家子弟早已熟知的亲昵行为。

基督教学说认为，男女结婚时，双方都不应有性的经验。人的性行为并不是本能的，所以没有性经验的新郎、新娘，对此事一无所知，以至感到羞耻和不快。如果只有女方无知，而男方已经从娼妓那里得到了知识，或许稍好一些。

大多数男人都不知道，求爱过程在结婚之后仍是必需的，许多女性也不知道，她们害羞，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这对她们的婚姻是有害的。

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良好的性教育去解决。

现代青年所受到的性教育，比他们父母和祖父母所受到的要好得多。过去，在妇女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她们在道德上比男人高尚，因为她们从性中所得到的快感要少些。这种态度使夫妇之间无法形成坦率的伴侣关系。这种态度的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不能从性中得到快感，抛开道德不谈，也是生理或心理上的缺憾，正如不能从食物中得到快乐一样。

造成婚姻不幸的其他原因并不容易消除。

那些放荡不羁的有文化的人，无论男女，就他们的本能而言，一般都主张多配偶。他们也许会深深地相爱，而且在若干年里只钟情一个人，但性的爱抚迟早

会失去热情，他们有可能开始在别的地方寻求那原有的冲动感。当然，迫于道德，我们可能会控制这原有的冲动感，却很难阻止它的发生。

随着女性自由的增加，私通的机会较之以前增加了。机会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欲望，如果没有宗教上的顾虑，欲望就会导致行动。

妇女解放在许多方面使婚姻变得更加困难。过去，妻子必须顺从丈夫，而丈夫却不必顺从妻子。现在，许多妻子根据妇女对于个性和事业的权利，不愿意过分地顺从丈夫，而那些仍在向往男性统治的男人，却又看不到他们应当坚持的理由。

这种现象的发生与私通有关系。过去，男人偶尔不忠，妻子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了，那男人便承认错误，并使她相信他会改过。另一方面，妻子通常是贞洁的。如果不贞洁，这一事实又为她丈夫所知，婚姻就会破裂。

现代的许多婚姻表明：即使无需相互间的忠诚，也还存在着妒忌的本能，这种本能往往不能使亲密的关系持久，哪怕夫妻间没有大的矛盾。

现代婚姻，还存在另外一种困难，那些最能意识到爱的价值的人，对此感受最深。爱会发展，是自由和自发的。如果认为爱是一种责任，它就会消灭。如果有人问，爱某某人是你的责任，这无疑会使你对他（她）产生痛苦。如果把爱情和法律联系在一起，婚姻就会变成一无所有。

如果找不到影响婚姻幸福的原因，就得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代替。人们时常提到的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容易实现的离婚。当然，只要其理由超过英国法律允许的范围，我并不认为容易实现的离婚，是解决婚姻痛苦的方法。

对于没有孩子的婚姻，离婚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即使双方的品行端庄。一旦有了孩子，婚姻的稳定性的，就将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如果已经生

育,而且双方对于婚姻的态度是理智而高尚的,我们就应当希望这婚姻是终身的,当然也并不排除其他性关系的存在。

如果一个婚姻起初经历过热恋,而且拥有双方喜爱的孩子,那么,这种婚姻应当形成一种深切的关系,使他们感到夫妻生活多么宝贵,即使在性欲衰退之后。

嫉妒是美满婚姻的障碍,它作为一种本能的情感,也是可以克制的。只要我们承认它是恶的,也不要把它当成是正当的道德上的愤怒体现。

一对老夫妻,曾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自然会懂得获得这种关系的价值,他决不会为了新的爱情而轻易抛弃这种伴侣生活。

高层次的男女,有可能从婚姻中得到幸福,但满足的条件是双方必须有绝对平等的感觉,不干涉相互间的自由,身体和肉体的亲密无间,认识价值标准的相似之处。只有具备了以上条件,我才相信婚姻是两个人之间最高尚和最重要的关系。

从前,这种关系之所以很少实现,主要是丈夫和妻子,都把自己视为对方警察的缘故。婚姻是能实现它的可能性的,双方都应该明白,无论法律如何规定,他们自己的私生活仍是自由的。

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教导,它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学习说依赖并不是爱,依赖意味着冲突、愤怒、恨、嫉妒、占有、和控制。一个人必须学习不去依赖,但是要达到这样,你需要进入很深的静心,好让你能够自己一个人就很喜乐而不需要别人。当你不需要别人,那个依赖就消失了。一旦你不需要别人,你就可以分享你的喜悦,那个分享是很美的。

爱永远无法成为婚姻的伟大基础,因为爱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如果你因为爱而跟一个人结婚,你将会后悔,因为那个乐趣很快就会消失,当那个新鲜感消失,无聊就进入了。婚姻是为了更深的友谊和更深的亲密。爱也隐含在它里面,也并不

非只有那个因素。所以婚姻是心灵的，它的确是心灵的！有很多事情你永远无法单独一个人去发展。即使是你自己的成长也需要别人来反应，需要一个非常亲密的人，使你能够对他或她完全敞开。

婚姻根本就不是性的，是我们迫使它成为性的。性或许存在，也或许不存在。婚姻是一种很深的心灵交融。如果有这样的婚姻发生，我们就可以生出非常不同的灵魂。当一个小孩是由这种亲密关系所生出来的，他就可以有一种心灵的基础。但我们的婚姻都只是性的——只是一种性的安排，出自这种安排，你说会生出什么呢？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婚姻是一种性的安排，要不然就是为了短暂的浪漫的。

男人的责任男人的欲望

人必须珍惜自己心灵的自由，然而只有正当理由才能使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但是如果正确判断事物，就会发现正当理由并不多。那些习惯于受人支配的人，在哪里都可以抵押心灵的自由，无论大事小事，无论与己是否有关。哪里有困难，哪里有责任，他们都一律插手，这些人若是心里无事就难以生存了。

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之远，因为他们不会自我控制，如石头坠地，只有掉到地上才会停止。有些人认为，工作乃是精明和位高的标志。他们的思想只在动中求静，有如儿童在摇篮中寻求安睡。他们对朋友热心殷勤，对自己却十分厌烦。

没有人将钱分给别人，却在分发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我们对时间和生命挥霍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挥霍的任何东西。

那些规矩和箴言总希望改变我们，让我们放弃自己，以达到人人敬仰的效果。圣贤都先入为主，认为我们都过分依恋自己，这种依恋又十分自然。因此他们订规矩讲箴言都不惜一切。圣贤不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按事物有利于什么进行说教，这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我们在家都有同感，真理有时也会有妨碍人们、对人们不利、与人们不相容的一面。我们需要欺骗别人从而达到不自欺的目的。这需要蒙住自己的眼睛，麻醉自己的理解力并改善自己的视力和智力。当他们命令我们超前于事物三度、四度、甚至五十度去爱时，他们是在模仿弓箭手的射击术，为了射击到位，弓箭手瞄准目标总超过靶子很高。

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在自身生活的角色中，认为应当遵守他人和社会的惯例，并且以此在相关的范围尽职尽责，为公众社会做出贡献。

不为别人而活，就是不为自己而活。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因如此，我们才相聚于这个世界。

如果有人不过正常人的生活，不洁身自好，却以为引导训练他人过这种生活便尽到了义务，那一定是愚蠢之人。同样，谁抛弃自己正常愉快的生活而去为别人效力，那么他也是不近人情的。多少人日复一日前去为战争冒生命危险？有的人身居家中，远离战争危险，甚至不敢正视这种危险，却比在战场流血卖命的士兵对战争的结果更感兴趣。

我曾做到参与公务但不舍弃自己的一分一毫，为别人效力但不剥夺自我。

激烈的渴望会妨碍人的行为，使我们对一些不顺心的事焦躁不安，对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满腹狐疑。一个人受着事情左右，便永远没有自由，也不可能办好事情。

判断力强的人处理事情必定轻松愉快。他装假让步，视情况需要任意推迟一切。他可以失误，但从苦恼，从不悲伤，并作好全面准备从头再来。他在前进中永远掌握行动的自由。在愿望强烈、专横、如醉如痴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许多不谨慎、不正确的表现。他强烈渴望必定压倒一切，行动必然莽撞，如果运气不

好，效果必然微乎其微。

人生哲学要求，在为所受冒犯而惩处对方时需排解怒气。这并不是要削弱复仇心理，而是为复仇更能击中要害。愤怒不仅扰乱思想，还会自动使惩罚者疲乏不堪，愤怒之火会减弱并消耗力量。

让心灵承受太多，便会妨碍心灵理解事物。有些事只须展现在心灵面前，有些事必须和心灵相连，还有些事需要和心灵水乳交融。心灵可以看到并感觉到一切事物，但它只能自己丰富自己。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圣贤告诉我们，没有人天生贫穷，人是否贫穷，依舆论而定。于是，你便能巧妙区分什么是出于自然的欲望，什么是出于妄想的欲望。

能实现的欲望，就是自然的欲望。而一直引诱我们往前走，却使我们找不到尽头的欲望，便是妄想的欲望。

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凡是我习惯中缺少的东西，正是我本人缺少的东西。如果有人使我远离我长期习惯的生活，我宁愿他夺走我的生命。我们越扩大自己之所需与所有，就越受到命运的冲击而难于自拔。

我们欲望的自由度应限制在最直接的范围以内，而且欲望不应按直线运动，直线的尽头在别处，它应绕圆圈运动。只有这样，欲望的两端才能相依，并在我们身上以简洁的轮廊结束。

人们在社会上从事职业，都可以说是在演戏。“全世界都在演戏。”我们应当像模像样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或是模仿剧中人物的角色。不必将面具和外表当成实质，不必将外来的当作自己的。我见过一些人，他们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实

质上都起了变化，有了新的面貌，变成了新的职务中的人。

人的生活必须适应社会，也要学会认识、利用社会。皇帝的见解应高于他的帝国，他应把帝国看作自身以外的次要事物，而他自己私下则应善于自处并与人推心置腹，有如雅克与彼埃尔，至少对自己表里如一。

当愿望促使我站在某一边时，我的见解并不受任何强制性义务的影响。在当今的动乱中，我不因我个人的利益而否认敌手值得赞扬的优点，也不否认随从应指责的品质。

一部优秀作品不会因为在我的诉讼里为对方辩护而失去光彩。除了辩论的症结，我坚持平等的态度。“除战争需要，我从不记死仇。”我为此自满自足，我通常看到的与此相反的做法都站不住脚。“如果此人不能顺乎理智，那就让他沉湎于痛苦。”将愤怒和仇恨扩大到超过事情本身，这说明愤怒和仇恨的起因在别处，根源也很特殊。

如果某人的溃疡痊愈了，但烧还没有退去，这说明发烧还有别的更隐蔽的原因。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并非出于共同的原因，也不是所有的人和人都受到了损害，而只是在折磨他们个人。这就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格外义愤填膺，愤怒到不近情理的程度。

不必狂热追逐感情和利益。年轻时我曾压制爱情切莫过快发展，我认为，万一爱情使我不能自主，我会感到不快乐。无论处于何种情况，只要我的心意过分热切，我都会对我倾心的事反其道而行之，权当这份心意正沉浸酒中昏昏欲醉。

看待事物肤浅的人，总把少受害视为是幸运。凡需要深刻认识不利事件，凡需要衡量和品尝偶然损失的严重性的人，最好巧施手段以避免引起一些损失。戈蒂尤斯国王便是这样的。他慷慨买下别人推荐给他的漂亮的餐具，但因餐具格外易碎，他一买过来便立即亲手将其打碎，以便消除去向仆人发怒的机会。

一个老实人，遇到不如意的事，可以从内心产生害怕。只要不把做蠢事作为对自己损失的报偿和安慰，他最好不要去与人发生冲突。

有一些高人，并不害怕陷入复杂多变的大事之中。他们对自身的力量很有信心，即使在各种敌对势力获胜时也能保护自己，他们能凭借毅力同对手进行斗争。他们是那么的顽强，眼看国家毁灭，也不慌不忙，他们的意志已完全主宰不了一个国家。

这种人生态度，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这些小人物应当躲避风暴，躲得越远越好，必须培养感情，不应培养毅力，必须避开我们抵挡不住的袭击。

人们说已克服了报复的狂热或别的什么实质性狂热时，往往是符合当前事实的真话，但并不符合过去的事实。他们向我们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们自己却仍在维持着错误。

人是否希望随着时间的变长，错误就变得越小？是否希望从不正确开始，接下去就正确了？谁像我一样希望祖国好的同时又不会患上溃疡病，看见国家有毁灭的危险或正处于毁灭的时期会感到很不痛快，但不会怕得浑身麻木。

那些可怜的船舰，风浪和船员在把它拉向怎样相反的目标呀。谁不像追求必需之物一般向王公企求恩宠，那么他对王公们冷淡的接待和脸色，对他们多变的心情，就不会感到格外恼火。

谁不溺爱儿女或荣誉直到鞠躬尽瘁的程度，谁就在损失了儿女或荣誉之后仍可以生活得逍遥自在。只要有一点韧性便可解决这种问题。运用这一方法，会使我以极小的代价弥补很多问题，还避免了许多麻烦和困难。我稍作努力便能在我激动时，就能进行遏制。

不能制止它起跑便无法制止其狂奔，不能拒之于门外便无法将它赶出家门，不能战胜开头便不能战胜结尾，支撑不住动摇便支撑不住坠落。

一个人一旦脱离理智，狂热便自动往前挤。软弱的路越走越宽，就再也找不到隐藏自己的处所。我能及时发现前来触摸我并在我内心飒飒作响的微风，那是暴风雨的征兆。

在遭受与我天性水火不容的卑鄙阴谋诡计之后，我曾多少次对自己施以不公，以避免承受法官们更不公正待遇的风险。

人如果是聪明的，就应遇事感到高兴。

比如说，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大家族子弟，天真地向所有的人热烈谈论他母亲如何败诉，就像谈他的咳嗽、发烧或别的什么令人厌烦的事似的。

命运曾给我一些恩宠，如我的亲族关系，以及我与至高无上的威望人物的交往。我曾真心避免利用这类关系危害别人，从不让我的权利超过权利的直接可利用性。

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都是从一些看上去滑稽可笑的原因产生的。最后一位布戈涅公爵，为一大车羊皮引发了倾家荡产的损失。刻嵌印章不是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崩溃的首要原因吗？

国内最明智人士，用公款摆排场，客客气气聚在一起签署条约和协议，而那些条约协议却取决于权威性的夫人、内阁中的闲聊和某些弱女子的癖好。诗人们对此心领神会，他们为一个苹果可以把希腊和亚洲置于火海之中。

一开始，许多问题都是比较好解决的，然而一旦卷了进去，那就需要花大力

气才能摆脱。就像芦苇在发育之初长出的是一只又长又直的梗，此后就会意外长出些节子，又多又密，像一个个休止符，这说明它已没有最初的活力和坚韧性了。

当事情开始发展时，可以对其进行引导并随即支配它们，然后，便是它们在引导我们，带动我们的狂热，我们便只好跟着事情走了。

狂热总是不容受到抑制的。狂热初起时往往十分激烈过火。虽然从狂热中也可以获得成果，不过这类成果只和个人有关。

你感到满意的，不一定更受尊重。如果你在进入活动之前便使它有所改进，就会有出成果的希望。在人生的其他一切职责中，追求荣誉的人所走的道路，同注重秩序和理性的人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

有些人一开始参加竞赛就狂热，结果中途速度慢了下来。如普鲁塔克所说，有些人由于羞怯，既懦弱又容易答应别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事后就会容易食言。轻易与人争吵的人也极易退出争吵。一件难事既可能让我望而却步，又可能在我激动和感到震怒时唆使我去干。一旦卷进去了，就得干到底或为此送命。

人们天天向上帝祷告谢罪以洗刷自己的过失，而这类道歉和谢罪似乎比鲁莽本身更令人厌恶。宁可再一次触怒对手，也不要向对手赔礼道歉，从而自我冒犯。你顶撞了他，让他怒不可遏，恢复冷静和理智后，你又去安抚他，讨好他，如此你进了一步却退了两步。

狂热容易避免却难以节制。谁也做不到斯多葛式的高贵镇定，愿他逃进我这百姓式的迟钝怀抱中来吧。别人从德行出发做的事，我习惯于从气质出发去做。两者之间容纳风暴，两个极端，即哲人和乡巴佬，都是竞相争取安宁和幸福。一切公开活动都受各式各样不明确的制约，因为解释的人太多了。

人们变得如此浮躁，如此爱出风头，连善良、稳重、平等、恒心，以及清静

无为、甘于寂寞之类的品德都不复存在了。

粗糙之物到处都是，平滑之物却连摸也难以摸到。疾病流行，健康者寥寥无几，与人为善之事寥若晨星，为恶之事却处处可见。

把议会可以办到的事拖到现场去办，将头天夜里可以完成的事拖到明天中午，朋友可以干得同样出色的事巴不得自己去干，此类行为皆名为利而非为善。

正如希腊一些外科医生，在木板搭成的台上为病人作手术，为的是使过路人都能看见，以便开展业务招揽更多的顾客。他们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也只有靠吹喇叭才能被人理解。柏拉图着述里的阿尔西比亚丹斯，宁愿在年轻、漂亮、富有、高贵、极有学识的情况下死亡，也不愿在风华正茂之时裹足不前。这样一个有自信的人，这种症状可以原谅。

志向渺小、心灵平庸、才智低能的人自我陶醉，企图扩大自己的名声，这种人越想昂起头来便越露出自己的不足。做点微不足道的好事，既无分量也无生命力，只能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

声誉不会如此贱价出卖。难能可贵的表率行为，是容不得微小举动来充数的。如果善行并非困难重重，令人费解，这样的善行就不一定都能引起多大反响。

享福应同自己的福分一致，我们就别心比天高巧取豪夺了。享自己的福更为自然，享乐的层次越低越牢靠。即使不涉及良心问题，我们起码可以拒绝野心。我们蔑视沽名钓誉之辈，此举之低下卑微足以使我们向各式各样的人乞讨。

市场上能买到的荣誉是什么样的荣誉呢？那是以下流手段而不顾价钱低贱而收买的荣光。如此获得荣誉是破坏名誉。只有那些出色而高贵的人，才不会为此类行为而自豪，他们希望行为的价值与他们付出的代价成正比。

越是叫得响，越冲淡我对它的肯定。我怀疑良心之目的为叫得响更胜于良心本身，良心一经炫耀，便有一半被出卖了。

凡由行动者漫不经心并不声不响进行的有益活动，以及由某个老实人认定为有益并将其从无声无息处推出，使其靠自己增光添彩的活动，都更有魅力。